

記憶

REMEMBRANCE



眾生平等
百家多鳴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2月31日第34期 总第24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4 期

炎黄春秋专辑（三）

【编者按】

众生平等，百家争鸣

【专稿】

洪振快 “炎黄规则”的得与失

——兼论精英德性与对自由派的反思

杨继绳 对《炎黄春秋》的一些回忆

——兼谈李南央女士的《〈炎黄春秋〉的遗憾》

附一：我对强行收编《炎黄春秋》的态度

附二：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时的两封公开信

杜 星 几点澄清——给李南央的信

李南央 回答读者提出的三个问题

王晓林 民主派需要更坚实的道德支撑——兼谈徐庆全的经济问题

【评论】

杨利川 中国需要一种“文化”的蜕变

向胡杨 《炎黄春秋》与碎片时代——茶杯里的风波

王智仁 长歌当哭祭“炎黄”——我和《炎黄春秋》

尹曙生 我读《〈炎黄春秋〉的遗憾》

凌 铭 这一堂课上得好！

吴 萍 读李南央《〈炎黄春秋〉的遗憾》想到的

刘 滢 三叹《炎黄春秋》——读晓林君文章有感

【来信选登】

江夫、叶维丽、蔡新平、许有为、薛原、王津津、国庆、马昌海等。

【资料】

王晓林整理 《炎黄春秋》2011—2016/7 总目录

【本刊声明】


【编者按】

众生平等 百家争鸣

三个月前，有人闻知《记忆》要刊发李南央评说《炎黄春秋》的文章，托人说项：“如果各界朋友爱护炎黄春秋，就请维护这份刊物的声誉，不要刊登未经核实的文字。”“我们一致的看法，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解释此事或再谈对李南央的评价。”未几，又有人驰函质问本刊：“你为什么要约南央写稿？为什么要选个题目？”气势之汹，令人惊骇。本刊无以应答，遂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226期封面）昭明区区之用心。

10月15日“炎黄专辑一”发出后，臧否腾于众口，议论落于笔端。李南央之文成为焦点。赞其高屋建瓴，拨云见日者虽声震遐迩。但斥其内斗资敌、亲痛仇快者亦络绎于途。为答读者质询，编者重申办刊宗旨——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置于刊头（见228期封面）。“四不主义”乃张季鸾先生1926年创办《大公报》时写下的社训。九十年后，唯一一介民刊重拾前人牙慧，而多数国人对此公器之要义，传媒之箴言或茫然无知，或以为大逆不道。可见新中国新社会新时期新时代观念之进退。

10月31日“炎黄专辑二”问世，炎黄话题，无可回避。众稿纷至沓来，炎黄内外皆欲发声。当初质问本刊为什么要发李南央之文的朋友，由拒斥转向合作——惠赐大稿，阐明个人观点，详析昔日情事。远在广州的高级记者不顾北京旧部之约法，向李南央发出公开信，列举实例，澄清问题。李南央则在回应读者的文章中，继续阐述她对民主宪政的看法。王晓林就读者所询，在释疑解惑之同时，将徐庆全的经济问题提升到公共知识分子个人品德这一层面。而原炎黄执行主编洪振快则反思社史，指陈得失，提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困境与精英德性的关系问题。诸文皆为爱护炎黄而发，可见所谓维护声誉之虚矫，避而不谈之无稽。

本刊有宗旨有原则有主张，无党派无圈子无营垒。如刊末声明所说：“《记忆》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投稿者，人不分精英草根，文不分左派右派。“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

2018-12-30

【专 稿】



作者简介：

洪振快，历史学者，著有《讲武论剑》《红楼梦古画录》《亚财政》《官心民意》诸书。2010 年 6 月入炎黄春秋杂志社，至 2014 年 12 月，在改变主管主办单位风波中，因“曲终奏雅”方案未被采纳，且同人办刊精神式微，与黄钟一起辞去执行主编职务。2013 年发表两篇质疑“狼牙山五壮士”官方宣传的文章，引发系列诉讼，至今未完结，官方为威慑所谓“抹黑”英烈言行，特在《民法总则》增设第 185 条，并专门出台“英烈保护法”。目下国内已无法发声，只能偶为外媒（如香港端传媒、纽约时报中文网等）撰稿。

“炎黄规则”的得与失**——兼论精英德性与对自由派的反思¹****洪振快****摘要：**

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精英的德性将决定现代转型是否顺利。英国精英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德性——诸如理性、有条件的妥协、讲规则、遵守民主程序等等，是英国宪政制度得以逐渐成熟，没有退步和反复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法国精英在这些方面远不如英国精英。

既然认同民主宪政，指责别人不搞民主宪政，那么放到自己身上就应该按民主宪政的规则办事，用行动去实践之，这样才能显示对自己主张的真诚，否则岂非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吗？这就是我说的精英的德性问题，中国现代转型的困境，与精英德性不足，是有很大关系的。认同一种价值，却不去起而行之，甚至背其道而行，这样岂不是重新陷入传统政治的争权夺利的怪圈之中吗？

¹ 本文初稿曾发给李南央、杨继绳、徐庆全、吴思、李晨、张晓鸥、黄钟阅读，请他们不吝赐告意见，后他们都提了意见，除涉及本人观点应由本人自负文责外，其他本文大部分予以吸收。感谢老同事们的信任和支持！

在我看来，“炎黄”后期作为给中国转型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要想民主转型成功，自由派（不限于“炎黄”同仁）要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德性，让自己的言行与所追求的理念合而为一，自觉让自己受到规则的限制，如此才有可能为宪政奠基。

最近，由于李南央¹公开文章《〈炎黄春秋〉的遗憾》（以下简称“李文”），引发争议：有人认为李南央挑起“窝里斗”，也有人认为亲痛仇快，还有人认为李南央是“炎黄精神”的继承者，等等，一时众说纷纭。杨继绳著文（以下简称“杨文”）²回应。作为老“炎黄”的一分子，同时也是老“炎黄”内部矛盾的中立者、旁观者，本人愿就自己了解的情况，提供一份自己的观察，供大家参考。

首先，本人认为“炎黄”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后续的使命应该是向公众如实托出办刊历史，为中国未来的转型提供经验和教训，如此才是薪尽而火传，蜡炬成灰有余光，不负以往公众对“炎黄”的尊敬。而讳言“家丑”，隐瞒历史，则与老“炎黄”追求的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不虚美不溢恶的精神相违背，只会给自己留下更不光彩的记录。

其次，李南央文章的确提出了重大问题，值得认真对待，其中既有李南央提出的“炎黄”游戏规则缺失的遗憾，还有读者提出的民主宪政派自身问题的遗憾，值得深思。杨继绳文章否定了李南央文章对游戏规则缺失的批评，本人虽不认同，但认同其“炎黄”之死并非死于内部矛盾、而是死于官方封杀的观点，杨文也提供了其他事实，有助于探求真相、解开“炎黄”内部纠纷谜团，因此本人也赞赏杨继绳著文并公开发表。

再次，老“炎黄”是中国泛自由派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改良派的主张，但老“炎黄”内部分歧也很大，杜老（社长杜导正）一直宣告自己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体制内的改良派、中国社会内部的温和派和稳健力量，这当然是老“炎黄”内部的基本倾向，但也只是代表大家共同的一面（温和改良），而“炎黄”同仁对中国转型路径问题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改良派、

¹ 本文涉及人物均为本人的师长辈，但文中人名均直呼其名或略为姓氏，只为陈述简略起见，并非不尊重。

² 本文初稿引述杨文的征求意见稿，杨阅读后希望以定稿为准，本人回复还是准备引述征求意见稿。因为本文涉及的部分内容对解开“炎黄”内部矛盾的由来非常重要，征求意见稿更能体现 2014 年 11 月的历史情境和真实心态，而定稿经吴思提供事实后有改动，可能更反映目前的认知。历史研究对原始史料更为看重，优先采用，故本文仍引述征求意见稿。

改革派现下正遭受四方——中共、毛左、五毛、口炮党（泛自由派内的革命党）围剿，近于四面楚歌。老“炎黄”的“家丑”难免乃至必然会被不同政见者视为“奇货”，作为否定、攻击改革派、改良派的口实，这正是有些朋友担忧的亲痛仇快。但本人以为，不能正视自身的弱点就无法成熟，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就不能对中国未来的转型负起责任，因此应当勇于解剖自我，把弱点和缺点呈现给公众，作为经验教训来吸取。在此意义上，探究老“炎黄”的“家丑”不仅不丢人，恰恰是光明坦荡。

“炎黄规则”：老“炎黄”的“议事”“议稿”规则

李文认为“炎黄”游戏规则缺失，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老“炎黄”内部是有游戏规则的，只是在后期被破坏了而已。在2014年12月被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以前，杂志社内有“议事”、“议稿”两套规则，合之可称“炎黄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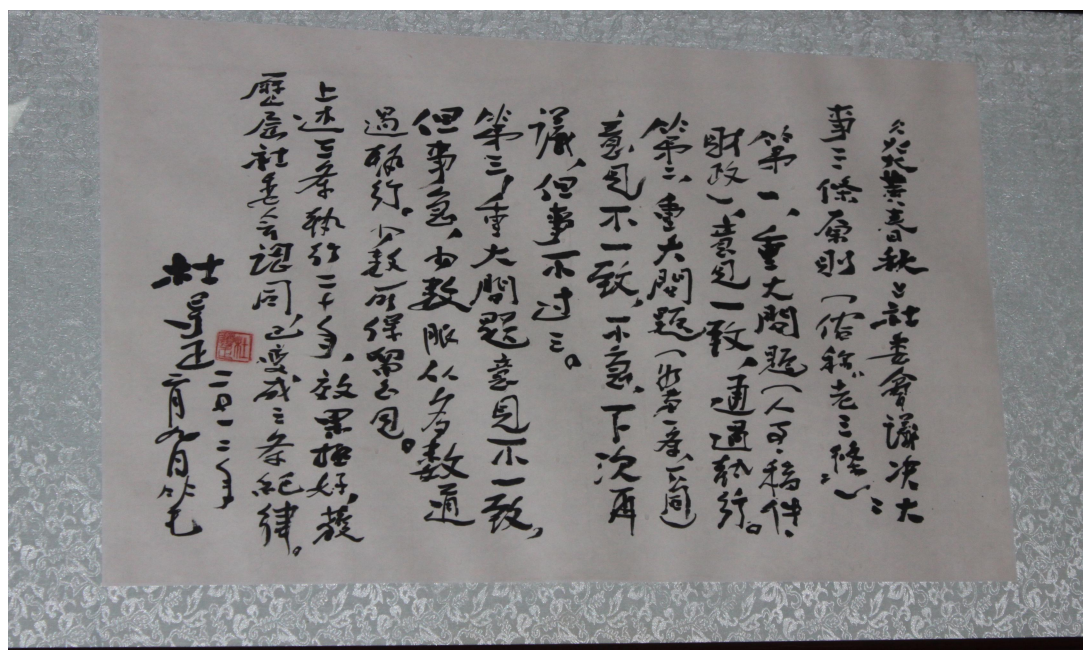
“议事”规则，即已被外界所知的“议事三原则”。这是一套处理社内重大事务的规则。其表现是杜老写的一幅字，装裱了挂在会议室墙上。具体内容是：

“《炎黄春秋》社委员会决大事三条原则（俗称‘老三条’）：第一，重大问题（人事、稿件、财政），意见一致，通过执行。第二，重大问题（如第一条，下同）意见不一致，不急，下次再议，但事不过三。第三，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但事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执行，少数可保留意见。”后面并附有一段话：“上述三条执行二十年，效果极好，获历届社委会认同，已变成三条纪律。”题署时间是2012年2月9日。请注意，这个题署时间很重要，因为涉及杨文中提到的内部矛盾之由来，详见后述。

按字面理解，这是对重大问题（人事、稿件、财政）出现不同意见时的处理原则。有些说法说这是“社委员会议事三原则”。社委会是社内最高权力机构，由七人组成。人事、财务属于社务，稿件则属编辑部事务。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是稿件纠纷，属于社委会成员的人（如财务总监）未必懂行，而不属于社委会成员的执行主编（包括本人和黄钟）则需要发言权，那又当如何处理？

杂志社内部环境宽松，一周才上三个上午的班，通常周三上午是例会，也是神仙会，大家交流各种信息，大多内容是关于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社内人员也不多，一般也就是周三上午大家都来碰头，有什么大事小事都在会上说，属于非社

委会成员的黄钟和我也都参与。我印象中，因大事开会而不让黄钟和我参加的情况很少。不过，有一次，有人说社委会开会，我就离席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去了。



（炎黄春秋杂志社会会议室墙上悬挂的“议事三原则”题字，照片由徐庆全提供）

还有一回，我明确提出，稿件讨论如果也是社委会决定，我将不参与讨论——因为我不是社委会成员。后来明确的规则是如果涉及稿件，黄钟和我有权参加社委会会议并有表决权。由此看来，“议事三原则”既是社委会的议事原则，也是编辑部的议事原则，而编辑部并不完全等同于社委会。

“议稿”规则，最大特点是“一人附议投票表决”，这是对稿件发生分歧后的解决机制。此外，“议稿”机制还包括回避制度等。在 2014 年 12 月被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以前的两三年中，“议稿”机制已趋规范和完善。

杂志靠刊发文章获得读者认同，处理稿件是杂志社的核心问题。《炎黄春秋》每期杂志实行执行主编负责制，执行主编全面负责该期杂志的组稿、审稿、编辑事宜。¹但是所有稿件需经终审和编辑部集体三次讨论（内部称一议、二议、三议）。我是 2010 年 6 月去的“炎黄”，去后接任了李晨的执行主编职务，和杨继绳、徐庆全一样任 4 期杂志的执行主编。约一年半后黄钟加入编辑部，杨、徐各拿出 2 期给黄钟，这样变成我和黄钟各编 4 期，杨、徐各编 2 期。杂志的每一

¹ 由于执行主编学养、喜好等不同，每期也带上了一定的执行主编印记，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执行主编兼任该期绝大部分文章的责任编辑，但某篇文章的责任编辑也可以由其他人包括总编来承担，比如本人曾经明确表示不愿意当杨继绳二篇关于“大饥荒”争议的文章的责任编辑，最后总编吴思表示由他来当。不当责任编辑就表示对该篇文章不负责任，这是副社长李晨指点我的：对于自己不认可但无法阻拦发表的文章，以不当责编表示与你无关。

篇文章，执行主编必须在编辑部会议上介绍内容和价值（大家不熟悉的作者也需要介绍下情况），供大家判断，集体讨论决定是否采用。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价值不高，或政治风险太大，或容易引发麻烦（有些历史文章会引发利害关系人的纠葛，甚至到杂志社闹事，此事出现过不止一次），执行主编就得进一步解释，或者请有不同意见者自己阅读稿件，如果不能说服大多数，该篇文章就会被否决，不能发表。

一般有价值的文章，经过执行主编介绍大家都能认同，获得通过，予以刊出。但也有些稿子（主要是关系稿），会出现分歧。首先是选稿的执行主编和终审（黄钟进入编辑部前是吴思一人，之后吴思负责终审 8 期，杨继绳终审 4 期）之间就可能发生分歧，执行主编认为稿子质量可以，应该发表，而终审不认同。在一般的媒体里，包括党媒官媒，无疑终审说了算。但炎黄是同人杂志，如果由终审一人说了算好像也不符合民主规则，需要有另外的规则让大家心服。这里面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终审认为可以发的稿子，推荐给执行主编安排发表，而执行主编认为稿子质量不高，不想安排发表。这样就需要有分歧出现之后的解决机制。

“炎黄”编辑部探讨出的一个民主机制是：如果出现对稿件的认识分歧，编辑部内任何一人可以请另一人附议，将稿子提交编辑部集体讨论，一人一票表决，多数决定是否发表。简单说，这个机制就是“一人附议投票表决”。

回避制度，主要是执行主编和终审不能在其负责的那一期发表个人文章，这是为了避免编辑部内同仁优先发自己的稿子，和社外作者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

从以上“炎黄规则”来看，“炎黄”的确和一般媒体不太一样，在中国大陆是否独一无二无从得知，但至少是包含了民主宪政精神，与“炎黄”的民主宪政追求一致。其核心精神是民主决策、限制独大权力。“议事三原则”的精神内核是充分发表意见，多数决定，少数可保留意见。编辑部“议稿”规则是限制一个人决定用稿权，因为如果是总编或终审负有最终的用稿决定权，则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而一人附议即可提交集体表决的规则限制了总编或终审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如果总编或终审觉得自己有终极权威，认为哪篇稿该发或不该发，而编辑部内有两人不同意其意见，就可以提交集体讨论，而集体讨论最终否决了总编或终审的意见，则其权威就要受损。有了这一规则，总编或终审就得约束自己，以避免自己因专断而被集体否决的尴尬局面出现。

在当代中国传媒史上,《南方周末》也曾经缔造辉煌。有些人将“炎黄”与“南周”并题,称“北‘炎黄’,南‘南周’”。有人则称“南周”与“炎黄”是“一报一刊”,而且是愿意自己花钱订阅的“一报一刊”。“南周”创始人左方曾出版个人回忆录《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其中对“南周”内部的“议稿”规则有所涉及,其特点是主编“没有发稿权,只有抽稿权”。

左方说:“要限制编辑记者乱用职权,就首先要限制主编滥用职权,因此我同时作出一项规定,《南方周末》的主编没有发稿权,只有抽稿权”;“我认为一个编辑部不应有等级高低之分,只有各人不同职责之别,我作为主编,要对报纸负责,要对我们这个集体的安全负责,审读大样时常常抽稿,而且不容争辩。不是为了显示我的权威,而是履行主编把关的职责”。

如果将“南周”与“炎黄”的“议稿”规则作一对比,可以发现在用稿方面是一致的,即总编或主编都没有发稿权,而在毙稿方面“南周”主编有绝对权而“炎黄”总编无绝对权。相较而言,主要是毙稿“炎黄”编辑部事前有复议的民主程序,而“南周”只能事后被证明判断出错进行补救。因此,相比之下,可以说“炎黄”的规则更合理。

但是,这不等于说“炎黄”就一定比“南周”强,事实上“炎黄”内部杜老要对杂志社的生死存亡负主要责任,如果杜老明确表示一篇稿子不能发,估计大家还是要认可杜老的“一票否决权”的¹。不过,在本人在编辑部期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杜老已经放手让大家办刊,用稿事宜他事前不干预(偶尔有他老熟人的关系稿批转过来希望刊出,编辑部也可能迟迟不安排或干脆说明达不到发表标准,杜老也不会强迫大家刊登),只是在出版之后才进行评点,即使哪篇稿子他不认可,一般也只是表示“以不发为宜”。

规则的刚性与柔性:“议事三规则”的缺点在于非刚性

虽然老“炎黄”内部有符合民主宪政精神的规则,但规则有刚性与柔性之分,而编辑部内每个人的规则意识会因个人秉赋(包括学养、个性、阅历乃至利害计算等)而有差异,个人对规则对自我的约束的自觉程度也不尽相同。民主规则没有成为刚性机制,则是后来“炎黄”内部分歧没能妥善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¹ 徐庆全在阅读本文初稿后附按语:“在你来之前,杜老明确要发的稿子被否定的也不在少数,我本人就多次否定过,老杨就更不用说了,你这里的‘估计’不准确”。但徐这里说的是发稿权,而不是毙稿权。

2014年11月5日，在社委会扩大会议上（除社委会成员外，另有李锐、何方、陆德等参加），杨继绳指责吴思是宋江、宋江架空晁盖，事后我才得知，觉得不可思议。本人在“炎黄”，除了编稿，未涉其他事务。平时在编辑部内尽管会发生激烈争论，但大家各陈己见，出以公心，争论之后也就放下了，并没有放在心上，也不觉得谁和谁有什么个人恩怨和成见。激烈争论乃是内部民主的体现，相反只有等级制、不自由才压制意见发表、避免公开争论。而“炎黄”编辑部同仁恰恰都是不承认那一套的，每个人都要求自由发表意见。大家各自发表意见、陈述理由之后，某个问题也就有了多数认可的意见，问题也就解决了。大家都有自由的天性，“炎黄”的自由氛围正是大家想要的。

为何杨继绳会突发“宋江”之论，虽然李文也说到杨继绳后来曾向吴思道歉，并表示“那是他一时激动说出来的不当的话”，但从杨文来看，那可不是简单的“一时激动说出来的不当的话”，而是对吴思有“投降”之嫌的指控（详见后文）。而且这一“投降”指控，导致杜老及杨、徐（庆全）开始对吴思不信任，进而埋下杜老有意“废黜”吴思的远因，最终引发吴思怒而辞职及杨文所称“玉碎派”和“青山派”的分裂事件。而“炎黄”内部处理纠纷是否应该遵循规则的争议也由此而来，因此弄清“投降”真相就成了理解“炎黄”内部分歧的关捩所在。

根据当日争论现场录音，吴思描述了形势，认为转变主管主办单位有两重性：

一重性是普遍性，就是大家都在转，北京有22个单位在转，×××（某中央委员）说他同时负责4个在转，所以负责这4个是因为来头太大，都有后台，所以他要出面，这就是普遍性。从这个普遍性的角度来说，转变主管主办单位不是针对我们的，是一次全面的动作。

第二重性是从去年、前年，年年新闻出版总局找我们谈话，批评我，拉着赵老师（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德润）陪绑，都会问赵老师你们管得了管不了，管不了就换主管主办单位。所以这是特殊性，是延续的，一直在想控制我们。分歧就是这两重性究竟哪个大哪个小？如果是针对我们的，那就是收紧一步，离死进一步，当然还没到死的地步。如果是普遍性，那离死还比较远，这是全面的一个整顿、清理。怎么判断这个轻重呢？比重呢？陆老师（陆德）说，×××（某中央领导）说党内对《炎黄春秋》的看法是有争议的。有争议反过来说就是没共

识的，没有人认为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也没有人一定认为我们就要死。达不成共识，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就死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炎黄春秋》过去（指归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管），我觉得是普遍性占主导位置，我们离死还有很大一段，我觉得我们这一段严重地夸大了过去的风险，……动作太大，本身动作太大倒给我们杂志造成了问题——至少已经两个执行主编辞职了，这个问题给我们杂志带来的伤害比转变主管主办单位表现得还直接、还严重，我们自己就变了，人员已经变了，风格也就难免变，我觉得做得过了……没有那么多的风险，比如三分五分的风险，弄成七八分，犯不上，造成的内部问题倒是成了七八分……

在其他人发表相关意见后，杨继绳接过话头说：

这个事从三年以前说起，上次改制，咱们内部出现分歧，吴思比较天真，书生气，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所以谈判看起来比较听话，所以我们就不对抗，杜老就不同意，所以杜老防止吴思单独地跟人家谈判，设了三条原则，这是以前没有的，是为了对付吴思的，防止吴思利用专断的权力，投降。

现在又过了三年，又出现了这个情况。吴思的估计形势我认为还是书生气的，还是比较天真的，看他描述的，这边风景多好啊，过来吧。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分歧就在这儿。估计杜老要分权，也是对吴思不放心，怕他当宋江，怕架空晁盖，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实质在这儿，咱们挑开，可以讨论一下。如果不挑开的话，模糊说是没意思的话，就是怕吴思当宋江，杜老的意思，把晁盖架空了，问题在这儿，就是这个意思，吴思当宋江……

从杨的话中可以看出，说吴思是宋江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杜、杨、徐担心吴思“投降”官方，把杜老架空了，因为吴思是常务社长、总编辑，更重要的是法人代表，在法律上是真正代表杂志社的——假如吴思和官方私下达成某种协议，以法人代表的身份签了字，那杜老也是没法更改的。

杨文中进一步提到了更具体的事由，这就是2011年的转制风波和内部分歧。杨文中关于吴思涉嫌“投降”指控的事实陈述是：

吴思多次和上面商定方案，搞“沙盘推演”，有的事还对社委会保密，也对杜老保密（可能上面要求他暂时保密）。后来吴思搞了一个方案提交社委会讨论，社委会意见分歧大，只好投票，结果被多数反对票否定（社委 7 人，2 票赞成，4 票反对，1 票弃权）。但是，炎黄文化研究会无视炎黄社委会对股份制方案的票决结果，还是将这个方案上报新闻出版总署。与研究会沟通是吴思分管的，是他忘了向研究会通报社委会的票决结果，还是不顾票决结果坚持己见？杜导正得到消息后，觉得问题严重，产生了对吴思的不信任。2012 年 2 月 1 日，杜老撇开吴思找杨继绳、徐庆全和胡竟成谈话，请三人再谈对这个方案的看法。

这段事实陈述，关键点是吴思和杂志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研究会私下勾兑，瞒过“炎黄”社委会，将改制方案提交新闻出版总署。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么的确会让人产生对吴思的不信任，说吴思是宋江就有事实依据。然而，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2011 年本人已在炎黄任职。改制经过也多次在社里讨论，有点印象，但上述事情完全不知道。看到杨文后，通过微信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吴思求证。吴思回复说：当时“炎黄”内部有两个改制方案，一个是他提出的（实际代表改制方案起草“五人小组”意见），另一个是财务总监胡竟成提出的；胡的方案是“炎黄”可以不要股份，让步太大，他不同意这个方案；但研究会提交的方案自己不知道，应该是研究会自己弄的，与社里的两个方案都没关系；至于“沙盘推演”，因为涉及他人，人家不便公开身份，如果说出来不能保证杨不会泄露出去，所以除非杨保证不泄露他才能说，而杨不做这样的保证。

按照吴思的答复，杨对吴思“投降”的指控属于猜测，与事实完全不符。我进一步要求吴思提供自己的改制方案以便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可能被指控为“投降”的内容，他找出了方案并转给我，另外也提供了他对杨文的批注，里面有针对杨文指控的相关事实。我向另一位同事张晓鸥要改制方案，他提供了多份，里面有一些包括杨在内处理经过的信息。

改制风波起自 2011 年 8 月中旬，当时官方进行非时政类报刊首批转企改制。“炎黄”接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发来的公函后，成立了转制工作小组，杜老任组长

（实际由杜明明负责旁听并转达），吴思任副组长，财务总监胡竟成、副总经理张晓鸥、办公室主任王海印参与，此外还有两位社外人士参与，一位是熟悉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来社里义务帮忙（不领工资）的社会知名人士陈越光，一位是杂志法律顾问阎军律师，其中吴思、陈越光、阎军、胡竟成、张晓鸥组成改制方案起草“五人小组”。杨继绳、徐庆全未在工作小组名单之内，可能是对企业制度不熟悉，也无兴趣参与。

“炎黄”自成立起就没有要过国家财政一分钱，本来就是自己打拼出来的，完全是企业化运作，人事、财务完全独立。所谓“转企改制”，本来不需要改，只要官方承认即可，改制可谓正中下怀。但是，官方可能不怀好意，是想利用改制机会，以参股的形式，控股进而控制董事会，名正言顺地操控人事、财务安排，由此操控内容，改变办刊宗旨和风格。这一招“依法依规”，在不动声色的情况实现对“炎黄”的接管，可谓妙着。

改制方案一到社里，同仁就感觉到可能又是对“炎黄”的一轮新的整肃。如果改制不能避免（全国一盘棋，不能例外），那么“炎黄”要争的就只能是控股权——占有不少于51%的优势股份。如果“炎黄”失去控股权，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也就失去了人事、财务的权力，用稿权也就失控。但是，如果官方得不到51%或以上的股份，可以不批准改制。因此，官方占据主动权，“炎黄”是两难处境：改，怕失控；不改，官方又说违规，可以在年审时不让通过，办刊就变成非法。

在这种情况下，杂志社内对官方的意图和杂志的应对策略产生了分歧。吴思认为转企是一个机会，可以使“炎黄”体制理顺，所以主张转企，并用自己的才智和人脉集中智慧、积极设计改制方案；其他人如杨、徐不参与方案的设计，但担心“炎黄”被收编。两者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道理。

事情拖着，直到有人告诉杜老研究会已经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了改制方案，而这个方案对炎黄相当不利。这时，就出现了杨文中出现的对吴思的猜疑，杜、杨、徐等人怀疑一直代表杂志社和研究会洽谈的吴思，瞒着大家把改制方案交了上去。而吴思自认并未将社里的方案（包括“五人小组”方案及胡竟成方案）提交给研究会。这就出现了重大误会。

研究会什么时候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交改制草案？时间是在 2012 年 1 月 7-15 日之间，当时吴思正在维也纳开会。研究会的方案的确参考了杂志社提交的材料，但应该是改制工作进展汇报（里面有“炎黄”一再强调的国家没投一分钱、没给一个编制的内容），而不是“五人小组”方案之类。

2012 年 2 月 1 日，农历正月初十，周三。周三上午是社里人员聚全的时间。徐庆全提供的信息是，当日中午“杜老撇开吴思紧急召集老杨、老胡和我商讨对策”。根据时间推测，杜老获知研究会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了改制方案，当在此前一两日。因为此前两日是 1 月 30 日，正月初八，单位开始上班。如果此前已获知信息，事情又如此要紧和急迫，初八就应召集杨、徐等人商议，而不会延迟至初十中午。徐庆全回忆，杜、杨、徐、胡四人会议过程中，就由徐起草一份公函，杨修改，杜老确认，当日就送给新闻出版总署，表示之前研究会提交的方案“没有经过社委会批准和职工大会的审议，是无效的”。

2 月 3 日，社里紧急召开社委会，以 2 票赞成、4 票反对、1 票弃权的结果否定了“五人小组”方案，改以胡竟成方案为基础，杜、杨进行修改。杜老并宣布解散改制工作小组。张晓鸥回忆，当日会议，陈越光陈述“五人小组”方案的合理性被杜老粗暴否决，自此后再未来社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2 票赞成的应该是吴思、张晓鸥，弃权 1 票是李晨，反对的 4 票是杜、杨、徐、胡。

但是，2 月 5 日杨在给社委会同仁的修改说明中说：“2 月 4 日中午杜老电话说，吴思说胡竟成稿件中把股权 100% 的让出去，更便于人家控制，吴的这个意见是对的。”这等于是说杜老也认为胡竟成方案有重大缺陷。“五人小组”的方案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来设计，而胡竟成的方案则是要求官方把“炎黄”的国有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换成企业营业执照。两者各有考虑，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护“炎黄”利益，但也都有缺陷。因为主动权在官方，很难有既能维护“炎黄”利益又被官方认可的完美方案。

缕清上述过程，再来看杨文对吴思“投降”的指控，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杨文在时间上先搞混了次序：杨文指控吴思“不顾票决结果”将方案提交给研究会，那么吴思将方案提交给研究会的时间当在 2 月 1 日四人会议之前，而社委会投票则在 2 月 3 日。还没投票，吴思又如何能“不顾票决结果”将方案提交给研究会？这样，杨文对吴思“不顾票决结果”的指控就是无中生有。

第二，陈越光是专业人士，“五人小组”方案实际是他和吴思主导，他来社里是某关心支持“炎黄”的大人物推荐过来义务帮忙，是来帮忙怎么会设计对“炎黄”非常不利的方案呢？2月3日会议陈越光向杜老当面阐述意见被否定后便不再来社里，可以想见他的心态。由此也可推知，假定研究会呈送新闻出版总署的方案就是“五人小组”方案，那也构不成吴思“投降”的理由。

2月9日，杜老用书法写了给社委会的“议事三原则”。杨在前述“吴思是宋江”言论中提及“设了三条原则，这是以前没有的，是为了对付吴思的”，可能是真实的，我听徐也如此表示过。因此，“议事三原则”的真正由来——至少是规则明确化，的确是改制风波的产物。

从事情经过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吴思所说并未将社内方案提交给研究会的话不实，那就只能证明对吴思“投降”的指控是杜、杨、徐等人的猜忌，对吴思是不公正的。

徐和杨最疑心的是“沙盘推演”，因为吴思对他们甚至社委会保了密。为了解开谜团，我希望吴思给我看记录，他同意了。根据他当时的记录，推演时间是2012年1月26日，正月初四。内容是吴思和对方，就杂志社和官方能够各自采取的策略进行攻防推演，对方透露官方的意图就是要利用转制的机会，合理合法地实现对炎黄春秋的控制，而控制的方式就是要通过控股和董事会布局。这和大家已经想到的是一样的。

我的观感是，推演的结果对“炎黄”相当不利，因为话语不对等，主导权在官方，“炎黄”除了宣布停刊这张王牌之外，实际上也没有可以阻吓官方的招数。

不过吴思作为当事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他对推演结果的总观感是：险胜。他认为推演的结果还是有赢面的，不认为对“炎黄”不利，而且他还有留有未告诉对方的后手。

尽管观感有所不同，但吴思在推演中想尽一切办法维护“炎黄”利益，没有任何“投降”的痕迹，这是可以肯定的。

而杨在猜忌的基础上，2014年11月5日在社委会扩大会议上说“吴思是宋江”，并在最近撰写的文章中仍然以“杜担心吴思利用手中权力和上面作交易”、“怕吴私下和上面妥协”、“吴思的某些做法失去杜多年对他的信任”为立论基础，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显然也不是公正的做法。

但从另外一面看，杨说“杜老不信任吴思，不是因为吴思的人品和学识，而是在应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压力上意见分歧”，我是认同的。本来，是出于认识不同，而在应对官方策略上有些分歧，既然 2012 年 2 月 3 日可以通过社委会民主投票否决吴思的改制方案并终止吴思代表杂志社与官方谈判的权力，而且“议事三原则”又已经正式化，那么到了 2014 年 11 月的转变主管主办单位风波中，同样也可以通过社委会民主投票的方式否决吴思的意见并终止吴思代表杂志社与官方谈判的权力，而无须采用“老人小组”来代替“议事三原则”，给“炎黄”的历史蒙上不光荣的色彩。

在对官方意图的估计上，我更赞同杨的判断（从风波一开始就持这种观点），而不赞同吴的分析。上文 2014 年 11 月 5 日吴思的发言，体现了吴思式风格和思维特点——条理化、缜密，有道理但未必就是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对官方要求变更主管主办单位的意图，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方面展开，认为普遍性（官方的全面性动作）是主要的，官方不是特意针对“炎黄”的，“离死还比较远”，即便从特殊性（控制“炎黄”）的角度说也只是收紧一步，“还没到死的地步”；结论是“普遍性占主导位置”、“离死还有很大一段”、“严重地夸大了过去的风险”。为了佐证分析，还以陆德说的某中央领导说党内对“炎黄”的看法有争议，认为还有生存空间、死不了。类似的信息，吴思也在编辑部提过。所以他的判断是“炎黄”不至于死。

杨文认为吴思“天真”，我基本上是赞同的。在我看来，即便从理论上分析，“炎黄”所做之事也是中共所绝不容许的，因为“炎黄”对历史真相的追究，揭露了中共的谎言，在中共看来是挑战乃至解构了其意识形态的。而维持谎言、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本来一直是中共的高压线，是绝不允许挑战的。“炎黄”能生存下来，是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特殊的宽松氛围和胡温本身相对温和的个性，加上“炎黄”背后的开明老人的勉力支撑，才终于摇摇晃晃维持下来。其间小风波不断、大风波一两年一次，只是相对弱势的领导人碍于老人的面子，加上怕社会影响，没有魄力下决心关停“炎黄”而已。所以“炎黄”能办一期是一期，躲不过就干脆主动停刊，是保持光荣的最恰当的选择。

但吴思一直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吴思。至少在 2014 年风波时，此前一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决议被吴思评价为

具有“浅蓝”色彩，他还参与了共识网周志兴等人组织的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一帮人准备量化观察改革推进力度，而当时的自由派确实也因此分化，很有一些人看好某领导人和改革前景；而 2014 年的四中全会，宣称要全面依法治国，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也有些让人乐观的东西。在这些背景下，2013 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及不久后“七不讲”流出和高瑜被抓事件，等等透露的严峻信息也会被冲淡。在 2014 年 11 月对形势有一定的乐观判断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直到 2017 年 10 月十九大期间，吴思还对形势保持乐观态度，当然他有他的理由。

因此，吴思的天真或乐观看法是基于他的个人观察和评判（而且政治波谲云诡，谁也不能说自己的估计就是对别人的估计就是错的），社内同仁不能以此认为他有“投降”的嫌疑，这应该是同事之间的基本信任问题。不能把认识问题提升为路线斗争，这更是同事之间应有的善意。也正是因此，在 2014 年风波开始之时，我并不认同吴思，某次和黄钟、徐庆全吃“散伙饭”时徐说了几个他认为吴思有“投降”嫌疑的事例我就表示不同意，而他表示希望大家“共进退”我则是认同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危机严重），当然之后徐只和杜、杨“共进退”而未与我和黄钟共进退，就只剩下我和黄钟共进退了。但到听说杨发表“吴思是宋江”言论之后，我就觉得这对吴思太不公平，而转过来支持吴思了。

就我目前掌握的证据，杜、杨、徐“废黜”吴思的想法，并不是从 2014 年 9 月份变更主管主办单位风波之后才有的，而是在此之前数月就在计划中了。其间可能与 4 月中下旬王晓林到杂志社告徐庆全“贪污 60 万”，导致矛盾激化有关。

王晓林告徐庆全“贪污 60 万”，但北京公安局刑警总队介入调查之后，没有认定贪污成立，所以我无从判断徐庆全是否真的贪污了。不过我在社内，曾经当着大家（包括徐）的面，提出社内应当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对指控进行调查，如果查出指控不实，那就发表一个公告，还徐庆全清白，而如果指控成立，那就应该宣布辞退徐庆全，因为“炎黄”为了自身清誉，不能容忍乃至包庇贪污行为。徐庆全说，在我辞职后，社内曾开会，杨主持，杜老参加，讨论对徐的贪污指控一事。讨论一开始，杨就提到了我上面的意见。讨论后“炎黄发了一个声明，其中否定了所谓贪污六十万的问题。”

徐庆全后来称吴思欠他一个道歉，因为其中有 5 万元从社内账中查出确有发票（即交公），而吴思此前认为这 5 万徐是贪污的了。对此，吴思回应：“我请胡老师（指财务总监胡竟成）查找收据，胡老师最初没有查到，只查到了奖励徐的记录。后来又查到了。在查到和未查到之间，这是一个疑问，不是确认。”

徐庆全还认为¹，王晓林到社里告状，是吴思和王晓林串通的，是吴思要逼他走，他和吴思在社内只能留一人，不是他走，就是吴思走。正是这个原因，他有动机夸大吴思的“投降”行为，为“废黜”吴思找到“正当”理由。而他的说辞，可能会影响杨和杜的态度，加剧杜老对吴思的不信任。²可能在此事影响下，杜老在 5 月份已经开始考虑重选接班人，准备从胡德平、胡德华中选一接班。但在王晓林到社里告状之前，2014 年 3 月 7 日，杨已经和李锐“谈到刊物内部也有人事矛盾关系。”

本人在风波之前对这些社内纠纷一无所知，之后了解到这些纠纷导致内部分裂并影响到“炎黄”的声誉而深感遗憾。

我曾问徐庆全与吴思的矛盾到底因何而起。他答称起自 2011 年，对吴思的不信任，除了改制风波，还有编辑部规则的由来、吴思擅自改变版权页排名等事，他认为从这些事上看出吴思有专断倾向。而在吴思一方，自陈对徐庆全有意见是因为徐任执行主编但不认真编稿、在版权页排名顺序问题上胡搅蛮缠、借用作者珍贵的历史资料不还等事。

关于编辑部规则——也就是前述“一人附议投票表决”的由来，杨文中有一段表述：吴任总编辑后曾多次要求有发稿权，但被几位执行主编抵制而未成，“因为是同人刊物，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总编辑的职能只是主持讨论业务的编务会议。”其中几位执行主编包括杨、徐和本人，也是 2011 年的所有三位执行主编。起因和我也有点关系——我曾因发不发一篇稿子和吴思发生矛盾。徐说自己也有文章和吴思发生矛盾。吴思提出执行主编不能毙总编（认定）的稿（即杨文所说总编辑有发稿权），三位执行主编都不同意，最后由当时在社内义务帮忙的陈越光主持，提出了前述“一人附议投票表决”规则，之后成为编辑部共同遵守的规则。

¹ 徐在阅读本文初稿后加按语：“不是我认为，是事实，杜老也明确和我说过：‘吴思是要赶你走的’。”

² 此处是本人的个人判断，含有主观成分。徐看初稿后对此不认同，认为这是推测，但其陈述的理由也多属推测，且事涉冗杂，故不赘。杨读初稿后未对本人上述判断提出疑问。

在我看来，内部民主规则没有成为刚性机制，是“炎黄”后期倒退到“老人体制”的重要原因，这个道理和民主转型中民主没有巩固而出现倒退的机理是一样的。而“议事三规则”没有成为刚性机制的主要原因在杜老。

李南央在阅读本文初稿后有一个批注，说到了问题的根本：“议事三原则”没有经过社委会签署，“所以既是杜老一人所写，也可由他一人推翻——这也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无人可以用此‘规则’来对杜老推翻它的行为进行约束。”这就涉及到了作为社内最高规则（等同于宪法）的“议事三原则”，不是经过社委会讨论、投票产生的，在“立宪”程序上就有先天不足。而在“废止”上也是杜老一个人说了算。2014年11月2日，吴思向社委会一些成员表示：杜老宣布危机关头议事三原则暂时取消，“问题在于，他的宣布又没有经过社委会讨论决定的程序，不符合公认合法的决策程序。”吴思声明：“取消议事三原则，必须经过社委会讨论通过才有效。”

张晓鸥回忆，杜老宣布暂时停止“议事三原则”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9日周三上午的社委会上；而过往杜老个人曾经多次否决过社委会的决定。由于“议事三原则”并不像编辑部“一人附议投票表决”规则那样是集体讨论民主产生，后来也得到了大家的遵守（2014年12月以后大概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它的立废基本上是杜老的一人意志。这个特殊机制导致规则能否发生作用主要看杜老是否英明，而这又有点像儒家思想寄望贤明君主一样。杜老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民主作风，非常值得尊敬，但他毕竟是长期受党文化熏陶的老人，要求他和年轻人一样依照“罗伯特议事规则”¹那样讨论和处理问题，要求未免太高。由于中共本身不守规则，完全按现代文明规则去应对很可能是无效的，而杜老使用的一些党内斗争的经验反而奏效。如果这些经验只用于外而不用于内，那是最好不过，但这就要求特别高的德性，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¹ “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来自美国人亨利·马丁·罗伯特1876年编撰的一本书《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这本书经过多次修改再版，2011年出了第11版。其内容是有关于会议的种种技术细节的规定。有专门讲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规则，有针对会议秘书的规则，而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针对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的规则，辩论的规则，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能够有条不紊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用规则来压制各自内心私利的膨胀冲动，求同存异，然后按照规则表决。这种规则及所设计的操作程序，既保障了民主，也保障了效率。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在洞彻人性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琢磨而设计的。正是这种对细节把握得精致完美的规则，才最大化地实现了公平与效率。（本刊摘自百度百科，最近登录时间：2018-12-14）

“炎黄”的教训：自由派自觉提高德性才有可能为宪政奠基

老“炎黄”在“新时代”必然灭亡，这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疑义。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整肃，中国大陆的自由派声音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共平台。所以“炎黄”之死是政治封杀造成的，与内部分歧的关系并不大。当然，老“炎黄”后期如果能够做得更加漂亮一点，“炎黄”的历史会更光彩些，但最终留下了“遗憾”，这是不能回避的、应该反思的一段历史。

按照杨、徐的说法，“炎黄规则”（包括“议事三原则”与“一人附议投票表决”规则）的由来，都是针对吴思的权力的——吴思集常务社长、总编辑、法人代表于一身，权力过大，需要分权和制衡。如果从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来说，这的确符合民主宪政的精神。但至于所谓限制吴思权力也有点扯，因为吴思本不是“炎黄”的实际权力最高者，实际权力最高者是杜老。

已故宪法学家蔡定剑说：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炎黄”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炎黄”顾问李锐多次在“炎黄”会议上提他的最大心愿是“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也代表“炎黄”编者的一致心愿。追求民主宪政的人，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民主宪政的精神？精英要影响大众，必须言行合一，以身作则，以自身对民主宪政精神的履践，来感召大众。如果精英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那么其所倡导的东西也会失去对大众的感召力——因为既然你自己都做不到，又如何能要求别人去做？从对转型的历史责任来说，包括“炎黄”在内的自由派是需要反省、反思自己的言行的。在此意义上，“炎黄”作为追求民主宪政的一个阵地，尤需以反省、反思树立表率。

不管以前如何，也不管确立“议事三原则”与“一人附议投票表决”规则的原因为何，但既然已经确立了这两项规则，那就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需要共同遵守的，“炎黄”同仁应该以这些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认真履践，以自己的行动来践行民主宪政，为知识界树立典范，也以自己的行动来达到大家的期待。但显然，“废黜”吴思的程序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谁都会联想到“废黜”胡耀邦的中共党争往事，而“炎黄”后期的表现也摆脱不了“老人政治”的联想。这是让人遗憾的。

民主宪政是从确立符合人性要求和平等权利的规则开始的，对规则的遵守则是民主宪政能够存活和不断完善的前提。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从“五月花号公


约”起步，立宪会议正式确立。美国宪政的确立，既依赖于立宪先贤的伟大智慧，也依赖于立宪先贤的伟大胸怀，尤其是华盛顿坚决不做国王的伟大德行。

在 2014 年 12 月 18 日提交给社委会的辞职信中，我写了一段关于民主转型和精英德性关系的话，强调要“从世界民主转型经验的角度看待《炎黄春秋》的历史地位和大家在《炎黄春秋》的作为”，里面写道：

从世界民主转型经验来看，英国转型顺利，法国转型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精英的德性有差别。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精英的德性将决定现代转型是否顺利。英国精英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德性——诸如理性、有条件的妥协、讲规则、遵守民主程序等等，是英国宪政制度得以逐渐成熟，没有退步和反复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法国精英在这些方面远不如英国精英。

信中我列举了杨继绳不守规则的例子，并表达了对风波中已有规则被破坏的不满：

既然认同民主宪政，指责别人不搞民主宪政，那么放到自己身上就应该按民主宪政的规则办事，用行动去实践之，这样才能显示对自己主张的真诚，否则岂非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吗？这就是我说的精英的德性问题，中国现代转型的困境，与精英德性不足，是有很大关系的。认同一种价值，却不去起而行之，甚至背其道而行，这样岂不是重新陷入传统政治的争权夺利的怪圈之中吗？

在我看来，“炎黄”后期作为给中国转型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要想民主转型成功，自由派（不限于“炎黄”同仁）要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德性，让自己的言行与所追求的理念合而为一，自觉让自己受到规则的限制，如此才有可能为宪政立基。 

【专稿】



作者简历：

湖北省浠水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原新华社高级记者，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1998年）；《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1999年初版，后多次修订再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初版，2010年出修订版）；《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2008年初版，现再版16次）；《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和出路》（2010年）；《中国名人政要访谈评论集》（2013年）；《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2016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经济评论数百篇。

对《炎黄春秋》的一些回忆

——兼谈李南央女士的《〈炎黄春秋〉的遗憾》¹

杨继绳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出现了对炎黄被收编进行反思的文章，但是，有的文章没有把炎黄的被收编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制度和宏观政治环境，而是从炎黄内部找原因。如炎黄内部不团结，内部缺乏科学的游戏规则、杜导正搞“老人政治”等。当然，内部的教训可以总结，但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是炎黄圈外人，不了解炎黄内部情况，难免与实际情况有差别。我在炎黄春秋担任12年副社长（一度兼任总编辑），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情况²。

¹ 此文“征求意见稿”曾发给吴思、南央、丁东、李晨、徐庆全、杜明明、王海印、胡竟成、赵凡响、黄钟、洪振快、王彦君、吴伟等当事人，请他们审查。这些人都有回复，都提出了修改意见，此定稿吸收了各位的意见。

²，这篇文章主要记述2003年以后的情况。2003年以前的情况请看刘家驹：《【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她的“虚无主义”》。

炎黄春秋被收编和杂志社的内部矛盾

任何一个单位都难免有内部矛盾。炎黄春秋杂志社内部也是如此。1991年到2002年是老一辈人合作（杜导正、方实、洪炉、宋文茂、徐孔、刘家驹、刘家驹等），内部矛盾也存在，导致总编辑洪炉辞职，宋文茂、徐孔之间也不太愉快，但这些内部矛盾没有影响炎黄春秋的发展，更没有使炎黄被收编，发行量逐年增长¹，社会声誉越来越高。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虽然不断施加压力，但这些压力只表现在对某些稿件的批评，没有从体制上对炎黄进行改组。

到2010年以后，就从体制上施加压力了。炎黄的主管单位原来是文化部，2004年，文化部不愿做主管单位，炎黄春秋就没有“婆婆”了。在中国的报刊管理体制中，没“婆婆”的报刊不允许存在。经杜导正等老人多方努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主持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同意当主管单位。但是，该研究会不是国务院直属，不具备当主管单位的资格。费老和杜老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中宣部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同意由炎黄研究会“暂时主管”。这一“暂时”就十几年，如果没有变化，还可以“暂时”下去。

研究会比较宽松，不干涉编辑事务，派来两位审稿老先生也很随和，基本没有否定过编辑部的稿件。这期间炎黄发了很多影响大的稿件，发行量由2003年的三万多份增长到2015年的近二十万份。

费老逝世以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接任研究会的会长，许会长开始不太管炎黄的事，常务副会长张文彬对炎黄很宽松。后来，张文彬病倒，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又收紧了控制。2011年9月，研究会提出了收编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股份制：研究会成立一个文化公司，炎黄春秋是这个大公司下属的一个小公司。还有给钱、给较多股份的承诺。对股份

¹ 2004年第8期邮局发行数为34663册，比2003年的第8期31686册增加了2977册。（《炎黄春秋》杂志社办公室：《情况反映》，2004年7月19日），在邮局发行之外，还有自办渠道发行，自办渠道发行量早期较少，后有增加，到2014年约为邮局发行量的三分之一。到2014年，总发行量近20万册，90%以上的读者自费订阅。一份杂志多人阅读，近20万册读者近百万人。

制，炎黄春秋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吴思对搞股份制有很好的期待，认为可以实现民有资本控股，从而取得发稿权。杜老怀疑股份制方案。杨继绳坚决抵制。吴思多次和上面商定方案，和研究会搞“沙盘推演”，有的事还对社委会保密，也对杜老保密（吴思在本文征求意见稿的此处批注：“一个副会长和我做的沙盘推演。他现在还是副会长，叮嘱我不要说他的名字，不然他就没法在研究会工作了。”）。这影响了杜老等对吴思的信任。后来吴思将股份制方案提交社委会讨论，社委会意见分歧大，只好投票表决。社委7人，2票赞成（吴思、张小鸥），4票反对（杜导正、杨继绳、徐庆全、胡竞成），1票弃权（李晨）。吴思提出的股份制方案被社委会否决了。

但是，研究会无视炎黄社委会对股份制方案的否决，还是将这个方案上报了新闻出版总署。与研究会上下达的任务是吴思分管的。杜导正得到消息后，觉得问题严重，加深了对吴思的不信任。2012年2月1日，杜老撇开吴思找杨继绳、徐庆全和胡竞成谈话，请三人再谈对这个方案的看法。杨继绳说：民有经济不能进入媒体的内容管理，顶多是参与经营。即使民间资本占有大的份额，编辑部也不会有自主发稿权，并认为搞股份制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吃掉”炎黄的手段。徐、胡同意。杜导正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名义给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人蒋建国和柳斌杰发公函。函中说：

“听到可靠信息，现在《炎黄春秋》主管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几天前给新闻出版总署上报了有关炎黄春秋杂志社改制方案的报告。

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经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同意，甚至没有给我们社委会看过这个报告。

炎黄春秋是个独立的法人单位，杂志社运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杂志社社委会，根据报刊改办（2011）6号文，转制方案更要上下‘充分协商，达成共识’，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这个报告，陈述的现状多数符合杂志社的实际情况，但是说我们要立即与研究会同共同建立什么股份制公司之类是不符合实际的，况且没有经过社委会批准和职工大会的审议，是无效的，很不合适的。……”

上面不答复社委的报告并继续催促股份制改制，杜老采取拖延策略。他说：“上边催改制，就推给我。他们找我，我不去。他们来，我不见。他们非要见，我骂他们。”杜老还宣布停止吴思为组长的改制小组的工作。股份制方案被搁置了。

这就是2014年出现“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和“玉碎”（宁可玉碎，不可瓦全）两种看法的背景。

“青山派”也是出于继续维持炎黄的好心，但对当局的态度估计和“玉碎派”不同。随着意识形态收紧，炎黄的处境越来越难。杜导正提出成立应急准备小组，先让吴思负责，后又让杨继绳负责。杨提出应急方案：一，每一期都按最后一期办，把重要稿子发出去；二，准备一篇有份量的《告读者书》，待被迫停刊时发出；三，收集从创刊到现在一整套《炎黄春秋》杂志，印出销售，随销随印，为社会留下完整的杂志；四，财务上准备为靠炎黄春秋杂志工资吃饭的职工（有退休金的除外）生活安置。

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认为研究会太宽松，没有尽到管理职责。2014年7月（待核），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出面召开四部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炎黄收编。2014年9月18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用正式公文通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限令炎黄在两个月内完成调整，将主管部门从原来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否则便吊销执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某些人、解放军报网等对炎黄发出了集中的攻击。两桩因稿件引发的官司也被起诉。炎黄的命运迅速引来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担忧。吴思认为，转变主管单位是正常的机构调整，是新闻出版总署推动的，与中宣部无关，不要夸大对方来头，不要把矛盾激化。杜导正、杨继绳、徐庆全等认为这是“收编”，是“吃掉”，坚决抵制。杜一方面通过老人们大造舆论，另一方面拉胡德平、陆德来撑持局面（杜老此举没有同吴思商量。）胡德平口头答应，但没上任。陆德上任后一些言论和建议炎黄人不接受。陆德说上面有人阻止他到炎黄任职。陆告诉杨：一位中央领导人对他说，到炎黄任职当心“一脚踏空”。杨劝陆：你已退休了，是普通百姓，即使“一脚踏空”落差很小，摔不伤。陆还是不辞而别。

上面要求收编的压力不断加大，“青山派”和“玉碎派”矛盾激化。杜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集中权力，由几位顾问（李锐、何方等）决策。在这之前杜基本放了权，由吴、杨、李管理社务。

有网文说，如果杜导正不在“危机”来临时废止社委会议事三原则……“炎黄”的死会是非常壮烈和绚烂的。还有人认为炎黄的结局与废止议事三原则有关。也有人认为吴思退出炎黄是因为废止了议事三原则。他们说的“议事三原则”就是杜老写的挂在墙上的几条：第一，重大问题（人事、稿件、财政）意见一致，通过执行；第二，重大问题（如第一条，下同）意见不一致，不急，下次再议，但事不过三；第三，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但事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执行，少数可保留意见。

这三条是杜老多年担任领导工作的经验。2012年，吴思提出的股份制方案正是社委会按议事三原则中的第三条被否定的，但上面不理睬炎黄社委会的决定。可见议事三原则不影响炎黄的存亡。我没听到杜老宣布“非常时期暂停议事三原则，由三老代替社委会职能”（可能我在医院），即使杜老说了这样的话，停止的是社委会的职能（包括杨、李、徐、胡、张），不是单指吴思。吴思被授权与被停权与议事与三原则无关。吴思被停权的根本原因是失去了杜老对他的信任。杜老不信任吴思，不是因为吴思的人品和学识，而是在应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压力上意见分歧，即“青山”和“玉碎”的分歧。

将议事三原则解释成炎黄春秋的游戏规则，不符合炎黄的实际情况。

2014年11月5日，杜老在李锐家召开了几位老顾问会议（陆德参加了，杨和吴没有参加），几位老人作出了糊涂决定（如设两个总编辑等）后到金枝玉叶酒店召开全体会议。杜宣布决定的话音刚落，杨继绳就反对，说此方案不可行（网上说杨以“新任总编辑”的名义发言，当时杨根本没有接受总编辑一职，更不会用此名义。）吴思发言说，改变主管单位与中宣部无关（吴思2018年11月13日读本文征求意见稿时写道：“我们被划归文化部下属的艺术研究院，即使叫收编，也是被文化部收编。背后的实际操作者是新闻出版总局的党组书记蒋建国，而杨老师却一口咬定中宣部。上次转企改制，主要推手也是蒋建国，

是新闻出版署，杨老师也一口咬定中宣部。），说杜老反应过度，把矛盾激化了。杨反对吴此说，一时激动说出了吴是宋江的不当的话（事后杨向吴表示歉意，称此言不当），徐庆全又激烈地发言批评吴思在改制中的做法。会议中间吴思愤怒地提包离开会场，第二天外媒就报道吴辞职。杨继绳听外媒报道后立即给吴打电话，劝他不要辞职，吴不听。青山派“玉碎”了，玉碎派不得不留下应付与抗争。杨留下半年多，杜老、胡德华、徐庆全、王彦君、丁东等留下一年多。

2016年7月，当局以强暴的方式收编了炎黄。收编者表示留用部分员工，但是，炎黄人宁可失业，也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他们牺牲了利益，保住了气节，真可谓玉碎。

由上可见，炎黄被收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所为，与炎黄内部矛盾没有关系。也不是因为杜老废除了什么“议事三原则”。但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压力加剧了炎黄内部矛盾。即使如此，炎黄人还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吴和杨虽然在对付上级有不同看法，也为此有过争论，但一直保持朋友关系。

炎黄春秋被收编和杂志社的内部管理

有一种说法，如果炎黄春秋内部管理好，有一个科学的游戏规则，也不至于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炎黄有游戏规则：炎黄是社长负责制，社长、副社长是领导核心，吸收总编辑和财务总监、网络总监组成社委会。黄春秋社委会是杂志社的权力机构。总编、副总编（在徐庆全2011年任此职之前没有设过副总编这个职务）、财务总监、网络总监在社委会领导下工作。最后五年的社委会成员：杜导正、吴思、杨继绳、李晨、胡竞成、徐庆全、张晓鸥。杜一个月来一两次（有事时多来），日常工作由社委会商量决定。重大问题请示杜，社委会意见不能统一由投票决定，或请杜协调。总编辑没有发稿权，不能决定发什么稿、不发什么稿。在吴思之前没有总编一职（洪炉曾任总编，他走后就不设此职）。2005年吴思由执行主编提为副社长进入了领导层。2007年，杜选吴思任常务社长、总编辑，才再设总

编辑一职。吴任总编辑后曾多次要求有发稿权，但被几位执行主编抵制而未成。因为是同人刊物，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总编辑的职能只是主持讨论业务的编务会议。

稿件流程：几位执行主编轮流负责一期的组稿、编辑。（2003年以后吴思、杨继绳、李晨、徐庆全、洪振快、黄钟、王彦君、丁东、杜明明、冯立三等都先后担任过或兼任过执行主编。）执行主编实际是轮执责任编辑，对他不轮执的其它几期的稿件有发言权、表决权。两位终审对稿件负最终责任（早些时间是徐孔、杨继绳，徐孔逝世后是吴思、杨继绳）。执行主编编辑定后交终审审定。在编他这一期过程中，与这一期的终审随时沟通。

每期稿件编辑部讨论三次，讨论会由总编辑主持。第一次由这一期的执行主编通报有哪些稿件，每篇稿件的主要内容、亮点、险点。与会者提出问题。第二次讨论落实第一次讨论提出的问题，基本定稿。第三次讨论主管部门派人参加，带走他认为风险较大的一两篇稿件回去审定。杜老通常不参加编辑会，意见不能一致就投票决定或由杜仲裁。每次讨论责任编辑主讲，终审补充，大家发言。编务会议畅所欲言，不论是社长的稿子还是责任编辑的稿子，都一视同仁，有时发生争论，但事后不计前嫌。

这样的工作流程（也可以称为游戏规则）对落实炎黄编辑方针、提高杂志质量很重要，但对炎黄存亡不起决定作用。在中国这种制度下，主要是如何应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打压。这是任何内部的游戏规则不起作用的。2000年以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炎黄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危机。炎黄人团结一致应对危机。为了控制风险，上级要求每期送上两篇稿件报批，但报上去审批的稿件，绝大部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2014年危机加剧，炎黄内部的“青山”和“玉碎”两种看法的分歧也随之加深。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可能“留得青山在”，只能“玉碎”。（吴思读此文征求意见稿批注：“胡舒立的财新，还有财经，报道的领域，比我们管得还严，至今依然活着。炎黄春秋有没有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炎黄春秋被收编和所谓“老人政治”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创刊时，用的是《烈士传》编委会旗下刊物《中华英烈》的刊号。

《中华英烈》由党史研究室主办。刊号为82-165。1989年全国整顿报刊时，因党史研究室已有党史研究刊物，不再承办《中华英烈》。《中华英烈》编辑部希望炎黄文化研究会作为它的主管单位。

1990年11月2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文化部报送《关于接办【中华英烈】杂志的申请报告》，11月25日，执行会长肖克在这个报告上签署：同意。最好快点办理。11月28日，会长周谷城在这个报告上签署：同意我会接管此刊物。研究会的这个申请报告上写明，研究会派遣人员组成《炎黄春秋》杂志编辑委员会。事后，文化部向新闻出版署申请准予登记（文办函〔1991〕107号）。

1991年研究会任命的炎黄春秋工作人员名单；社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杜导正、方实、丁洪章、洪炉、徐孔、杜卫东。社长兼法人代表：杜导正。副社长：方实、丁洪章、宋文茂。总编辑：洪炉。总经理：徐孔。1991年7月1日《炎黄春秋》创刊。

策划办刊过程中肖克（开国上将）、杜导正（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李宝光（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冯征（总参政治部主任）、方实（延安干部、原新华社党组成员）、温济泽等老人起了重要作用。

杜导正1937年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任《晋察冀日报》记者、解放军二十兵团新华社分社负责人。1949年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1959年，因反映广东农村的真实情况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多次批斗。改革放以后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社长、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为人热情，积极主动地与多位高层人士联络，努力为炎黄营造生存空间。

炎黄的编委会由党政军中的高级干部和著名学者组成。先后担任编委的有：凌云（原

国家安全部部长）、冯征、李宝光、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绩伟（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冯健（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温济泽（延安干部、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曾彦修（原人民出版社社长）等。

一些国家级领导人给炎黄题词，成为炎黄的高层支持者，如杨尚昆、薄一波、张爱萍、费孝通、习仲勋、李德生等。

炎黄的作者中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和著名学者，如李锐、师哲、温济泽、凌云、肖克、莫文骅、李德生、伍修权、薄一波、楚图南、张岱年、楼适夷、于光远、吴象、周谷城、戴煌、刘西尧、苏双碧、秦川、叶笃庄、申泮文、吴敬琏、季羨林、王光美、李普、任仲夷、胡绳、李慎之、韦君宜、吴江、谢文清、邵燕祥、王若水、熊向晖、马识途、袁鹰、张劲夫、白介夫、资中筠、胡启立、田纪云等。

炎黄的中坚力量、支持者是一批有民主思想的老人。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他们中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镇压学生，因此一度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杜导正因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中的鲜明态度被免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因同样的情况，李锐、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原国务院农研室主任）、李昌（原中纪委副主任）四位中顾委委员挨了批，差一点失去了党籍，被聘为炎黄顾问。于光远逝世、杜润生重病，增加何方（原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曾彦修为顾问。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这一批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理论、道路、制度进行反思，主张民主法治，希望讲真话、讲实话，客观地总结中共革命和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共同的理念使他们聚集在炎黄这家杂志之中，大力支持和维护炎黄这块党内开明派（民主派）的舆论阵地。

有人批评炎黄“老人政治”现象，是的，老人对炎黄的存在的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这与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传统有关。但这与知识界批评高层某些老人压制改革力量的“老人政治”不是一个概念。区别就在于：对改革是压制还是保护。

经历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中国，形成了官本位的传统。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老人的社会地位和退休后的余威形成了一个无形的保护罩。意识形态的控制者们，每次下手压制炎黄也得有所顾忌。何况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职领导人很多是这些老人提拔上来的。有朋友将《炎黄春秋》视为在有“政治特权”的老人保护下的一个“政治特区”。这一说法不准确，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实际。

老人们的支持和保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和历史潮流。进入21世纪，渴求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这种呼声在炎黄与读者的关系有着鲜明的反映。近20万册炎黄杂志90%以上是自费订阅的，读者每月都期盼新一期杂志到来，有些地方一些老干部组成“《炎黄春秋》阅读小组”，杂志一到就集体阅读、讨论。一大批青年读者对炎黄也是趋之若鹜。炎黄编辑部门庭若市，一些热心的读者不远千里到杂志社来谈谈心，照个像。

不过，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下，依靠老人而形成的“政治特区”是很脆弱的。炎黄编辑部深深知道这一点，只能小心翼翼地“踩钢丝”。杜导正主动提出“八不碰”来自律：不碰“六四”，不碰三权分立，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不碰民族宗教，这是将一碰即死的内容列入负面清单，是用来应对新闻出版总署的“十五条”¹。

这个负面清单一度被上面接受，从而在选题上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领域。

老人们组建了、保护了这份杂志，但老人有他们的局限性。老人们来自体制内，他们习惯了体制内的做法，缺乏现代制度建设的经验和知识，也没有建立现代制度的渴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做法，用现代管理制度来要求炎黄，是对老人的苛求。吴思曾经拿出罗伯特议事法则跟杨继绳商量，问能不能在杂志社实行，杨继绳回答说：“等你完全接了杜老的班之后可以实行。”

¹ 即《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1997）860号）。这个“办法”列出15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备。“15条”几乎覆盖了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凡是近、现代史专业的刊物，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备案。上报备案后，待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后才能够发表。这些条报备范围，每一条都界限模糊，无法操作。

另一方面，炎黄的做法并未超出当时报纸杂志的一般规范，相反，在体制机制上尝试了“同人刊物”的一些办刊理念。杂志社员工对杜老是尊重的。很多事他拿主意，编辑部有时意见分歧不能统一，请他仲裁。但是，杜老在炎黄内不是一言九鼎。很多事是商量着办。杨继绳曾几次顶撞他。有一次，徐庆全拿来一篇稿子，是赞扬山西张怀英的，还限期什么时候发表，要购买200本杂志送到什么座谈会上（大概是对张怀英的追思会）。张怀英是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因在文革中的表现文革后被开除党籍（据说是胡耀邦批的），这篇文章却把他写成“高大全”的人物。杜老同意发，杨继绳不同意。二人发生争执。杨继绳找吴思（他了解大寨的情况），希望他支持，吴思不表态。杨继绳只好再找杜理论，杜老还是坚持要发，两人争论很激烈。杨继绳对杜老说：你要发我就不干了，说完提着包就走。杜老说：你别走，你怎么一点妥协精神也没有？杨继绳没走，就给熟悉山西情况的吴象、马明、范银怀打电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不能发。杨继绳转达了三人的意见，杜老最终同意不发。

在人事问题上，杜老掌握着谁当社委会成员的决定权。杨继绳2003年加入炎黄，任副社长。当时的副社长有方实、徐孔（解放军20兵团新闻干事，右派平反后参与创办《农民日报》，后任《中国食品报》副总编）和杨继绳。2005年夏天，88岁的方实病倒了，需要补充一副社长。过了一段时间，杜老选定了吴思，从此，吴思在炎黄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干。

在中国这个条件下，所谓“老人政治”是炎黄存在的一个保障，但也有它的弊端，借某种中央精神或中央领导人的一句话做保护伞，靠“大佬”和“高官”身份撑腰，毕竟不是现代社会的作法。正如叶维丽教授（副社长方实的女儿）说的：“官家气，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根源复杂深重，我们不能苛求一家杂志，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炎黄春秋》的局限性。随着老人们生理生命的逐渐终结，《炎黄春秋》也会难以为继，作为‘政治特区’，它没有可持续性。”

考虑炎黄的持续性，选好杜老的接班人是紧迫的事。2007年8月，杜老任命吴思为总编辑，常务社长。2008年5月，杜老安排吴思为法定代表人。让吴思接班的意图很明朗，当时大家

松了一口气。但是三四年以后，由于应对上级收编的看法不一样，吴思失去了杜老的信任。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2014年8月，杨继绳在宣武医院住院，杜明明搀扶杜老到医院看望。杜老在病床前很认真地对杨继绳说：“我年纪大了，你能不能把炎黄春秋的担子挑起来？”他提出让杨担任社长。杨继绳立即回答：“不行。”杨讲了三条理由：一，我由于写书写文章，惹怒了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已被列入了黑名单，让我挑担子会增加炎黄的风险；二，我脾气不好，不善于和上面打交道，如果遇到上面不讲理的情况（这是常有的），会和上面吵架，可能把事情搞砸了；三，我已74岁了，上面有规定，过了70岁的退休干部不能在社会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此外，我的一本书（文革史）还没有写完，没有精力管更多的事。事后，杨继绳担心杜老坚持他的意见，又给杜明明打电话，重复这几点意见。还给李晨打电话，也讲了这几点意见，要求她如果杜老在社委会提这件事，请帮杨继绳顶住。不久，杜老目光转向红二代，想让陶斯亮、胡德平当社长。陶斯亮不同意，就选胡德平了。胡德平曾口头同意，后说办不了转职手续，不能来了。因此接班人一度处于空置状态，直到2016年4月，才说定了请胡德华来担任副社长、社委会成员。

2016年炎黄终于“玉碎”。如果把这个结局归结到炎黄内部的“老人政治”，显然与事实不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主张宪政民主的炎黄，它的内部的制度建设再完美，再现代，它的队伍再年轻，也逃不出被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收编的结局。

对《炎黄春秋的遗憾》的遗憾

南央女士在电子刊物《记忆》236期（2018年10月15日）上发表了题为《〈炎黄春秋〉的遗憾》一文。发表前她将“征求意见稿”发给杨继绳。杨继绳读后回复说：“炎黄灭亡是大形势的必然，在这种大形势下炎黄是不可能存在的，是当局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炎黄同人要统一对外，不能挑起内部纠纷。你这文章一发表，可能会引起炎黄同人的内部纠纷。”还说：“黄内部矛盾复杂。现在炎黄已灭亡，留下了光荣的历史，不要再翻腾内

部矛盾了。翻腾出来，会伤及炎黄人，也会伤及炎黄人之间的感情。”“你已经著作等身了（换成竹简，不是纸质），已经有‘生前身后名’，希望这一篇增加你的荣誉而不是给你留下遗憾。”然而，《遗憾》还是发出来了，它给作者留下的是荣誉还是遗憾呢？可能会增加荣誉，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

《遗憾》在谈到2012年上面想用股份制的方式收编“炎黄”一事中写道：“吴思认为如果在转企改制中能争取‘炎黄’占到多头股份，再吸收一些跟‘炎黄’同气相求的私人企业和个人入股，这样‘炎黄’便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名正言顺地控制杂志。搞股份制就有了董事会，以后上面再压‘炎黄’：不许登这篇文章，不许做那样的事情……就可以以董事会的名义告诉上面：董事会以外的力量不能干涉‘炎黄’的经营。试想，在全国所有报刊都是国有的，民营资本不得进入，都受中宣部控制的情势下，‘炎黄’若能做成由股东们控制的杂志，头顶上有了公司法的保护，是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大好事呵！”

如果2012年上面要求搞股份制时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为天真；那么，2018年，炎黄被强制夺权已成为事实，《遗憾》还认为“我当然不认为吴思软弱，同意他的做法。”，那就不顾事实了。这是令人遗憾的。

吴思搞的股份制方案2012年被“炎黄”多数票否定以后，2018年《遗憾》还说：“到了2014年更换主管单位的危机到来时，好多人方才恍然大悟，发现2012年‘转企’那一步没有走是错了。要是2012年‘炎黄’变为企业——一个独立的由股东控股的企业，根本不存在主管单位的问题了。”请问南央：“哪一位炎黄人恍然大悟”了？哪一位炎黄人“发现2012年‘转企’那一步没有走是错了”？杨继绳当时身在炎黄，没有听说这种看法嘛！

（2018年11月13日吴思阅读本文征求意见稿在此处写道：“我就是一个啊。还有别人，未经同意不好点名。”）2018年的中国，能让“一个独立的由股东控股的”政论性媒体存在吗？南央长住美国，对中国情况太不了解了。这更令人遗憾。

在对待中宣部收编“炎黄”这件事上，“炎黄”内部从2012年直到今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青山派”和“玉碎派”。2016年炎黄被当局当以粗暴的手段强制收编，原来

的《炎黄春秋》已不存在，《炎黄春秋》25年的存在和当年她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光辉一页。当时的所谓“青山派”和“玉碎派”是“三观”基本一致的朋友，都被边缘化，都是受害者，他们应当团结起为中国实现民主化而奋斗，再讨论“青山”和“玉碎”的分歧不仅于事无补，还有损当年共同奋斗结成的友谊。《遗憾》一文站在偏颇的立场，褒“青山”，贬“玉碎”，损害炎黄人之间的友谊，这样的文章难道不令人遗憾吗？

2018年12月6日

附一：

我对强行收编《炎黄春秋》的态度¹

杨继绳

8月15日以后我因生病没有上班至今。从杜老和吴思的电话中得知一些情况。一些关心《炎黄春秋》的读者也给我打电话，告知不少情况。杂志社面临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参加杂志社的讨论，我得表明我的态度。

有关部门，事先没有与杂志社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突然下发红头文件，要求《炎黄春秋》在两个月内完成相关注册手续。还口头通知说，如果不按文件办理，明年就不给注册，杂志就得停办。这是以“转变主管、主办单位”之名，行收编之实。这样的事他们两年前做过一次，没有得逞。现在改变方式，故伎重演。他们这样做了，就为加紧对炎黄春秋的行政控制、改变杂志的编辑方针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炎黄春秋》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不同杂志社打招呼，强制性地收编，既对法人单位不尊重，也缺乏程序正义。

¹ 作者因前列腺做手术住院，是从病房偷跑出来参加会议，宣读此文的。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由萧克等一批党内外知名人士组建的，研究会和《炎黄春秋》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会作为《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是中宣部的一次特别会议确定的。这些年来，研究会很负责任地承担起了主管、主办单位的责任。现在突然要改变主管、主办单位没有任何理由。突然让一家正常运作的杂志改变主管、主办单位，是不是“锁在笼子里的权力”走出了笼子、迷失了方向？

作为一家历史类杂志，在发表的文章中，匡正了大量被歪曲的历史、揭露了很多被掩盖的历史，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推进改革、主张依法治国的文章。炎黄春秋发行 23 年，为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谐，作出了她的一份贡献。她已被中外读者视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讲真话刊物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老一代革命家高度肯定了这份杂志，如习仲勋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除了经济多元化以外，思想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思潮，这些思潮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争鸣。“万马齐喑究可哀”，思想活跃是中国进步的表现，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炎黄春秋》属于一种进步思潮，她主张自由、民主、法治，主张通过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走向宪政民主。有些人想扼杀《炎黄春秋》，阻止她自由表达，是与改革开放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宪法第 35 条给予中国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想通过改变《炎黄春秋》的出版方针进而扼杀《炎黄春秋》是违反宪法的。炎黄春秋同仁必须依法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炎黄春秋》的编辑方针是《炎黄春秋》的灵魂。如果有人企图用行政手段强制地改变《炎黄春秋》的编辑方针，《炎黄春秋》只能玉碎，决不瓦全。瓦全只会玷污《炎黄春秋》过去 23 年的光荣历史。当然，逼得《炎黄春秋》走向玉碎的官员们，必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笔很不光采的记录。历史是无情的。

2014 年 9 月 22 日

附二：

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时的两封公开信

杨继绳

2015年7月1日，我将离开《炎黄春秋》副社长兼总编辑岗位。离职前写下了《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现以公开信形式发表。

2015年6月30日

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

炎黄春秋社委会：

2015年7月1日，我将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并退出《炎黄春秋》杂志社。李锐、杜导正两位前辈和社委会对我一再挽留，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离开。在这里，向在《炎黄春秋》合作多年的朋友们告别，也向百万热心的读者告别。

我离开《炎黄春秋》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已经75岁了，又有多种疾病，难以承担总编辑这个沉重的负担。第二个原因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代表社党组找我谈话，用党的纪律要求我立即退出《炎黄春秋》。显然，这不仅是新华社党组的意思。我不能让新华社的领导人为难。第三个原因，去年四季度，总编辑、两位轮执主编和网络主编四人同时辞职，社委会让我担任总编辑，重组编辑部。我不得不临危受命。但我承诺只干半年。现在，半年已过，新组的编辑部运作良好，编辑工作已走上了正轨，我已经完成了社委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兑现承诺，决不恋栈。

《炎黄春秋》是一家讲真话的杂志。多年来，它匡正了不少被歪曲的历史，揭露了很多被掩盖的真相；它通过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经验教训，为推动中国进步尽


了一份力量。因此，《炎黄春秋》得到了百万读者的热心支持和高度赞扬。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炎黄春秋》还原历史真相，害怕真相的人难免有些恐惧。因此炎黄春秋经常遭到少数人的谩骂和攻击。谩骂、攻击没有使《炎黄春秋》退却半步。

我在炎黄春秋担任副社长12年了，要离开这里真有一点难以割舍的情怀。不过，我相信，我离开后，《炎黄春秋》还会按原来的编辑方针继续办下去。去年四季度，《炎黄春秋》四位台柱同时辞职，编辑部面临崩塌的危险。杂志社很快就重整旗鼓，在这以后出版的杂志更受读者欢迎。这说明，《炎黄春秋》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能够承受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有强大的民意支持。我对《炎黄春秋》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找我谈话，让我退出《炎黄春秋》，也是4月10日；几家极左报刊和网站，以姚文元式的文风，对《炎黄春秋》发起集中攻击，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不是巧合。时局变幻莫测，也许在将来某一天，在倒退力量的压力下，《炎黄春秋》不得不玉碎。玉碎不是毁灭。“纵死犹闻侠骨香”，它24年的历史，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将会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坚信，中华民族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扼杀不了的。一家杂志被迫关门，会有更多同类的杂志产生。

炎黄春秋始终凝聚着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为理想而奋斗，很少有个人的利益追求。在国内外影响如此之大、被列入报刊五十强的杂志，竟然没有独立的广告部，这是没有利益追求的一个佐证。有人说炎黄春秋杂志社某人有多少股份，某人持大股，对这种谣言，我只能付之一笑。

感谢社委会和全体编委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广大读者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朋友们，读者们，再见了，让我在这里向你们致以谢幕式的鞠躬！

2015年6月30日

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在即将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的时候，我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陈述。

2015年4月10日，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指出：“《炎黄春秋》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以后，2015年前4期共刊登86篇文章，其中就有37篇文章涉及重大选题，均未向总局报备。”“责令杂志社立即纠正违规行为，从2015年第5期开始……对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的文章做到应报尽报，全部履行报备手续。”

《警示通知书》要求杂志社的主管主办单位“督促杂志认真整改，对2015年第5期杂志选题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切实履行管导向、管干部、管资产的职责，强化对杂志社的日常管理”，“确保正确舆论导向”。

《炎黄春秋》编辑部认真讨论了《警示通知书》，认真讨论了下达《警示通知书》时两位司长的谈话。我们理解你们的行为是出于职守，但也有一些问题无法理解。

对有些文章为什么“违规”不理解

《警示通知书》附件中列出了37篇“违规”文章：《我所认识的贪官王守业》、《必须澄清的一桩重大事实》、《江青对公安机关怨恨的由来》、《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类矛盾——谈谈对当前反腐败的认识》、《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长沙知青大逃亡》、《再说吴江意外遭遇》、《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对法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件事》、《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自封的“半个红学家”江青》、《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探“高饶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九一三林彪要飞到哪里》、《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邓小平与“5·13讲话”》、《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1984年胡耀邦对文

艺工作的指示》、《顾骧谈思想解放运动》、《批判“资反路线”和陶铸倒台》、《我与【学习与批判】等刊物》、《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从“首都兵团”到中学红卫兵》、《林立果现象的历史追问》、《苏联末日实录》、《“准则”：重构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器》、《华国锋谈史传写作》、《从“邓小平论文艺”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冤案是怎样酿成的》、《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评【王力反思录】》。

我们认真研究了这 37 篇文章，不知道其中有些文章为什么“违规”。

《我所认识的贪官王守业》选自《张金昌将军回首往事》一书。张金昌这本书 2012 年出版，书中有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的《书敬张金昌将军：浩然正气》，有洪学智上将、张震上将为此书写的题词，还有赵南起、傅全有、王瑞林等多位上将与作者张金昌合影的照片。我们不理解，从这本书上选出的反腐败的文章，为何“违规”？

《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类矛盾——谈谈对当前反腐败的认识》是胡德平写的。胡耀邦讲话发表在 1986 年 7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胡德平这篇稿件在 2014 年 10 月 31 日在《新京报》上发表过。这篇文章为何列入“违规”？还有揭露江青的两篇文章、揭露张国焘的《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以及对基层的几篇调查文章列入“违规”，我们也不知所以然。

如果按 15 条报备，杂志无法办下去

《警示通知书》指出 37 篇“违规”，其依据是《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 年新闻出版署新出（1997）860 号）。这个“办法”列出 15 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备：

1. 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选题；2. 有关党和国家曾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关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选题；3. 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选题；4. 集中介绍政府机构设置和党政领导干部情况的选题；5. 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选题；

6. 涉及我国国防建设及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役、战斗、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选题；7. 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选题；8. 涉及中共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选题；9. 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其他统战对象的选题；10. 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选题；11. 涉及中国国界和各类地图的选题；12. 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图书的选题；13. 大型古籍白话今译的选题（指500万字及500万字以上的项目）；14. 引进版动画的选题；15. 以单位名称、通讯地址等为内容的各类“名录”的选题。

15条中的第1、2、3、4、5、6、7、8、9、10条几乎覆盖了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凡是近、现代史专业的刊物，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备案。上报备案后，待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后才能够发表。这些条报备范围，每一条都界限模糊，无法操作。

尽管如此，《炎黄春秋》还是尽可能地遵守这个“办法”。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月两篇文章报备。报备文章的结果怎么样呢？请看：

2010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报备稿总数的62%；2011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67%；2012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80%；2013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86%；2014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90%。总计：五年报备稿中不能用和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80%。没有答复的稿件中，有的两三年杳无音讯，如石沉大海。

这么大比例的稿件不能用和不答复，不是因为审查部门不负责任，而是审查工作有困难。稍有风险的稿子因怕负责任，宁可枪毙，也不愿放过。有些好文章不同意发，又于理不合，只好拖着不表态。如果所有的报刊和出版物都按15条报备，审批部门的工作量就太大了，他们怎能按期答复呢？

由于按这15条报备缺乏可行性，多年以前，《炎黄春秋》杂志社反复研究，摸索出了一个执行15条的变通办法，这就是杜导正社长归纳的“八不碰”：六四，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法轮功，现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民族问题，外交问题，等。“八

不碰”实际是一个负面清单，是新闻出版改革的一种成功的尝试。多年来，新闻出版总署和主管主办单位认可了“八不碰”，《炎黄春秋》才得以办下来。难以理解的是，4月12日，两位司长在下达《警示通知书》时表示，不承认“八不碰”，强调要坚持15条，这就使杂志进入了困境。如果按15条报备，不仅仅是《炎黄春秋》，恐怕所有的历史类杂志都无法办下去。

贵总局这一行为，使我们感觉到，与前年相比，现在更加收紧舆论了。如果按这15条要求，前几年会有更多的稿件“违规”。虽然当时新闻出版总署也曾就一些文章发出过几次《警示通知书》，但没有像这次投出“集束手榴弹”，显示如此强大的威慑力；多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没有否定“八不碰”，没有坚持15条。15条规定“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选题”必须备案以后才能够发表。前些年，《炎黄春秋》发表了多篇新华社驻“兄弟国家”的首席记者的文章，都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也没有人说“违规”，为什么现在要大踏步地倒退？18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舆论环境应当更加宽松，为什么贵总局却收紧了舆论？这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要求杂志执行15条，不是依法治国

贵总局向《炎黄春秋》下达《警示通知书》时，两位司长一再强调，你们的这一行为是“依法治国”。依什么法？《警示通知书》第一条称，该“警示”所依据的法规、规章是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总署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7）860号）。这是不是依法治国？我们请了几位权威的法学家研论证，论证的结论是否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正因为有了这一条，我国官方对外不承认有报刊审查制度，只有“备案”制度。什么是“备

案”？据中顾法律网（2011-07-02）等法律专家的解释，“备案”是行政相对人（指属于行政部门所主管的单位——如《炎黄春秋》）将其需要进行的行为活动告知行政机关，为行政机关事后检查监督提供资料或某种依据。备案只不过是相对人通过备案知会行政机关，而无须得到行政机关的再许可。“备案”也只是事后提交，而非事先审批。相对人不是因为备案后才具有从事该项行为的资格，而是在备案以前已经具有了从事该项行为的资格。《炎黄春秋》是早经有关行政部门批准创办的合法期刊，其所发文稿不能再要求、也无须都送新闻出版总署事前审批后才能刊登出版。这本杂志在出版后已送出版署阅存，就是“备案”；出版总署经抽查审阅发现问题后可以依法处理，但不应事先审批。你们把“备案”变成了审批，不仅违背了宪法第35条，也违背了“中国没有报刊审查制度”的对外承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至高无上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因此，违反宪法的法规，应当是无效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7]860号）违反了宪法第35条，它的有效性值得质疑。虽然中国现行宪法没有可诉性，但是作为国家主管部门制定的“办法”，也不能有意违宪。

我国现行宪法第八十九条（一）款关于国务院行使行政立法权的规定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这表明，行政法规必须严格“根据宪法和法律”才能制定，没有制定相关法律以前（即无法律可依时），不得制定行政法规（除非有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由于迄今我国人大尚未制定出版法（法律），国务院在2001年12月12日通过的《出版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无法律（出版法）可据，却先行制定行政法规，这在立法程序上是越权的非法之法（法规）。其立法主旨和内容也不是根据宪法第35条保障“出版自由”的精神，而只是着重于“管理”与限制自由。因而这个法规实质上也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次署务会议通过，12

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说是“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然而,如上指出的,国务院这个条例(行政法规)并无出版法(法律)为根据,法规本身属于越权立法,应视为无效法规,则其下位规章《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也应是越权或无效的。

同理,新闻出版署1997年10月10日发布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属于所谓规范性“红头文件”范畴,连“部门规章”级别都够不上。当时既无全国人大的出版法(法律)可依据,又无相应的行政法规可据(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2001年12月12日才通过的),甚至也没有它的上位规章作依据(出版署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是在2005年9月20日才通过,12月1日起施行)。可见该“办法”的发布无任何“上位法”(法律、法规、规章)可依,纯属新闻出版署自己依其管理需要与便利而擅自制定。在制定程序上完全是“超前”越权。何况该“规定”通过后迄今已达8年,这期间未见它根据后来已发布的上位法规、规章,依法作出相应的、与时俱进的修订。对早已改旗易帜的东欧国家还称“兄弟国家”,可见它是过时的。因此该“办法”属于违法(违反立法程序)之“法”;又未按后来已有的行政法规修订,应属失效的规范性文件。

由此,贵总局依据以上越权无效的法规、规章以及“办法”对《炎黄春秋》所下达的《警示通知书》是于法(法律)无据的,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你们这一行为不能说是“依法治国”。

改变主管主办单时时的协议不能撕毁


2014年9月10日,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四部委联系会议,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改变《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随后,有关部门背着《炎黄春秋》杂志社在一个星期内就办完了变更手续。对此粗暴的行为,

炎黄春秋杂志社进行了顽强的抵制。随后，新的主管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了几点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炎黄春秋在遵守现行宪法、坚守“八不碰”的前提下，主管主办单位在编辑、人事、财务方面，给《炎黄春秋》充分的自主权。

时间才过半年，贵总局就完全漠视《炎黄春秋》和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这个协议，剥夺了《炎黄春秋》在遵守现行宪法、坚守“八不碰”的前提下，享有的编辑、人事、财务方面充分的自主权。这种作法既不尊重《炎黄春秋》，也不尊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这一作法将《炎黄春秋》逼向绝境。

《炎黄春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为《炎黄春秋》开辟了生存空间。《炎黄春秋》创刊24年来，全心全意地为改革开放助力，一向遵守宪法法律，从而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没有做什么推广发行工作，发行量却达近20万份，绝大部分是自费订阅。一些订阅者，迫不急待地等待每一期到来。有的地方老干部中心和养老院还组织了阅读小组，杂志一到，就集体阅读、讨论。《炎黄春秋》编辑部经常接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电，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如果不承认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还用改革开放以前的条件来要求，则《炎黄春秋》无法继续办下去，这既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也为民意所不容。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中国之大，应该能够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贵总局应该给深受广受读者欢迎的《炎黄春秋》留下一小片生存的天地。

以上陈述，望贵总局明察。 

2015年6月30日

【专稿】



作者简介：

1952年生于北京，16岁上山下乡6年，中专2年半，科研单位2年，1978年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羊城晚报，先后任记者、经济部副主任、机动记者部主任。职称高级记者。是全国首届百佳新闻工作者，广东省首届金枪奖获得者。发表的新闻作品十余篇获全国、省、市新闻奖。参与编辑《赵

紫阳还说过什么》、《国事忧思录》。

几 点 澄 清

——给李南央的信

李南央：

您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杜导正的三女儿，原羊城晚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高级记者。读了您《〈炎黄春秋〉的遗憾》一文，感到有些内容与事实不符，有必要做出澄清¹。

一、关于文章中两次提到杜明明“有一百多万挂到‘炎黄’账上”。称“陆德来后，对会计说要让资产做大，要把杜明明在另一处的一百万租房费放入‘炎黄’账户。”杜明明授权我在此声明：“她从来没有任何资金或资产放‘炎黄’账户或挂在‘炎黄’账上。也没有任何房租需要支付。”我为此特地向在杂志社干了17年的会计兼财务总监求证，也得到同样答复。杜明明说，这事是陆德开会时，建议把杂志的资产做大，可以把他目前使用的办公室及会议室，计算成杂志的办公费用（杂志社当时办公场地拥挤，连他的办公桌都没地方置放），争取把炎黄的固定资产做到一百万。这仅仅是陆德提出的概念而已。

¹ 由于杂志“总指挥”胡德华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要与您论战，我父亲也不同意发此文，这里我特此声明文责自负。同时说明，我是在去京为父亲祝寿时才看到您的文章，所以没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另外，您文中说“杜老的女儿杜明明加入‘炎黄’后，吴思告诉会计按‘炎黄’同等位置员工发工资。会计说：你傻啊！按最高标准给。”这句话我也同样向那位会计兼财务总监求证，回答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也不可能说这么愚蠢的话。杂志社在财务上一向按原则办事，这就是按版权页上的职务发相应的工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搞特殊”。事实上，我父亲不止一次交代过，“杜明明的工资只能排在中下。”（有我父亲的日记为证）

关于杜明明您还说她在外企时用杜老专车每日接送上下班。杜明明偶尔有用过我父亲的专车，但绝不是文中夸张的“每日”。杜明明当时的秘书向我作证，明明每月有两千多元交通补贴，上下班都有帮她叫出租，她买车后也经常自己开车。顺带告知您，您说司机是我们家亲戚也是子虚乌有。

二、关于“‘炎黄’不是杜家店”，您质疑“一次社委会开会，杜老的一个女儿也参加了（不是杜明明）并要发表意见”。那个女儿就是我。但是要澄清：那不是社委会开会，而是编辑部所有采编人员都参加的编辑部会议。而我为何要参加那次会议？因为当时解放军报官网刊发了龚云的《起底〈炎黄春秋〉》后，在海内外引起反响，当时正轮到我进京照顾老父亲，就直接联系了负责杂志官网的王海印，协助他收集材料，组织回应。而那个编辑部会议就是在官网组织的反击文章中挑选一篇准备刊发。您说这个会我不应该参加吗？

三、对于“杜家店”，以前“毛左”造谣时，我们只是一笑置之。现在既然连您也质疑，我这里再多说几句。

在我们子女眼里，父亲是个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他把杂志视作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却绝不会把它当成赚钱的工具，更别提会把它与家族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炎黄 25 年，他甚少过问杂志社的财务，也甚少关心杂志社的创收。他从没有在杂志社报销过任何的花费，请作者或媒体吃饭都是自掏腰包。杂志社在分配上按同人杂志的理念，从一把手到工人，工资级差远远低于其他媒体。曾经杂志社为搞股份制做过一个方案，股份也同样是人人有份，级差很小：他和吴思的股份相同，低一级少一股，余此类推……当然，股份制最后

没实行¹。

也正是因为看到我父亲这群老人家办刊只讲政治不讲经营，发行好却没广告，甚至没有广告部，所以钟沛璋的儿子及明明等年轻人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与时代脱节，便自告奋勇出了一份方案：办家广告公司帮杂志拉广告。我父亲收到方案后转交给总经理徐孔，后因有人反对不了了之。这本来是件能够增加杂志广告收入的大好事，但以讹传讹，最后却变成了“杜导正要组建一家公司，主要成员是他的儿女”。这类不实之词传多了，杜家就无奈地被“杜家店”了。

同理，我父亲从来没有过让子女接班的念头。杜明明“秘书长”的角色定位，其实就是在社委会和杜老之间，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因为后来几年我父亲年事已高，经常不能回杂志社）。杂志社只有十几个人，即便社委会成员占到杂志社人数三分之一强，我父亲也没有过让杜明明进入社委会的念头。（倒是艺研院接管时，封了杜明明一个副社长，被她一口拒绝。）杂志社一路走来风雨飘摇，险象环生，长期处在中宣部对立面，我们做子女的没有父亲那么高的境界，真是避之唯恐不及，又有谁会自己找死？

当然，在杂志面临危机时，我们还是会挺身而出。在2016年7月获知杂志社被艺研院强占后，我第一时间就飞往北京，从强闯医院协助我父亲宣布停刊，到跟随胡德华到杂志社跟强占者论理，从收集支持《炎黄春秋》公开信的签名，到联系中外记者去法院采访杂志社员工递交诉状，我参加了老“炎黄”在宣布停刊后从始到终全部的抗争活动。而年过7旬的大姐和姐夫为了让我安心在前方“打仗，”自告奋勇来到我家，在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与朋友一起承担起照料我生病丈夫的重担；正在京照顾我父亲的二姐，也义不容辞地参与了大部分抗争活动；小妹杜明明作为杂志社员工，更是一直冲在前面。这不仅是为了父亲，更是为了良知，为了正义。如果硬要强加我们一个“杜家店”的称号，这样的“杜家店”又有什么不好呢？

¹ 关于股份制，您说“杜老听不懂吴思在说什么，就是不同意。”其实我父亲主要是认为，炎黄文化研究会的老会长萧克、费孝通都过世了，现在会长是上面派下来的许嘉璐，老同志不信任他，如果占大股，很可能会影响杂志发稿权。

四、关于“杜老过去当新闻署署长时大家都知道他是左的……现在老了, 惯性思维就会延续过去左的一套: 斗争哲学……”虽然您父亲和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 但您完全不了解我的父亲。作为一个“两头真老人”, 他在“两头真”中间时段也会“左”, 老人对此并不讳言。但改革开放后, 他在新华总社时期, 外号就叫“杜大胆”, 在为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上, 在真理标准和包产到户的讨论上……始终冲锋在前(详见回忆文章); 他到新闻出版署, 虽然这个机构成立的目的就关系反自由化, 这种“左”不是他个人力量能左右, 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新闻法的修订与出台, 在“六四”为反对向学生开枪而下台……所以您说他“左”让我感到无比惊讶! 正因为“两头真”, 我父亲对“斗争哲学”的危害性比一般人有更深刻地认识,(晚年他亲自登门逐个向被新华分社打成右派的人道歉)。除了在《炎黄春秋》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果断拍板而可能被某些人误解, 平时的他是个怎样的老人? 他整人吗? 他容不下人吗? 请您多问问“炎黄”人, 就会有一个和您想象完全不同的答案。

五、关于“三老主事, 实际上是杜导正一人说了算”。文中您能列举的唯一依据是“何方、李锐同意吴思回来的两票, 抵不过杜导正一人同意徐庆全接手的一票。”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由于您的文章把您2016年和2014年两次回国的见闻, 以及2015年7月后发生的事与2016年4月发生的事相互穿插、时空交错, 结果有意或者无意地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 这就是徐庆全在(杨继绳之后)接任总编辑之前, 吴思早已于2016年2月应聘担任天则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并已明确表态不回杂志社。在此之后(4月份), 三老才最终选定胡德华, 一致同意他任社长/法人代表。只因胡本人提出慢慢来, 才被任命为副社长, 负责全面工作。这才是真正接手吴思的人。有了这个重要前提, 加上总编辑位置虚位以待快一年, 几个候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落实, 才同时任命徐庆全为总编辑。所以, 三老对此并无意见分歧, 不知何来两票对一票?

这里顺带提一句, 由于您长期在海外, 掌握的“炎黄”信息支离破碎, 主观臆想是徐庆全接替吴思任实际一把手, 所以在“两票对一票”的笑话之后, 又屡屡发生笑话。您说

“如留住吴思（他是绝对不会像后来的实际“一把手”徐庆全那样，在危机来临时不见了身影）……”故此“为中国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其实，炎黄全体同人最后关头在实际“一把手”胡德华的带领下，“按原有的游戏规则，集社委会全体成员的智慧（您的原话）”，抗争维权有声有色，撤离阵地进退有据，其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与支持。

“炎黄”的死足够壮烈与绚烂。

再说所谓“三老主事”（“炎黄”整个历史并无这一说法），其实当时三老主要是对杂志社的重大人事问题作决策，日常工作中社委会议事三原则并不受影响。胡德华上任后三老的“临时使命”即告结束。您说“吴思离开后，社委会议事三原则不复存在”也纯属主观臆想。

中国的传统媒体，由上级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任命领导人；同股同权的同人媒体，由竞选赢得多数成为领导人（在当今中国并不现实）。体制“四不像”的“炎黄”，由政治经验丰富的“三老”，在紧急关头重新布局领导人，恰恰体现出一种特殊环境下的政治智慧，而非游戏规则的缺失。

六、关于“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眼睛盯着那一点票子”。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我父亲这句话讲的是思想境界，而不是分配原则。事实上，我所了解的这次老炎黄争回来的经济补偿，并非您所认为的“极为不公平”。分配除了留下小部分“联谊活动经费”作为日后“火种”，以及象征性地给长年无偿为“炎黄”出谋划策的顾问们以及早期已离开但对炎黄有重大贡献者的慰问金，其余大头都分给了现有的炎黄员工。（在此之前，杂志社宣布停刊的同时，已机智地抢先一步为所有员工发放了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另外，您文中许多信息早已过时。社委会里我父亲虽然排在第一位，但因年龄和身体原因，他早在宣布“炎黄”停刊的同时，已在社内宣布杂志社全权委托副社长胡德华管理。从抗争活动到善后处理，胡德华一直是杂志社的总指挥。对此次分配事宜，我父亲除叮嘱过几句，并开过一个早期对炎黄有贡献者的名单外，从始到终并无参与。

对于您的指责，我还补充一句，这次老“炎黄”与艺研院在财产上的官司与谈判，因

为法人已被强行变更，唯一有法理依据索赔的就是：杜老和方实当年借三十万创办杂志，25年来本金利滚利积累的资金。（杂志社委托的律师比照某民营报早前被接管的案例，告之能索赔到的就是创业者投资及利滚利）。杜明明和王彦君作为谈判代表，死死抓住这点，利用我父亲及红二代的影响力与社会关系，与艺研院进行了一年多几乎无望的艰苦谈判才争得。而钱到手后，我父亲第一时间就对胡德华表态一分不要，全部发给员工尤其是困难员工。（后经很长时间的说服，他才收下与普通员工同样的一份。）

说到游戏规则，这次分配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却基本做到了程序正义。由于25年来离去及最后解散的员工天南地北，各奔东西，您所要求的要由292期炎黄所有同仁共同商议根本不现实，而分配方案在广泛征求意见后由社委会讨论通过，却完全符合您一再强调的社内议事三原则。

七、澄清完以上事实，最后再简单表明一下我对您这篇文章的看法，我欣赏您勇于探索“炎黄”成败得失的精神，但对于您的核心论述：“炎黄游戏规则的缺失”不敢苟同。我赞同杨继绳老师在对您的征求意见稿回复时所表明观点：“炎黄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存在。”“在中国这种制度下，主要是如何对付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这是任何游戏规则不起作用的”。¹

杨继绳老师在回复中向您详尽介绍了什么才是杂志社真正的游戏规则，他的原话很长，简单概括即“炎黄是社长负责制。日常工作由社委会商量决定，重大问题请示杜，社委会意见不一致找杜仲裁。”并明确告诉了您他的判断：“杜老没有废止游戏规则”。“吴思被授权与被停权与‘议事三原则’无关”，这只是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应急措施。

社长负责制即一长制，是根据新闻特点和规律在新闻实践中形成的领导体制中的一种（另两种是委员会制和双轨制）。无论是解放前的著名报馆，还是当下的许多媒体都有采用。这仅仅是一种单位的运行机制，与民主无关；即便是成熟的西方媒体，虽然由发行人

¹ 您原打算把您同两位反对您写这篇文章的炎黄人之间的讨论整理成问答附录在文章后发表。我有幸拜读了这个附录，可惜后来没见发表。

聘请总编辑后，不得干预总编辑在日常编辑事务中的决策，但当某报道或重大事件涉及媒体生死存亡时，就必须提交发行人决定。这也与民主无关。

“炎黄”的游戏规则到底有没有缺失？我作为一个和您一样的局外人没有资格下结论。在这个问题上，是在炎黄工作了十几个寒暑，对党内政治有专门研究和著述的杨继绳老师的判断准确，还是每年回国两次，和杂志社的人略有交往的您的判断准确？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李南央，我父亲和您父亲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我愿意相信您对我父亲的批评是善意的。但令我不解的是，文中为何有那么多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对我父亲和杜明明人格清誉的诋毁？我是记者，曾经写过成百上千的批评报道。但每写一篇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对收集的证据核实再核实，对涉及的细节考证再考证，并且见报前会送给被批评者过目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因为我知道只有真实才有说服力，才不会误伤无辜的人。同理，您有再便利不过的条件找我父亲或杜明明核实，却不知为何不去认真核实？这不能不说是我对您《〈炎黄春秋〉的遗憾》的遗憾。

说话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杜 星

2018年12月19日修定

【专 稿】

回答读者提出的三个问题

李南央

内容提示：

- 民主是为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 只有不同的思想，没有思想的敌人；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宪政必需的文化土壤。

感谢 236 期记忆刊发了我的文章《〈炎黄春秋〉的遗憾》，并同时选登了一些读者来信；这期记忆发出后，我又陆续收到一些读后感；在“遗憾”草稿写出请几位曾经在炎黄工作过的人审阅时，也得到过他们的意见。现在就从这三个来源中选出我以为具有代表性的三条，做以下的回应，算是对“遗憾”一文的补记吧。

民主是为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236 期陆向东的信中说：“她（李南央）批评‘炎黄三老’口头民主派，仿佛她很懂得民主，其实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下只有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民主。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管理国家社群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民主是与不同集团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因此，站在炎黄利益之外，你就认为他不民主，而如果你坐在炎黄的板凳上，你就会知道，你所标榜的民主，在炎黄危亡时刻，完全没有意义。

抗联战士八女投江之前，还有功夫少数服从多数吗？狼牙山五壮士在跳崖之际，还有功夫搞程序公正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屁股决定脑袋。这里只有敌我，没有中间地带，事情逼着你选边战队。只有站到了这个队伍里，你才能知道，民主的局限性和适用性。”

1. 陆先生认为民主具有局限性和适用性的属性，它一定是跟某个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当民主与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时，或者直接威胁到它的生死存亡时，讲民主就变得毫无意义。

而我以为恰恰相反：民主是缘于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治理社会的方法，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要对违背个人利益的任何集团的利益进行有效的约束。如果以为民主彼时可用，此时不可用；甲况适用，乙况不适用，那说的一定不是民主。

2. 我们不妨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它在野时喜爱的一首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向着一切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而在它执政 69 年后，这歌是根本不能唱了，老百姓不能公开地讲“团结”，得说“抱团取暖”。

在这里，我们看到共产党将“民主”与“向着新中国”的集团利益捆绑在一起，“民主”不过是它为了夺取政权而拉出的一面大旗。执政不久，民主便威胁到它的专治地位，共产党立即将它弃如敝履。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则显现了对民主的不离不弃——当初他们帮助共产党，是以为这个党主张民主，追随它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个人利益；现在他们“抱团取暖”，请共产党不忘承诺，还是以为民主制度能够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民主是他们真实的追求。

所以，我们大可删去“集团”前面的那些定语：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真炎黄、假炎黄、伪炎黄……无论哪个集团，只要它将民主与自己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就一定会在危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放弃民主，从本质上说，都是一回事。作为每一个个人，我们一定要看明白：人类走到今天，只有由那些认同民主是不变应万变的社会制度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才会把你的利益永远置于它的集团利益之上，才是你可以信赖和依靠的。

这样一来，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则根本不需要履行任何表决程序，因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保存生命，哪怕向战场上的敌人投降是自然而然的选择。美国军队的俘虏回国后受到凯旋英雄的待遇；而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回国后本人和家人的悲惨遭遇，现在已是公开的秘密。

应该再多说一句，我们谈论民主时，不能将军队和平民社会混为一谈。军队没有民主，只有服从（这正是为什么可以马上打天下，却决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我的“遗憾”文中提到10月10日在胡佛研究所听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小报告。那天他做完报告后，在听众提问一节，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美国在阿富汗打了十七年，一无所获，至今陷在那里拔不出来。这是一场非常错误的战争。你刚才讲到你向你的部队讲述 mission（使命），你需要非常小心。不要误导他们。

这位军官回答说：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也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是非常错误的。但是作为军人，我只能服从命令，不能因为自己不赞同这场战争而拒绝赴战。我刚才讲到

的 mission（任务），只是向我的部队解释某一具体战斗的任务和他们为什么可能会为这场战斗做出牺牲。但是有一条我可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士兵：你是为总统而战；我绝对不会对阵亡士兵的家属说：您的亲人是为总统献出了生命。舒尔茨微笑颌首。

只有不同的思想，没有思想的敌人

236 期皮皮侠信中说：“请问李南央老师：贵文让谁欢乐？让谁愁？我是八零后晚辈，对历史上的陈糠烂谷子不感兴趣，只是有杞人忧天：在伪炎黄竭力拉拢人心之际，您这篇文章会让谁高兴，让谁愁呢？”


同这位八零后一样，我在中国生活的四十年所受到的思想文化熏陶，常常让我以为自己说的话、写的东西，一定具有某种“营垒”属性：或者是右派言论，或者是左派言论。胡适那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即便不算反动言论，至少也是扯淡。到了美国后，才渐渐知道新闻报道的原则是：我报导，你判断；学者们著述立言推崇的是：标新立异，绝不把自己归入哪堆儿；至于学生，别说写博士论文了，连小学生追求的都是：必出老师之右。在一个可以自由地“胡思乱想”的社会，我已经习惯于落笔时从不去想所写的会让谁人欢乐、谁人愁？在我看来，只要写出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是奉迎权贵的阿谀之词，都是一种思想的表达。而对每一种表达，都会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这是思想的歧见，不是敌友之斗。一篇受到广泛关注和引起争论的文章，必定包含了某种有价值的思考；千夫诺诺一致称颂的，只能是没穿衣服的国王手中拿着的讲演稿。

宪政开张的文化土壤

一位我请审“遗憾”草稿的前炎黄人说：“你这篇文章，会被‘毛左’视为珍宝而广为传播。炎黄的对面站着一支腐朽的、丑恶的然而又是异常强横的力量。他们绞尽脑汁在我们身上寻找短处，似乎一旦找到，就能成为他们野蛮行径的根据。时到如今他们没有得逞，什么也找不到。现在看来，他们的烦恼可以结束了，因为有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来帮

助‘爆料’，此人的说服力源于她是《炎黄春秋》领军人物杜导正所倚重的老战友李锐的女儿！”

作家老鬼看完“遗憾”文后说：“看完南央文章，感觉很复杂。她说的有道理。杜老有局限，有失误，有把炎黄家族化的倾向。但炎黄已成一面说真话，揭伪史，争民主自由的大旗，这么公开揭批杜老等，客观上等于给当局抹黑炎黄提供炮弹。总感觉不妥。我觉得以内部跟杜老等人坐在一起面对面提意见，讨论更好。”

“炎黄”的辉煌缘于她勇敢地记述史实——鉴往，公开地追求宪政——开来。如今，《炎黄春秋》这本杂志已经进入历史，颂扬她曾经的功绩是为了传递她的薪火，检讨她有过的失误，是为了继续她争民主、捍自由的追求。共产党69年的专治，已经将中国的文化土壤污染得跟中国的耕地一样，难以长出有机的庄稼。人们都太习惯于将批评的声音看作是“抹黑”、“污蔑”甚至是会被“对手”利用的“炮弹”，而不以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宪政之树在中国生根发芽所必需的文化土壤。写出《炎黄春秋》留给我的遗憾，为的是尽一点绵薄之力以净化被一党专政污染的土壤。我相信，“遗憾”一文如果有一点说服力的话，它必定源于论述的独立、思考的自由，而绝不会仅仅因为作者是李锐的女儿。

【专稿】

民主派需要更坚实的道德支撑

——兼谈徐庆全的经济问题

王晓林

《记忆》238期刊登了我写的《我所知道的炎黄春秋最后一任主编徐庆全》一文后，转来若干读者来信，不论善意或怒意，他们所提问题基本相同：

1. 你为何一定要向政府举报徐庆全？

2. 为何公安介入后也没有认定其贪污成立，你是否诬告或证据不足？

3. 既然徐某道德水准如此底下，他如何能成为炎黄 25 年光荣之路最后的“执炬”者？

请容我在这里一并回答，同时解释此举的过程和最近刚发现的、导致了这一系列后果的诡异事情。

1. 2014 年 4 月，我向炎黄春秋杂志社举报了编辑徐庆全多年来以杂志社之名寻租、贪污的行为。在等待了 8 个月后，12 月 4 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官网上发表了一个“郑重声明”，正是这个连文法上都极其蹩脚的东西（见右图），其卑劣和鬼祟超出了正常人的容忍范围，令我下决心走公开、实名、正式举报之路，以谋求道德正义和维护名誉清白。就在声明发表当天（我读到此“声明”是在几天之后），杂志社一位长者亲写电邮给我——“……你对社会、对政治的看法是和我们一致的，是忧国忧民的……你又一直支持炎黄，就请你从大有方面着想，不要将小徐和你之间的纠纷和炎黄扯在一起。特别不要在目前炎黄困难的时候给炎黄泼脏水。你知道，现在有些人多么希望炎黄垮台，演出了攻击炎黄的大合唱，从大的方面看，我想你不应当是这场大合唱中的一个成员。我想你是识大体的知识女姓，我相信你能做到”。此前他还请了一位我十分尊重的公知和我深谈了近 3 个小时，分析此刻我必须抛开个人恩怨与炎黄共度难关的道理。他非常忧虑我对徐某的举报上传网络会授人以柄而累及炎黄。来人转达他的话“王晓林所说的每一件事我都相信，但炎黄现在实在太艰难了，无论如何请她忍耐，事后杂志社一定会秉公处理”。仅凭着对这位长者著述的尊重，我当即答应不再有所举动，一切以炎黄春秋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坚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不在乎一朝一夕。

岂料几天之后就有炎黄的朋友愤怒告知，有人强行在杂志官网上硬上了一篇所谓“郑重声明”，要我立即上网去看。这篇至今犹在的东西(<http://www.yhcqw.com/3/9678.html>，截图如下)给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因为声明和那位长者发电邮给我居然是同一天，继而大乐——且不论“声明”内容如何，一个搞文字的单位，“郑重”地发个“声明”却连文法语句都不通，什么“纯属捏造”、“纯属诽谤”，什么“本刊已依法追究和必将控诉造

谣者的刑事责任”，这怎么可能是社委会集体讨论后认真写下的？我当即发电邮给杂志社邮箱质询并刻薄挖苦“此文执笔人的语文难道是体育老师教的？”居然无一人应答，这才



令我决定正式、公开、实名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同时很快集中了所有证据。在发出给文化部举报信特快专递前一天，我向社委会发了预警但依然无人应答，这才把两封一模一样的举报信同时发了出去，正本给杂志最高主管部门——文化部，副本给炎黄春秋杂志社，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令人愤怒的

是，直到本月——2018年12月，我才知道此声明并非社委会指定人员撰写。我与当年声明起草人沟通时，他也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原稿竟然被人篡改得如此不堪，原来的语气、遣词都被改动，由一纸可以商榷的公告变为毫无可操作性的文革式勒令。至于我，假如当年看到的是他执笔的文稿，说不定就不举报了。我们两人都愤懑不已并一同质问：当年到

底是谁强行在官网上发出这样狗屁不通、丢人现眼的东西，把事情弄到一地鸡毛？在炎黄死去已逾两年的今天还该不该追究？

2. 我在2014年4月向社委会举报后，由于徐庆全的大大呼小叫弄得全社皆知。大部分炎黄人员主张社内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根据指控立即开展调查。如举报属实，徐庆全必须自负其责，社里要立即辞退其人；如不实则要立即发表一个公告，还徐清白。为了荣誉，炎黄不能为某位员工个人的不端甚至触法行为负责。据说社里召开了有杜老参加的讨论会，有人当着徐的面就提出了这个建议，闹得很不愉快。岂料几个月后炎黄官网突然就出现了这篇极其愚蠢的文字，而“调查”过程却从未公布于众，更未告知于我。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无人说得清楚。这些内情之所以被我得知，实在不过是那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应验而已，大家又没有签什么“保密协议”，通报给我又如何？

3. 在向文化部举报后，卷宗被转给艺研院，艺研院纪检组和我交谈过两次，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事后我同时郑重向文化部和艺研院询问了原因，两处对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此案涉及的人与事比较复杂，我们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处理，转交市局是不得已”。我对此未提出异议。但当事人徐庆全的举止就比较奇怪了，2015年6月4日凌晨，他向全体炎黄人员群发了一份《备忘录》，声称他已被某人告知王晓林的举报完全是通过私人关系才得以在市局立案，并煞有介事地将此人与他的密谈录音。现在我郑重要求当事人公开录音，以真相告白关注炎黄和我的朋友们。

4. 我的举报没有结果，并不意味着举报不实或证据不足。文化部也好，艺研院也好，无论在政见上与杂志有多么大的歧义，我始终认为工作人员并非“不正直”、“不诚实”，他们的工作也是职责，孰重孰轻他们也要权衡。还是那句话“此时的上级谁也不愿意在这档口干‘脏活’——以经济把柄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而我是有100%的权力追索这件事情结果的，假如不是因为炎黄的处境越来越难，不忍雪上加霜，我一定会向文化部、艺研院追索结果，他们也必须有个明确答复，否则就不符合纪检程序，举报人是可以以“不作为”作行政追诉的。这也是2016年4月底有炎黄人请求我再次追索此事

以遏制徐庆全的疯狂表演、试图挽救炎黄于一旦时，我有能力、有底气准备配合的原因。

5. 徐庆全在炎黄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居然成为主编，令这份广受尊重、特殊年代的最后一份特殊纸媒蒙羞，令几十位创建炎黄、几千位投稿炎黄，尤其是20万订阅炎黄的人们甚至他们的后代莫名其妙，其中的不得已，上篇行文中已尽我所知写明，但解释这个因果链还是大大超出了我的资格和能力。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亲见亲聆的李锐、何方两位老人对徐某上位的气愤和不平。至于徐某最后跟杜老拍桌子和以“摊牌”相威胁、炎黄猝死后要和杜老“切割”，我都是听说，请读者自己判断真伪。作为祖孙三代的订阅者，两代的投稿者，我只能说《炎黄春秋》——这份倡导、引导民主的媒体在当下的环境中确实很难挺拔轩昂地生存下去，但无论怎样解释都不应该结束在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窝囊境地中，她本应极其体面地死去并极其美丽地再生，如凤凰涅槃。

倡导民主，崇尚民主宪政的人们需要更加坚实的公共道德和更加完善的个人品格支撑，在眼下中国已经渐成共识，这才有新贬义词汇“带病提拔”的高频出现。这也正是当代民主国家普选、竞选时最重大的议题。美国多年前的“扒粪运动”至今被肯定和赞美，他们不懈的“揭老底”传统代代相传，原因正在于此。污点人士无论你再“政治上正确”，也比清白之人难以出头，而管控“出头之人”出头之后的言行则正是民主宪政的第一要务。自诩为“自由派”的人士必须比周围的人更加注重个人的道德、人格水准，他的倡导才会被大众认可，他的追求才有人性上自由的意义。“自由派”——一个不应蒙羞、不容亵渎的光荣头衔，请尊重和珍惜她带来的理性和洁净意味。

另，《我所知道的炎黄春秋最后一任主编徐庆全》一文中有一处与事实有出入，在此郑重纠正并向当事人致歉：“财务部门说倒是收到过一张徐某交来的5万元支票，名头是为杂志拉了个广告，他还强要了3.5万的回扣，事后栽到已故副社长徐孔的头上。”当事人强要的回扣不是3.5万元而是一半——1.75万元，“栽倒已故副社长徐孔的头上”并非指回扣“给了徐孔”，而是把强要的理由说成是“徐孔的规定”，造成死无对证之势。这个广告刊登在2008年8月号杂志上，我就不在这里附出，让当事人丢人现眼了。

请大家继续评判及质询。[我的邮箱 donoevil@sina.com](mailto:donoevil@sina.com) 谢谢！

【评论】

中国需要一种“文化”的蜕变

杨利川

看了《记忆》炎黄专辑一李南央的文章，还是南央的性格：直率、真诚、不避亲疏。

的确，尽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老炎黄的结束不是杜老他们可以挽救的；尽管他们也都为此尽力抗争和坚持，表现了一代人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但是，说出历史的遗憾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南央所说，追求民主自由理念的人，未必懂得游戏规则。看起来，把民主变成可操作的程序，把自由变成社会生活中的习惯，还有一段历程，甚至需要一种“文化”的蜕变。

八十年代初，我说过一个笑话：枪还是那杆枪，只不过枪口调过来了而已。过去“四人帮”打我们，现在我们打“四人帮”，目标变了，武器没有变。

老一代人，以及我们这代人，都是在革命和受革命教育的环境中熏陶过来的，就算懂得了反专制、反极权、要民主、要自由，但是融在血液里的那些习惯和文化却往往如影随形，而那些在自治组织（不是党政组织）中需要的品格：遵守规则和契约、妥协、宽容、尊重他人、权利平等……却非常欠缺。我们习惯于一些似是而非的做法，比如：规则都是管别人的，为了“大局”都可以变通；凡事非黑即白，不愿调和；以道德动机否定别人，也以道德动机肯定自己；以为真理总在自己这边，一言不合，背包就走；过度追求理念一致，而不相信议事规则。甚至还有一些传统观念：一方面不敢承认个人利益和有尊严的报酬，另一方面对财务问题缺乏公开透明（这是经常看到的一个悖论）。更要命的还有一些传统的政治技巧：正式的会议不能公开议事，先在小范围秘密决定，后在大会宣布（或“走程序”）；重大人事问题避开当事人，背后解决。


这样看来，如果环境允许，也许吴思提出的股份制是更有利于建立更为完善合法的程序基础的。后来，瞒着吴思改变人事和议事规则就是问题的开始。

我这些年感受特别深的是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治理模式，完全模拟的是现代民主法治的机构设置和程序规则。从 2004 年成立至今，也有很多不令人满意，但是内部治理的民主模式却是坚持至今，被称为组织的 DNA，实在是难能可贵。

组织架构权力制衡：理事会 9-11 人、监事会 5、章程委员会 3 人，两年一届，一票一票选出，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候选人的竞选演说超过规定的 5 分钟就给轰下去，马蔚华、任志强都曾经落选。章程修改或者重大规划，都需要会员大会辩论，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条条过，经常把主席逼出一身汗。最可贵的是，能吵架却不散伙，按规则出牌又承认结果（认输）。妥协，宽容，尊重规则和事先约定。承认权利平等，尽管有时也会扛大佬的大旗以造社会影响力，但投票、辩论没大没小。

我总是觉得企业家的身上确实体现着一种新的文化，尽管他们也都是满身毛病，看起来没那么“淳朴”。客观说，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应该也不少。他们很多人都极有学识和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骨子里的自由主义，毕竟是资本家的本性啊。

我以为南央和我一样，说这些绝不是苛责，而是一种自我反省。像南央的父亲李锐和杜老他们，已经是非常值得敬佩了。不仅如此，所有在一个方向上的自由人士，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无论在维权一线上拼命，还是在课堂上尽力说些真话，还要吃体制的饭，只要希望真改革，都应该得到鼓励（因为我确实多次听过一些怨言）。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什么“亲者痛”的事。

再说新版的《庐山会议纪实》，原来打算翻看一下增补的内容，没想到从头到尾完全又看了一遍。丑陋的历史真是不堪回首，令人感慨！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什么东西令它任由“一个人”胡作非为而不能制止，几个敢言者遭羞辱迫害，众人心知肚明却指鹿为马，把公正直言说成“逞能”，把为民请命说成“野心”，一种无耻的文化，一种不能纠错的机制。可悲的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中国（包括我们每个人）确实需要一种“文化”的蜕变！

【评论】

茶杯里的风波

向胡杨

今年第26期、27期的《记忆》连续刊登了李南央等人专稿，回顾2016年前后围绕《炎黄春秋》杂志事变前后的诸多内幕细节，作为一个忠实于记录历史的刊物而言，这些文字弥足珍贵，很有价值。

作为《记忆》的读者，我也想就此表达一下从这些文字中得到的感受。

1. 《炎黄春秋》的影响力被夸大了

无论《炎黄春秋》的编者还是作者，都认为该刊物在全国有着巨大影响，甚至认为是“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和中南海对活的平台。”（见丁东文，炎黄专辑一）。但这可能完全不切实际，也许他们还沉浸在80年代媒体影响巨大的幻觉中。那时，国人刚刚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意识形态高压，加上贫瘠的物质生活，对政治话题有着极大热情和关注度，某个高层人士一次出位的内部谈话就可以让人们奔走相告，作为政治形势松动的信号，这也是那篇关于真理问题讨论的社论能够成为吹响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号角的基础与土壤。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俗化的消费型社会，政治热情已被大大淡化，编者津津乐道的发行量达20万（先不提绝大多数读者为60岁以上老年人），在传统媒体角度似乎还算一个不错的业绩，但从互联网角度看，其覆盖率和影响力则完全不值一提。

我们随便看一组数据，目前，淘宝、拼多多、京东三网注册用户分别超过5亿、3亿和2亿；微信登陆用户超过9亿，公众号数量超过1000万，活跃公号超过300万，月活跃粉丝数7.9亿；中国城镇常年热衷广场舞人群超过1亿；中国全年电影观影人数超过30亿，通常一部新电影的首映票房如果低于500万（约20万观众），即划为低票房电影。当

然这些和炎黄读者并无可比性甚至无交集，但仍然折射出今天社会主流人群的兴趣所在和热点所在。

2. 互联网时代的意识形态碎片化

和80年代之前不同，中国当下的社会更加碎片化，这一方面源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各群体之间资源和利益分配出现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在于互联网自媒体将不同人群做了进一步的区隔。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多元，互联网恰恰迎合了这种碎片社会的需求，应该说今天的社会诉求远比80年代多元复杂，社会共识更少，价值冲突更多。

在这种时候，很难说某个单一媒体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呼声。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是，只有热点事件，没有热门媒体，热点事件反映了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媒体通过“蹭热点”获得关注度，这是今天互联网传播形式的基本生态。

3. 碎片化时代的世界观

和40年前相比，中国的最大变化是从一个物质贫乏、社会分层不明显、社会共识相对统一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社会演变为一个利益冲突尖锐、价值多元的碎片化社会。应该说互联网信息传播助长了这一趋势，使群体之间更分裂，观点更极端，社会更加非理性。

记得我们小时候常被教育，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但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比世界观是否正确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世界观（眼界）应该足够宽。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很多悲剧和谬误恰恰源于一种狭隘而“正确”的世界观，它们不能理解现实中的曲折庞杂和未来细微纷繁的可能性。说到这儿，让人想起以前看过以色列作家奥兹的一篇访谈，题目叫“在正确与正确之间”，在其中，他说到政客们喜欢用一种正确否定其它所有正确。他说的也许就是世界观要从是否正确，升华为是否宽广。

《炎黄春秋》内部的种种纠纷矛盾，可能就在于此。



【评论】

长歌当哭祭“炎黄”

——我和《炎黄春秋》

王智仁

两年前，二十五岁的《炎黄春秋》死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名存实亡”。2016年第7期杂志创办人杜导正先生发表《炎黄春秋》二十五周年感言以后，第8期的社长从杜导正换成贾磊磊。贾社长甫一上任就昭告天下，新的“炎黄”要：

1. 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
2. 以中央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准，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3. 保持《炎黄春秋》原有的办刊风格，类型、风貌不变，连封面设计也不变。（这第三条稍作解释：当年《炎黄春秋》因为请不起人做设计，所有封面都是单色——“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反倒形成她独特的色彩、独一的风格，也被贾“炎黄”说“继承”就继承了。）

时年杜导正 93，贾磊磊 60，父子辈接班本应皆大欢喜，可是人们看到的却是像 1949 的“军管”，编委胡德华差点没有和“接班人”打起来，杂志社所在地——月坛南街西华饭店门前一片混乱。

“炎黄”原来 20 万户自费的读者群今安在？今天我上网查了查，订阅 2019、2020 年的“炎黄春秋”白送你 2021 年的。这可是老《炎黄春秋》从未有过的慷慨，让人不得不给贾炎黄点个“赞”，给杜老的炎黄点个“囧”！哈哈！

2016 年第 8 期（新“炎黄春秋”总第 1 期）扉页上，只有社长和总编辑换了，原来的顾问、编委、文员一个不少，够礼遇的了！到了第 9 期（“炎黄春秋”总第 2 期）则全部“造越位”，《炎黄春秋》老人一个不剩。信誓旦旦的“坚持”、“保持”都跑乌有之乡

去了。文物收藏爱好者们，2016年第7、8、9期炎黄封二注定是将来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奇葩，赶快行动起来吧，晚了就失去发个小财的机会啦。

再说说我这个已过“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人和《炎黄春秋》的缘分。

我是炎黄春秋常年订户，还发展了几位朋友并通过他们发展了更多的读者，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新发表的文章。人们爱他，特别敬重为她写稿的“两头真”老人们！只要出现打黑框的老顾问，我们都要扼腕叹息。2006年我第一次走进《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大门，简陋的发行部张贴着没有装裱的习仲勋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当时还看不出仲勋老的子辈将前程似锦，但也足够掂量出这份杂志的分量！接待我的谷世章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说读者群中我属于“年轻人”。那时我都60多了。

我的父亲曾经是国军下级军官，淞沪抗战时是陈诚将军的警卫。厘清“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还原历史真相后，父亲获颁党中央抗战胜利纪念章，被承认“凡是参加抗日战争的都是英雄”。父亲不再是“贱民”，作为后人我们所遭受的一切也都不提了，可年过90的他还有一个锥心之痛：鄂豫皖土地革命时，他的母亲与八岁的弟弟死于非命，至今不知杀戮者是谁。祖籍的家谱记载：“1927-1934年，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以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屠杀了无数的革命优秀儿女，革命的红色群众，以致近千人的王家湾，幸存者不足300人。”此时我的心已释然：70%的村民死于非命，我的奶奶和八岁的叔叔都不是“坏人”。追问就到此吧，我实在不忍去揭九旬老父亲的伤疤。

2008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沈建中带着上海东方卫视的记者采访父亲（2015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还为父亲申领了马英九颁发的证书和纪念章）。当他问及父亲的家世时，父亲冷不丁的说出“1929年吴光浩写条子向我家索款”后祖母不明不白地被杀害。客人走后我问父亲“你知道吴光浩是谁吗？”父亲回答“不知道”。我也是那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开国少将罗应怀找寻“老首长吴光浩”的后人才知道吴光浩是徐向前元帅的前任。我的奶奶是1929年九月初三被杀害的，吴光浩此前已经牺牲在湖北罗田。死人怎么“写条子”？在徐向前、陈再道回忆录中查到“由于吴光浩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牺牲后还是


以他的名义发布布告”。这样我才相信父亲的话。

我和一群《炎黄春秋》的读者谈及家世，大家都鼓励我投稿讲出此事。就这样，《柴山保往事》发表了，并引起了一场“革命与人性”的激辩。感谢《炎黄春秋》终于给了我消除冤气的机会，为这一天父亲整整盼了80多年。金庸先生可以当面向邓小平陈情父亲的“不白之冤”，梁羽生的父亲可以伸张冤屈，我的父亲不过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之常情。徐向前的妻子、李先念的哥哥、王树声的六个兄弟姐妹不都死在“自己人”手里吗？这些从鄂豫皖出发的人1935年还差一点杀害习仲勋。《习仲勋传》说毛主席救了习仲勋，2016年第4期《炎黄春秋》何方、宋以敏文章《刘英回忆延安岁月》以详实的时间考据证明是张闻天救了习仲勋。这样重大的史实，除了《炎黄春秋》谁会去探讨？厘清历史，公开历史，才能真正切断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孽链”！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首先要让老百姓相信！

《炎黄春秋》到2014年第9期后，就已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了！某龚姓先生大作《起底炎黄春秋》可谓大批判的“先驱”。他不得罪老太爷（仲勋老2001年2月25日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还挂着呢），而是很乖巧地说“2002年起就发生质变”。这孩子真是聪明！“乌有之乡”倒很实在，直截了当说“《炎黄春秋》反共”，习老爷子竟没看出来！

《炎黄春秋》已死，尸体本应火化或者肥田而不是“借张三之尸还李四之魂”，这对张三、李四显然都不公平、不尊重。我的朋友们陆陆续续停止了订阅，他们大部分没有注意过封二，而是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就都拉倒了。

王晓林笔下的徐庆全总编辑我不了解，只想问：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炎黄春秋》最后3期的总编？这个位置若非君子怎么可能坐得住？徐先生是否应该把文章作者告上法庭？

我为《炎黄春秋》长歌当哭！

【评论】

我读《〈炎黄春秋〉的遗憾》

尹曙生

从2009年到2016年，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22篇文章，以我亲身经历和我所接触的档案资料，披露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人民群众所遭受到的苦难，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受到责难和非议，遇到不少麻烦，我泰然处之。我是个老党员、老干部，经历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深知毛时代极左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我要揭露它，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就是我写那些文章的初衷。我和《炎黄春秋》杂志主编、责编并不认识，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稿，偶尔通个电话。我发给他们的22篇文章，全部被采用，也很少修改。我非常感激他们、崇敬他们，给了我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为后人书写历史，提供一些资料。正当我准备继续写下去时，却不时传来不好的消息：这份为民鼓与呼的好刊物，却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2016年它真的被扼杀了，而扼杀它的人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电子刊物“记忆”第236期“炎黄春秋”专辑（一），专稿发表了李南央《〈炎黄春秋〉的遗憾》和丁东《我在〈炎黄春秋〉的最后一程》两文。看完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炎刊”被夺权已经两年，总结它的成败得失，很有必要。李、丁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炎刊”的历史命运。

李南央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说明在言论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炎刊”的命运岌岌可危，而这时“炎刊”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包括她的爸爸在内，不能在刊物内部充分发扬民主，按游戏规则办事，发生“内哄”，加速了“炎刊”的死亡。李南央的所谓“遗憾”，就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以实现宪政为梦想的几个老人，在关键时刻，废除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不按民主程序办事，这是多么遗憾、多么不可理解的悖谬啊！这样的总结，视野很高，胸襟很宽，已经超越《炎黄春秋》生死存亡的范围，值得我们深思。


爱之深，责之切。那种家丑不可外扬；只要是自己人缺点也是优点的帮派思想是不能使人长进的。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进步这么慢？如果大多数人的民主、法治意识都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而这正是我们国家当前的现实。我是体制内的人，我有这样的体会。举个例子：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调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大刀阔斧领导全省人民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在安徽所犯下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尤其是支持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单干（美其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全省推广。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他这样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担当啊！安徽滁县地区比邻江苏，在两省边界江苏一边伫立着“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万里不为所动，仅一年多时间，农民吃饭问题就得到解决。“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随处都可以听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万里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当然，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万里是完人吗？不！他在安徽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同时，由于他的民主意识欠缺，主观武断，听不得批评意见，也制造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举两个例子：

一、凤阳县委原办公室主任张少柏，1960年由于向中央调查组反映曾希圣时期凤阳饿死人和吃尸体现象，受到排挤打击，得不到重用，被冷落一边。万里到安徽后，他贴大字报批评滁县地委在文革中犯了错误不检讨，结果被打成“三种人”（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并被法院判刑三年，张不服，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无罪释放。因为判张少柏有罪是经过万里批准的。所以在省委政法委向万里汇报，并递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书时，万里说：最高人民法院管不了安徽省委，随之将裁决书撕碎扔进字纸篓。我当时是政法委向省委汇报政法工作的省公安厅研究科长，负责记录。亲眼目睹这场景，感到目顿口呆。在万里离开安徽后，张少柏一案被复查，张少柏被平反。

二、作家谢竟成，在稻香楼宾馆贴大字报，质问省委副书记李任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大肆攻击、中伤邓小平，“四人帮”粉碎后为什么至今不检讨。万里力保

李任之，说谢竟成破坏安徽大好的政治形势，在大会上点名要省作协开除其党籍。这是完全不按党章办事的行为，可省作协哪敢违抗，结果开除了谢的党籍。谢不服，在胡耀邦当上总书记后，万里也离开了安徽，他通过熟人，到耀邦家中申诉，其夫人李昭接待了他，并反映给耀邦，传话安徽，悄悄恢复了谢竟成的党籍。

我写万里民主意识缺失，不是否定他，而是想说明：权力不受约束，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现在我们党的腐败到如此严重地步，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不对领导人的权力加以限制，要想根除腐败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反腐败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那些领导人还要“前腐后继”呢。“把权力关进笼子”，非常好。问题是：在言论不能自由，舆论不能监督，自定规则，自己检查自己这种内部操作的情况下，只会越来越严重。关于司法改革，中央出台很多文件，说的都很好，要依法办事。可是《炎黄春秋》被非法接管，打官司，法院居然不受理。就这个行为，使那么多司法改革的文件打了水漂。

【评论】


这一课堂上得好！

凌 铭

“虽千万人，吾往矣”！在李南央《〈炎黄春秋〉的遗憾》一文的观后感里，有人以此名句赞誉作者的勇气与自信，是恰如其分的。我今年从电邮的音频里，一直聆听著作者的朗诵——《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听闻间，那种难能可贵的独立人格，真让人拍案叫绝！

作为曾经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一直来十分感佩所有刊内人物的奉献精神，时至今日仍念念不忘遭强权封杀的、铮铮铁骨的《炎黄春秋》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然而，当「遗憾」一文披露与评议该刊物曾经的决策层在“游戏规则”、“程序正义”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时，总觉得，我们不该感情用事，存有怨言，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正视批评的

呼声。正视批评，接纳批评，非但不可怕，而且十分及时，完全必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正如李南央所指出的那样：“良好民主的意愿如果不是在游戏规则下运作，实际离开民主尚远。”

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李南央的初衷就是要维护民主的基本规则，有错必纠。唯其如此，才能延续“炎黄”的香火，才能传承“炎黄”的精神。

【评论】

读李南央《〈炎黄春秋〉的遗憾》想到的

吴萍

看到朋友从微信发来的李南央写的《〈炎黄春秋〉的遗憾》一文。因为要弄懂其中的人物关系和他们的分歧所在，看得很慢。看完后匆匆写了几句感想，为的是赶紧发到微信中去：“终于看完南央写的这篇文章。真好。炎黄未倒之前，我也觉察到它的一些问题，它被突然消失以后，难过和愤怒的情绪掩盖了对它的思考，毕竟炎黄功大于过，瑕不掩瑜。现在想来，如果体制没有改变，炎黄也一样没有出路。”

其实，我的感慨很多。首先我对《炎黄》有一定的感情，第一次从单位借到这本杂志就觉得遇到了知音，按图索骥，跑到三里河出版社的所在地，以自己能够接受的财力和气力，提回一大包我认为有保留价值的过期杂志。这本杂志如何开启了我的眼界和心智自不必多言，而且杜导正、杨继绳（我的两个哥哥的校友，为他庆祝过寿辰）等人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现在知道他们都是炎黄的人，更让我多了许多对《炎黄》的关注和爱戴。但是很快，《炎黄》让我生出了第一个疑问。

由于对得到的《炎黄》的喜爱，我把买回来的那些杂志中的一些文章一一挑出，进行摘抄，然后用 word 文件格式转录到微信中，并注明了出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新一期的《炎黄》立即针对我的这一举动发出了声明警告：“发现近期有人用 word 文件格式转发炎

黄文章……”，其中不乏威胁性语言。这令我十分的不解，内心充满了沮丧。我一不是为利，二不是剽窃，转发时明确注明了转载自《炎黄》。我只是想扩大这些文章的影响，帮助传播这些思想，何罪之有。当时真的是越想越生气，非常的失望。这本杂志带给我的兴奋被一棒子打回了冷静。

读完南央的“遗憾”，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件在《炎黄》遭遇到的不愉快。我曾经给炎黄社打过电话和写过信，想请他们帮忙通过李锐联系到李南央，因为她是我的小学同学。以前我并不知道李南央是李锐的女儿，小学同学聚会时才知道的，特别想和她交流。结果被炎黄的人一口拒绝，那种冷漠的态度令我极为失望。不过这件事带给我的不愉快在找到南央之后就忘记了。

《〈炎黄春秋〉的遗憾》一文的思想特别符合我的想法。看到标题我立刻就感到有兴趣读下去，所以不管多长我都一直看完。原炎黄的哪怕一点点细微的问题南央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而且分析得如此到位和精准，令我拍案叫绝。我们是干什么的？是反对独裁，提倡宪政的一群人，我们的一言一行不可以出现我们所反对的行为，如果由于惯性出现这种行为，只要有人指出，必须立即纠正。南央对所有的看上去细微之处的问题能够一下子找到它的问题实质所在，没有曾经对问题深刻犀利的思考过程是不可能做到的。有过这种思考，并且对发现的问题清晰明了、平和有序地表达和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分析、思考、改进，这不仅仅是思想的独立和审慎，更是一种能力。我特别缺乏这种能力。所以我不但特别特别同意南央文章中的观点，也赞成她的述事方法。文章后面南央提到的“炎黄争回来的一点利益”的事情，她处理得极好，一是南央马上想到他人而不是个人，其次想到这样做是否欠妥，考虑问题十分全面和人性化。最后一点更重要，就是她叙事说理，绝不考虑别人因此会如何看待她，很多人做不到这样，我就做不到。谢谢南央让我懂得应该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期待看到她更多的好文章。🔒

2018-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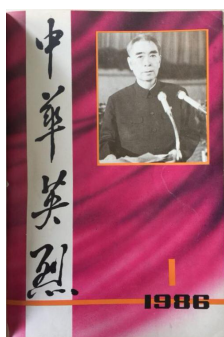
【评论】

三叹《炎黄春秋》

——读晓林君文章有感

刘 滢

近读友晓林君的一篇文章，她愤忿地揭露四年前在《炎黄春秋》的多事之秋里，小人徐某的不端行径，也勾起我对这本杂志的一些回忆。提起《炎黄春秋》，我的感触好有一比，曲有三弄，文有三叹。



一叹《中华英烈》的牺牲。我是《炎黄春秋》前身《中华英烈》杂志的编辑之一。1980年代有那么几年，审批新创报刊比较宽松，一时间半民半官的报刊不断涌现，这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气象。只要主管单位根子正、名头硬，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拿到出版号。于是在1985年底，我们七八个朋友便从四处集合到温老济泽麾下，利用正差之外的业余时间办起了《中华英烈》，由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出版。

这本杂志双月刊、16开5个印张80页，隔月开次编前会，一人主持一期，倒也从容快活。再上那时人们还爱读报章，办刊成本也低，没费多少气力，发行量已可观。我们这个近乎同人刊物的三无编辑部——无编制、无办公室、无津贴——竟然维持了三年半。其间，别说分文报酬未见，连一餐饭都难得吃。开会也是找了一间地下室，连说正事带聊大天，往往要到半夜，然后各骑自行车散去。谁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后遇那场风波，该杂志出了一期悼胡专辑，还在风波当口以创记录的速度出了一本小书《中国一周——4.15-4.22纪实》，因而受到整肃，主管部门避之不及，朋友们也都心灰意冷，淡出了这本杂志，它的后事，我亦不得知。这段时间，杂志的内容很单纯，缅怀先烈而



已。杂志的质量、分量于我们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享受独立办刊的自主、自由和快乐。



二叹《炎黄春秋》的出世。想不到没过多久，1990年初吧，这本杂志改头换面又出现在我家，只不过关系人不再是身为编辑的我，而是作为忠实读者的老妈。被牺牲的《中华英烈》找到新的挂靠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更名为《炎黄春秋》得以重生。

老妈大概从研究会那帮老家伙们那里得知凤凰涅槃了，从此每期必读，时常执笔批注，仿佛学习文件一般。读罢还要郑重收起，期期不落。如有亲朋借阅，必打借条，生怕遗失。《炎黄春秋》渐渐成为许多像老妈一样革命大半生的老人们的精神寄托，像我妈这样忠实乃至虔诚的读者大有人在。同时她也成为拨乱反正，为文革受难者平反昭雪，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标志性里程碑。这一叹，是惊叹！

三叹，叹得有点伤神——我叹《炎黄春秋》前总编吴思。

1997年，小我半代（10岁）的小老弟吴思出任《炎黄春秋》总编辑，他是我在《农民报》社时的老同事、老朋友。30多年前我俩天天骑着自行车，横穿京城东西，来回两小时结伴上下班。那时他刚从人大毕业，意气风发，一路笑语。这情景宛如昨日。1985年，我俩共赴晋江调查假药案，在一片对造假者的谴责声中，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这既是农村商品经济的洗礼，也是农民改变生产方式的“原罪”。1990年，我俩登庙堂下基层，共同采写“五个一号文件诞生记”，为农村改革鼓与呼。29年前那个夏夜，我俩一同经历人生惊魂，现场采访，忧心忡忡，泪流满面。大难之后我们先后从报社辞职，从此各奔东西，江湖相望少相见。

后来听说他出任《炎黄春秋》总编辑，杂志的影响日隆，内容也日趋庞杂，不仅框扶历史，偶尔还针贬时事，免不了时时担心常在钢丝上跳舞的小老弟。此时我已下海，虽然这本杂志的风风雨雨常有耳闻，但心思已不在此，不料想他老弟竟主持杂志十余年而不衰！

四年前，《炎黄春秋》又起风波，原本担忧这本杂志，没想到老弟首先躺枪。得知事


件原委，不免陷入更深悲哀。小小编辑部，竟也笼罩着老人政治的阴霾。《炎黄春秋》几度春秋，这回，人家还没下手，阵脚却先自乱。一本被誉为最敢言杂志，自家窝里斗的故事却了无新意；一杆所谓民主大旗，内里竟是家天下！

吴思我太了解，一介书生，无私却有思！但，虽有理论勇气、学术智慧——《潜规则》振聋发聩、《血酬定律》独有洞见；虽生性温和、崇尚改良，友称“21世纪之康梁”；虽忍辱负重、拿捏分寸，竭力维持杂志17年；却对内部缠斗束手无策，抱守规则、费尔波赖，到最后却只能长叹“我身心俱疲”，只能戚戚然拂袖而去！


依我看，此番变故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左右之争，不如说是游戏规则存废之辩。吴思所维护的无非是“社委会议事三原则”，他冒着“选边站错队”的政治风险、蒙受恋官贪权的道德置疑，甚至背上“宋江投降派”的骂名，执拗地坚守所谓三原则，说他书生气，一点儿不冤枉。然而，这三原则难道不是该杂志的民主“大法”么？多么德高望重的前辈，也不可凌架其上；多么生死攸关的决策，也不该独断专行！


据我个人亲历及所闻，改革以来的几家著名新锐媒体，如《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如《财经》杂志，如后来的《炎黄春秋》，还真不能完全归咎于管理当局的封禁。始乱于内部规则的破坏，终毁于内讧和缠斗，是令人痛心的事实。呜呼！潜规则发现者也被潜了一回。

至于晓林君揭发的杂志最后三期主编徐某，我不认识，也不关心，乃大叙事中的小人物，即便有贪也是小贪，不足挂齿。如果说总结《炎黄春秋》的兴衰，在改开以来探索出版言论自由的实践中，尚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借鉴，徐某之流也是入不得“炎黄”正史的。投机者和蠹虫什么时候都有，但我理解晓林君“祖孙三代订户”对杂志的爱之深，更同情她君子不知蝇有恶和一旦知觉后的痛之切。

这一叹，是为悲叹矣。

【来信选载】

1. 李南央写《炎黄春秋》老人主政实录，真实的描述，无加油添醋、虚构成分。我信服，以为理当如此。中共作风，烙印深刻，民主派老人骨髓里，受权力腐蚀，基因密码也有缺陷，恐是普遍共同性。李南央属新生代，沐浴欧风美雨，认同普世价值，透视痼疾症结，不为亲爹亲妈讳，实话实说，做得对！说李南央言行如此，使亲痛仇快，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她大公无私，教育公民，诚信才能立国行政。（冯士彦，民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国农工民主党八旬党员）

2. 读王晓林文章，更有亲者痛的感受。这痛也不是来自文章写作，而是来自文章叙述的人事。不敢相信徐庆全先生是这样的品行，但作者实名叙述实名举报，或许不假？看到文中讲述的徐对物质利益的贪图，联想到李南央文章中讲到的徐要讨论“宋江架空晁盖”问题，提出不让当总编就摊牌的要求等，如果都是事实，综合在一起看，就可谓品行不端了。使亲者痛的是，大家这么珍惜的《炎黄春秋》，竟会由一人决定，让品行不端的人来主持。虽然更喜欢比这篇文章更平实的叙述语言，但同意作者的看法：不应该对道德、人性、人格、人品的因素弃之不顾。固然什么样的人可能都有长处，但包容之间，还是应该避免由品行不端的人主持《炎黄春秋》。西方的民主选举也是重视这方面因素的。（江夫）

3. 我读了李南央在的《记忆》上的文章，很感慨，也很钦佩。多年来，“炎黄老人们”为在中国推动“宪政民主”鼓与呼，《炎黄春秋》成为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令人赞叹和景仰。李南央珍重这座丰碑，爱戴自己的父亲李锐——他的晚年与《炎黄春秋》不可分开。但较真的李南央也指出：当对一件非常重要的内部问题做决定时，“追求宪政民主老人的头脑中，没有‘游戏规则’的概念”，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去遵循，在行事方式上违背了自己鼓吹的理念，此为“《炎黄春秋》的遗憾”。

国人往往“为尊者讳”，往往为维护“高大完美”而遮掩瑕疵，往往为“顾全大局”而无视缺失。李南央不是这样。尤为难得的是，她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批评的一个对象是自己年过百岁、来日无多、在一些人心中几成“亚圣”的父亲李锐。“崇尚真实 崇尚独立”是“炎黄老人们”付出了几乎一辈子的生命代价获取的“真经”，李南央秉承了父辈的精神，她不愧为李锐先生的女儿。🔒（叶维丽）

4. 李南央关于炎黄春秋内部问题及其认识，的确太重要了，关心炎黄春秋的人都应当了解。🔒（蔡新平）

5. 我是《炎黄春秋》多年自费订户老读者，对以杜老为首的几位老同志，我无限崇敬。但我完全同意李南央的文章所写的事实和评判。功败垂成，令人痛惜！如果让吴思的策略办理，将是另一种局面。🔒（许有为，合肥学院93岁离休干部）

6. 李老师，此文非常好。正因为是你，才能写出这样的客观的文章！向你敬礼。🔒（薛原）

7. 《炎黄》被扼死，无论具体原因有多么复杂，这也只能是一个必然结果。就连被“招安”的可能也都没有。因为它太典型，太具有象征意义了。它就是一面“跟党不一心儿”的旗帜。想活都没有机会。因此《炎黄》之死也是一个里程碑——连牌坊也不要立了。其实《炎黄》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牌坊工程”。王晓林的文章塑造了一个非常典型人物徐某，无耻，无赖，以至无以复加。这样的人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不乏其人。至于这个典型与生活中真实的徐有多大距离，是另外一回事。读到文章的人，只能以文本为依据。🔒（国庆）

8. 《炎黄春秋》从一出世，就像一把火，点燃在一片启蒙的土地上，一直是一些人的眼中钉，必欲除之。她是在压力下长大，凝聚了杜老以及同仁多少心血。然而她的中流砥柱——社委会，这个杜老亲手创建的机构，再由他（不经意间？）亲手废掉，令人惋惜。为杜老惋惜。总归感觉，这是《炎黄春秋》不能回避的历史。说出它，就像这本刊物曾经给过我们的那么多真实一样。要把真实留住，尽管很多真实有可能伤害我们的感情。真实，才是历史的最大魅力。她能留给人们思考。谢谢南央写出了它。🔒（王津津）

9. 我们“老三届”中服膺民主法制和宪政理念的明白人不少，李南央是我们当中难能可贵，仍然冲锋在前的一个。公开批评父母一辈的缺陷（特别是自己的双亲），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理念、理性的支撑。李南央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警醒，且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追求民主宪政的人，如果缺少程序公正和游戏规则，也有可能重蹈专制的覆辙。《炎黄春秋》已经进入了历史，南央这篇回顾和总结失败教训的文章非常好！

此前见到王晓林的一篇谈炎黄用人的文章，列举了前《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一些事例，说他投其所好，骗取了杜导正的信任，在《炎黄春秋》杂志社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这也是值得警醒的一个教训——邓小平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大意）。何况坏人！官方带病提拔是因为制度不好，为什么整天批评这种制度的炎黄也会带病提拔？看来，炎黄的用人制度也大有问题。🔒（马昌海）

10. 作为热爱“炎黄”的读者，目睹了“…遗憾”，的确有遗憾，但“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炎黄精神的真正继承者”等评语又激励了多少人！？“希望”是最宝贵的财富，“卒章显其志”的第五部分，完全认同，十分欣赏，令人感奋。我比您大五岁（民国三十四年生），我们尽管谈不上“同在同一条战壕里”，但都在为“宪政大开张”添砖加瓦，贡献心力。青山不改，碧水长流！🔒（凌铭）

【资料】

《炎黄春秋》2011-2016/7 年总目

王晓林整理

年月号	页码	题目	作者
2011-1	1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本刊编辑部
	2	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 95 周年感言	胡启立
	4	习仲勋冤案始末	贾巨川
	11	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	夏宇立
	17	“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	雷颐
	22	胡乔木词与杭州毁墓拆碑	毛德传
	25	肥东县大李大队 1960 年饥荒调查	管怀伦
	31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尹曙生
	36	我看“中国模式”	杨继绳
	43	论表达权与言论自由	郭道晖
	48	错案探究：公权无界与私权无助	魏兴荣
	51	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	王硕
	56	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卞权
	60	1980 年代思想启蒙感言	符利民
	63	“史民文化”与“史官文化”	黄一龙
	65	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赵宗礼
	69	黄宗江的新居	沙漠
	71	女书法家冯铸	礼谦

-
- | | | |
|--------|-----------------------|------------------|
| 73 | 我国首枚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常规弹头研制纪实 | 王菁珩 |
| 79 | 1945年8月：牡丹江焦土之战 | 闫强 |
| 84 | 一个被俘志愿军战士的自述 | 王二根 口述 李文林 整理 |
| 89 | 《故事报》的“精神污染”案 | 高跃男 |
| 91 | 读《茂林悲歌》 | 刘谓福 |
| 93 | 再谈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起草者 | 高放 |
| 94 | 来信摘登 | 王友琴等 |
|
 | | |
| 2011-2 | 1 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 蔡定剑（遗稿） |
| | 9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 韩钢 |
| | 19 亲历邓小平南巡 | 李罗力 |
| | 24 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 | 江平口述 陈夏红整理 |
| | 30 《刘少奇选集》文稿的遭遇 | 马懋如 |
| | 33 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 白而强 |
| | 39 亲历大跃进中的湖北教育革命 | 刘绪贻 口述 宋雯 赵晓悦 整理 |
| | 43 彭德怀和毛泽东对民主的不同看法 | 何定 |
| | 49 北平和平解放幕后的苏联身影 | 徐元宫 |
| | 54 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 叶永和 蒋燕燕 |
| | 56 来信摘登 | 祝江白等 |
| | 57 胡耀邦为何要反封建专制主义 | 胡德平 |
| | 59 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 李维民 |
| | 62 漫谈“中产阶级” | 周有光 |
| | 64 邓子恢和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试验 | 许人俊 |
| | 72 刘瑞龙指挥百万“民工大军” | 庄重 |

-
- | | | |
|--------|--------------------------|------------|
| 75 | 胡乔木在 1956—1957 年间的“右派言论” | 李慎之 |
| 76 | 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 朱瑞熙 王灿 |
| 79 | 我对不起老师们 | 周继能 |
| 83 | 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 | 吴思 |
| 87 | 读《牛汉自述》 | 管士光 |
| 91 | 尼尔斯·卡莱比及其功能社会主义 | 高锋 |
| | | |
| 2011-3 | 1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 沈志华 |
| | 9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 | 韩钢 |
| | 7 1957 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 王海光 |
| | 24 北京郊区友好公社对外交往琐事 | 陈徒手 |
| | 32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 李海文 |
| | 39 日本侵华时的间谍活动 | 孟悦 |
| | 42 “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 | 张绪山 |
| | 46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的蔡定剑 | 李蒙 |
| | 51 胡耀邦与裴昌会信义相交 | 胡德平 |
| | 53 杨士杰人生的两件大事 | 杨荣甲 |
| | 58 国际问题评论员蒋元椿 | 钱江 |
| | 62 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 | 杨继绳 |
| | 65 1958 年我批评“大跃进” | 周仰颐 |
| | 68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 周瑞金 |
| | 70 《大秦帝国》的“反动性” | 董健口述 高子文整理 |
| | 74 陈丕显、曹荻秋反对大串联 | 金大陆 |
| | 79 王夫和地道战 | 王端阳 |

81	张作霖与溥仪交往秘闻	康艳华
86	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孙冶方
89	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	洪振快
2011-4		
1	人权六十年：从否弃到回归	郭道晖
8	“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	尹曙生
13	从票证兴废看中国经济	林培山
16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王辉
21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赵元三
26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的感受	郝怀明
31	我采访了波尔布特	谢文清
32	猜出粉碎“四人帮”之后	陈启森
34	我国高校发展的三个问题	朱九思
39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改变思维	蔡霞
42	评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	宫希魁
48	走出秦城的周扬	周密
53	朱瑞与“宁都暴动”	郑建英
59	对主粮转基因的忧虑	丛亚平
65	对《四渡赤水评价考》的看法	张幸仔
67	谭启龙的饥荒调查	肖磊
69	追思童大林	林开明
73	冯森龄：那个年代的好记者	戴国强
76	他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	萧功秦
77	娄烦土改及纠偏	张贵桃

-
- | | | |
|--------|--------------------------|---------------|
| 80 | 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 吴传斗 |
| 82 | 一个小干部的三起三落 | 李世华 |
| 85 |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 董时进 |
| 89 |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 | 蒋华志 |
| 94 | 读者来信摘登 | 文扬等 |
| | | |
| 2011-5 | 1 中国宪法为何难以落实 | 张千帆 |
| | 7 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 王海光 于南 |
| | 14 周恩来张闻天外交风格异同 | 何方 |
| | 16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及实施 | 曾丽雅 |
| | 19 新闻发言人制度与胡耀邦 | 吴兴唐 |
| | 22 1957—1960年南阳专区信访的工作教训 | 赵宗礼 |
| | 26 萧乾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 经纬 胡治安 |
| | 30 文革前的《文史资料选辑》 | 雷戈 |
| | 35 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 | 施京吾 |
| | 40 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 彭国翔 |
| | 45 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书 | 任复兴 |
| | 49 周巍峙回忆周恩来 | 徐庆全 |
| | 56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 张松林 口述 郭宇宽 整理 |
| | 58 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 | 王录生 |
| | 60 吴江在拨乱反正中 | 沈宝祥 |
| | 65 卢芷芬之死：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的余波 | 卢元镇 |
| | 68 徐孔：因直言而落难 | 白石 |
| | 72 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 | 李华 |

-
- | | | |
|--------|-------------------------|--------------|
| 73 | 介绍《爱的哲学》 | 李锐 |
| 77 | 我走进了“胡风分子”圈 | 彭小莲 |
| 81 | 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 | 高王凌 |
| 85 | 苏俄的“政治自由”问题 | 金雁 |
| 92 | 来信摘登 | 许人俊等 |
|
 | | |
| 2011-6 | 1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 沈志华 董洁 |
| 12 | 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 林蕴晖 |
| 17 | 解读“韬光养晦”战略 | 子明 |
| 21 |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考察 | 王也扬 |
| 26 | 记杜润生的三次谈话 | 张北英 |
| 29 |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 朱永嘉 口述 金光耀整理 |
| 36 | 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 | 郝怀明 |
| 39 | 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 | 宋万国 |
| 41 | 政治与学术：一篇文章的遭遇 | 苏双碧 |
| 44 | 一位党史教员在百家争鸣后的遭遇 | 张寄谦 |
| 48 | 信访制度存废议 | 邵燕祥 |
| 50 |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 刘泽华 |
| 56 | “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附：方徨信） | 钱江 |
| 61 | 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 | 平乃彬 |
| 66 | “穷棒子社”白薯亩产之谜 | 刘一皋 |
| 70 | 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 | 李原 |
| 72 | 《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 | 张刃 |
| 77 | 吴满有的两段人生 | 朱鸿召 |

- 81 夏衍的一次仗义执言 方小宁
- 82 张学良在物资、财政上对陕北红军的援助 张友坤
- 85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序 程兆奇
- 87 我对反右起因的解释 朱正
- 90 “做官发财”有传统 张绪山

2011-7 1 适应时代 与时俱进——建党九十周年笔谈

- 1 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沈宝祥
- 3 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 何方
- 5 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郭道晖
- 8 言论自由关系到党的兴衰 王海光
- 10 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才能保障民生 张曙光
- 11 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周瑞金
- 13 1959 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萧扬
- 18 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省委书记宋平倡导的一次改革讨论 秦卫东
- 21 1966 年四见陈丕显 张文豹口述 黄谦 整理
- 26 一个沉冤几十年的大案 童梓平
- 31 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 徐学江
- 35 “延安一代”和“红岩一代”的心路历程——兼说他们的“两头真” 穆广仁
- 38 1957 年的汉阳一中事件 朱岩
- 40 李锐的坐牢心得 韩磊
- 42 齐燕铭看闹剧 马林
- 44 崔万秋不是文化特务 毛德传
- 46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程郁

51	我为周扬敲边鼓	邓伟志
53	一次“特殊”的抄家	季旭东
55	参加革命前后的记忆	戴煌
59	重读《国际歌》感言	杨起
64	读《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翁永曦
66	湘西王陈渠珍	罗维
71	抗日名将孙立人	陈华 综合整理
75	我在“初澜”写文章	吴启文
78	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	袁伟时
86	三国张鲁的“共产主义”辉煌	韩起
88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王铁群
2011-8	1 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王占阳
	6 关于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的重要修正	高锴
	9 苏俄对华政策与中共建党	夏白鸽
	15 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	胡治安
	21 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	王晓中
	26 1958年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原委	崔敏
	31 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	萧扬整理
	34 1945年中苏军队会师的一些情况	段涞恒
	41 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	蔡晓鹏
	47 我和伯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通信	吴昆
	49 文史资料委员会建立的前因后果	雷戈
	51 如何跳出反腐困境：建党90年的思考	李永忠

55	谨防改革走偏	张千帆
59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軾
61	在胡耀邦家做客	陆魁宏
65	在南宁陪首长跳舞	郭美春
69	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	魏海林
73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文革纪事	张军
78	也谈儒家与民主：与彭国翔先生商榷	解正中
82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王树人	解芳雯
84	痛别陆钦侃老友	李锐
86	苏联顾问与斯大林模式移植东欧	徐元宫
94	读者来信摘登	温兴路等
95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感言	杜导正
96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杨汝岱
96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贺词	许嘉璐
2011-9	1 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周瑞金
	12 重新评估三民主义的价值	匡萃坚
	19 辛亥百年的主航道	朱相远
	22 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刘泽华
	28 苏联“八一九”事变目击记	张锡恩
	34 楚图南在美国领事馆避难记	楚泽涵
	38 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探索追忆	陈廷祚
	41 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李永忠 董瑛
	45 论孔子的复活	张绪山

-
- | | | |
|---------|---|-----------------------|
| 50 |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口述 | 艾玲 整理 洪小文 |
| 53 |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 朱锡琪 访谈 金光耀 金大陆 整理 孙路遥 |
| 59 | 张闻天理论的两大亮点 | 张培森 |
| 66 |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 陈徒手 |
| 70 | 陈登科的“瞒和骗” | 陆志成 |
| 74 | 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 | 唐宝林 |
| 79 | 第二次“伍豪事件” | 丁伟 郭德宏 |
| 81 | 为什么只有一位井冈山籍的开国将军？ | 孙伟 |
| 84 | 张学良最恨日本，为什么打苏联？ | 张晓丹 王海晨 |
| 89 | 1956—1957：越南“双百”运动人物素描 | 程映虹 |
| 93 | “求实存真”的一面旗帜 | 郭德宏 |
| 94 | 读者来信摘登 | 脱恩铸等 |
|
 | | |
| 2011-10 | 1 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 雷颐 |
| | 7 安庆巡警学堂起义记 | 尹曙生 |
| | 10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 李伟东 程敏 执笔 |
| | 16 走进全球化 | 周有光 |
| | 18 再说新民主主义 | 王也扬 |
| | 20 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 | 陈其阵 |
| | 25 荣经“五九事件” | 童梓平 |
| | 28 广州“文革”中打杀“劳改犯” | 万绮芬 |
| | 29 饥饿的学生时代 | 石圭平 |
| | 32 我们公社的“反革命案件” | 宋士华 |

- | | | |
|----|-------------------|------------------|
| 34 | 走出伪民主误区 | 许良英 |
| 37 |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长征 | 王龙 |
| 40 | 毛远新再谈毛泽东 1976 年状况 | 阎长贵 |
| 41 | 应客观评价曾希圣 | 张军 |
| 43 | 批判陶行知始末 | 李仲谋 |
| 49 | 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 | 秦卫东 |
| 52 | 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 | 萧凌 |
| 57 | 骨头如故作铜声：读李锐“流放”日记 | 奚青 |
| 63 | 《汉阳一中事件》的纠误 | 李功成 |
| 64 | 远征印缅见闻 | 刘金海 口述 刘德玺 整理 |
| 69 |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 | 被访谈者 朱永嘉 访谈者 顾训中 |
| 75 |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 赵英秀 |
| 77 | 南怀瑾：海峡两岸的信使 | 周瑞金 |
| 80 | 长征中几个细节的考辨 | 夏宇立 |
| 86 | 罗隆基人权与法治史观 | 刘志强 |
| 92 | 我打地主堂曾祖母 | 黄仪瑛 |
| 93 | 对《抗日名将孙立人》一文的几点意见 | 王伯惠 |
-
- | | | | |
|---------|----|--------------------|---------------|
| 2011-11 | 1 |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综述 | 程敏 建军 整理 |
| | 8 | 希望工程是否存在“黑幕”的辩论 | 郭宇宽 |
| | 14 |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 | 蒋庆泉 口述 寇德印 整理 |
| | 21 | 中国改革：从摸石头过河到架桥过河 | 聂辉华 |
| | 25 | 政治体制改革躲不开绕不过 | 虞崇胜 |
| | 29 | 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演进 | 郭道晖 |

-
- | | | |
|---------|------------------|-------------------|
| 32 | 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 | 胡治安 |
| 43 | 张执一与隐蔽战线工作 | 张惠卿 |
| 47 | 王实味在开封女中 | 沈志平 沈建平 |
| 50 | 质疑“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说 | 张光明 |
| 54 |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 | 胡新民 |
| 56 | “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 | 阎长贵 |
| 58 | 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 | 李锐 |
| 63 | 天台“犁豆事件”始末 | 郑普顺 |
| 67 | 《内蒙春光》影片风波 | 朱安平 |
| 72 | 小说《刘志丹》第二次被禁情况补充 | 王晓中 |
| 76 | 我的父亲“丁海关” | 丁耀琳 |
| 79 |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 | 朱正 |
| 83 | 失落自我回归自我 | 资中筠 |
| 86 |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观察 | 王铁群 |
| 91 | 日本“买下美国”的教训 | 张焕利 |
| 93 | 读者来信摘登 | 朱夏生等 |
|
 | | |
| 2011-12 | 1 文化体制改革笔谈 | 朱正、杨继绳、王建勋、笑蜀、廖可斌 |
| | 6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 | 王海光 |
| | 15 胡耀邦最后的日子 | 刘崇文 |
| | 19 我在“文革”中的际遇 | 刘泽华 |
| | 26 我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 | 彦世义 口述 成积春 记录整理 |
| | 29 走出权力欲望的恶性果报 | 张绪山 |
| | 33 列宁遗体“去留之争”的联想 | 李景贤 |

36	北岛回忆里的卧底话题	毕星星
39	茅盾 1949 年的尴尬处境	商昌宝
44	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陈徒手
51	做蛋糕、分蛋糕还是抢蛋糕、偷蛋糕	薛沙
55	“新三民主义”是一种讹传	应克复
57	宪政社会主义要伸张民权	何炼成
59	毛泽东为何一再赞扬郭嘉	吴江
63	首批特赦战犯获释后	瞿宛林
67	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周七月
71	《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	陈定学
74	“中南海黑旗事件”已经平反	容全堂
77	瞿秋白被害谁之罪？	秦摩亚
81	长者黎澍	李小丁
84	方方在香港	庄世平
88	读者来信摘登	陈鹤 等
90	《炎黄春秋》2011 年目录	本刊编辑部
2012-1	1 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	本刊编辑部
	2 我看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	郭道晖
	6 “失踪条款”违反基本道德原则	余良明
	10 党内分权制衡的来历和经验	思源
	14 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程敏
	22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28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34	胡风案中的“一同志”	沈国凡
39	怀念父亲徐雪寒	徐淮
42	胡开明在安徽	张育
48	汪达之：教育史上的一段实践	孙肖平
54	东北抗联的一桩公案	张克 黄强
58	我成了“活人展览”的展品	李果河
61	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杨德春
65	陈永贵与记者的恩怨	金嘉声
70	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彭古
72	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黄钟
79	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何伟
84	长征路上的松潘战役	夏宇立
89	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	程映虹
94	读者来信摘登	刘崇文 等
2012-2	1 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	孙旭培
	8 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	穆广仁
	10 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	高王凌
	13 王元化：对启蒙思想的反思	吴琦幸
	17 知情者谈饶漱石	景玉川
	25 我知道的《苏日中立条约》	王健
	28 文革中的两岸关系	孙宗一
	32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孙言诚
	38 救国会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王国栋 王久战

-
- | | | |
|--------|------------------------|-----------------|
| 41 | 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当总编 | 皮学军 |
| 47 | 潘汉年主持上海政法工作二三事 | 吴越 |
| 49 | 也谈瞿秋白遇害 | 赵于平 |
| 50 |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 袁伟时 |
| 55 | 重温新民主主义姚力文 | 刘建平 |
| 60 | 我看宪政社会主义 | 萧功秦 |
| 62 | 田纪云 1988 年谈通胀 | 丁龙嘉 |
| 67 | 1973 年周恩来为何挨批 | 金伯雄 |
| 71 | 胡耀邦 1983 年湘西之行 | 章发林 |
| 74 | 劳动直属营的军队右派 | 陈挺 |
| 78 | 新四军首长轶 | 陶泊 口述 陶京天 整理 |
| 80 | 广西昭平公社化与大炼钢铁 | 胡辉 |
| 82 | 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个阶段 | 吴启文 |
| 87 | 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 | 侯宜杰 |
| 90 | 美国的党代会：团结而胜负难料的大会 | 董郁玉 |
| | | |
| 2012-3 | 1 “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实践中为何走向反面 | 王铁群 |
| | 4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 | 沈志华 |
| | 14 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 | 胡治安 |
| | 21 1940 年延安审干 | 高华 |
| | 28 我经历的 1976 年天安门事件 | 吴忠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
| | 35 叶圣陶日记中的出版总署“三反”运动 | 叶永和 蒋燕燕 |
| | 41 金银滩之痛 | 尹曙生 |
| | 46 1959 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 | 李洪林 |

53	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陈学政
57	凌霄参与“贵定反共救国军”疑团	蒙凯
60	一个生产队的死亡档案	金家富
62	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	孟令骞
68	川康民盟冤案是怎么造成的	金拾珊 张宁
71	林彪“九八手令”怎么会有两份	张聿温
72	“大跃进”中的周小舟	刘玉佳
75	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	邵燕祥
78	吴晗挨批后的心态变化	吴厚荣
81	蒋介石批钱给陈独秀	裴高才
82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倒退	陆南泉
88	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张希清
89	《炎黄春秋》的体制探索是成功的	杜导正
90	新春联谊会嘉宾发言摘要	杜明明 整理
93	读者来信摘登殷叙彝 等	
2012-4	1 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与创新	周瑞金
	8 “七千人大会”五十周年的思考	王聿文
	17 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	杜导正
	20 五十年代初的上海报业转制：从民办到党管	张济顺
	27 毛泽东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若干史实	胡学常
	31 新民主主义中有没有民主的概念	高王凌
	33 我被署名的文章成为石家庄反右号角	刘泽华
	35 我上《献国策》前后	李天德

41	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徐兆淮
44	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	应克复
50	试答“何方之问”	杨继绳
55	不低头的林韦	钱江
58	从梅贻琦说清华	待考
60	我和高华的交往	萧功秦
64	史铁生与三本书	王克明
68	罗哲文谈梁思成	许水涛
73	八十年代，一场未完成的启蒙	郭震旦
77	瞿秋白两度担任中共领袖	马长虹
81	希望大家看看这本书	戴煌
83	民国的公民教育	毕苑
86	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	吴思
94	《知情者谈饶漱石》文中的问题	黄家生
2012-5	1 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本刊座谈会摘要	杜明明 整理
	8 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何方
	16 反思八十年代“严打”	崔敏
	23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尹保云
	29 吴忠谈抓“四人帮”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整理
	32 追忆朱厚泽	杨继绳
	39 “文革”殉难者邓拓	袁鹰
	42 怀念诗人方然	彭小莲
	48 寻找张国焘墓地	桑宜川

52	“破四旧”的表与里	米鹤都
57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晏乐斌
60	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中的悲剧	杨崇诚
65	听胡耀邦谈诗和民主	张万舒
67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	熊先觉
68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黄家南
71	1988年访美印象	田纪云
74	林彪叛逃后我奉命做的几件事	武健华
81	苏联灭亡的六个原因	高放
84	违心的报应	何琼玮
86	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	侯宜杰
90	美国的党争	董郁玉
93	读者来信摘	魏永征 平乃彬 赵平江
2012-6	1 胡耀邦治丧手记	章立凡
	9 我奉命封杀贺绿汀文章	陈清泉
	13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阎长贵
	20 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郭道晖
	25 经济转型的瓶颈是政改滞后	陆德
	28 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米鹤都
	32 应该抛开“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	王录生
	35 苏东剧变：回归人类文明	韩云川
	39 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智效民
	47 光明日报社的“反右”运动	皮学军

-
- | | | |
|--------|---------------------|------|
| 54 | 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 尹曙生 |
| 57 | 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平反冤假错案 | 李盛平 |
| 61 | 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 | 张千帆 |
| 66 | 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 | 马懋如 |
| 69 | 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 | 马小冈 |
| 73 | “伤心桥下春波绿”：读李锐流放日记 | 奚青 |
| 81 | 谷牧与叶帅：读《谷牧回忆录》 | 袁小伦 |
| 85 | 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 施亮 |
| 87 | 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真相 | 左凤荣 |
| 93 | 补一封朱家骅致陈独秀函 | 刘宪阁等 |
| | | |
| 2012-7 | 1 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 燕凌 |
| | 8 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的轨迹 | 王铁群 |
| | 14 三次死里逃生记 | 季音 |
| | 20 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 | 尹曙生 |
| | 26 柯瓦廖夫和韩素音编造的故事 | 李洁 |
| | 32 马良骏是叛徒吗？ | 冯亚光 |
| | 37 杜润生：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 吴象 |
| | 42 赵紫阳在内蒙古 | 石圭平 |
| | 46 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 | 李澈 |
| | 53 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 | 闫桂勋 |
| | 57 杨伟名和他的《一叶知秋》 | 陈大斌 |
| | 61 台湾百年民主路 | 杭之 |
| | 69 八十三张反动标语案 | 高小平 |

74	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	帅好
79	邓颖超家乡的一个案件	徐德瑞
82	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阎长贵
85	林则徐的《传牌稿》	李耐因
87	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段宇宏
94	《金银滩之痛》一文补遗	王菁珩
2012-8	1 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晏乐斌
	10 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	孙旭培
	17 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	王健
	24 回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	田纪云
	27 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	尹保云
	34 审判独立的60年纷争	崔敏
	40 毛主席怎样培育834部队	武健华
	47 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	陈徒手
	53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邓振新
	57 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	姜万里
	60 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	马龙闪
	64 杜润生：一个符号	陈越光
	65 张恺帆在1959年	宋霖
	72 南京解放前后的	陈修良 唐宝林
	80 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韶华
	84 怀着青年时代的共同理想	穆广仁
	87 陈翰笙的五个细节	高放

89	美国政党的轮流执政与司法独立	董郁玉
92	读者来信摘登	凌云等
2012-9	1 “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	李步云
	7 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周永坤
	15 “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	钱理群
	22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杜导正
	26 宪政审查的世界经验	张千帆
	32 另类烈士：大校右派蔡铁根	蔡金刚
	40 许立群、姚溱因《二月提纲》遭厄运	马懋如
	44 王芸生在1949年后	张颂甲
	48 中国的税负和官民比	王安
	53 梁漱溟记述的顶撞毛泽东事件	梁培恕
	56 从平民权利角度看台湾转型	笑蜀
	61 “写史料”为何成了“写交待”	雷戈
	65 “党政分开”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吗？	高锴
	67 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	周育民
	71 美国轰炸东京与中国拯救机组人员	傅中
	76 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	谢贵平
	80 茅以升入党前前后后	胡治安
	83 关于《淮海日记摘抄》一文的说明	本刊编辑部
	84 从莫干山会议到京丰宾馆会议	马小冈
	86 柯伦泰：从斗士到花瓶	程映虹
	93 纠正《光明日报社的“反右”运动》的一些说法	王强华

94	读者来信摘登	钟志奇等
2012-10	1 95年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沈志华
9	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张济顺
15	赵健民在20世纪50年代反“	丁龙嘉
22	“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演变	应克复
30	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	徐振方
36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丁东
41	老报人办报记	范钧
47	我了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	宋金寿
56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	金大陆
58	日本“开拓团”中“大陆新娘”	孟月明 张洁
62	张学良痛斥国民政府腐败	张友坤
64	老友施拉姆	李锐
65	怀念《我们》剧作家王正和肖里	杜高
68	潘家铮与三峡工程	李楯
71	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	刘泽华
77	“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	张绪山
82	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两种“版本”	罗庆洪 黄少群
86	名校名教授是怎样被“思想改造”的	邵燕祥
92	提供一点更正	殷毅
93	读者来信摘登	冯冰等
2012-11	1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

3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晏乐斌
12	策动朱德政变的匿名信案	杨宪澄
22	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	董郁玉
26	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	崔敏
34	从内部讲话看大跃进时期的高层情绪	陈徒手
40	饶漱石与“饶、潘、扬反革命案”	景玉川
44	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李锐
48	时代问题判断有误就会危害全局	何方
50	中国的“东方红”现象	王西麟
53	从反右运动看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	沙尚之
57	江青夜闯西花厅	武健华
63	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智效民
70	批注毛泽东著作引发的血案	阎纲
74	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	侯宜杰
79	父亲扬帆的晚年岁月	小朝
84	联共（布）党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马龙闪
93	“六教授座谈会”与“章罗同盟”拾遗	阎秉华
94	陈修良的几件往事	黄铭
2012-12	1 依法治国 依宪执政	洪振快 整理
	6 规范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郭道晖
	11 从党治走向法治	李步云
	14 司法改革应向世界主流看	齐江平
	16 党内民主破局可从“三落实”入手	任剑涛

19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陈志武
22	劳教制度的历史与废除呼声	周永坤
29	解读 1949 年国号之争	丛日云
36	毛泽东图像的修改	杨昊成
44	胡绩伟在党性与人性争议中	余焕椿
50	政法委历史与演变的再思考	钟金燕
57	马思聪的“逃亡曲”	马之庸
64	邓拓被毛泽东训斥后的反应	陈泊微
66	民主转型中的历史问题处理	荣剑
73	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	崔敏
76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交锋	唐宝林
80	“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	Khamboly Dy 著 王友琴 译
87	读者来信摘登	王敏清 贾康 等
91	《炎黄春秋》2012 年目录	本刊编辑部
2013-1	1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本刊编辑部
	2 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周瑞金
	9 万州的“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刘国平
	14 一个生产队的四清	于俊沂
	16 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裴毅
	18 江青八次到天津	王辉
	22 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尹曙生
	28 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	戴煌
	33 《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	卢惠龙

35	冯雪峰两首遗诗	季音
36	1950, 晏阳初在去留之间	宋恩荣 张睦楚
42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马林
48	张玺一生的几件大事	刘洪声 张林南
54	王缵绪辞官抗日	王宇知
59	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马雨农
64	中原突围: 四位女性的人生	乔海燕 傅苓
70	八十年代关于《资本论》的学术风波	王恩重
72	元宝山牧场的“挖肃”灾难	原志久 刘凤歧
77	海打战役流产的历史真相	夏宇立
82	对柯瓦廖夫报告与访谈录的不同评价	李维民
88	档案记载的苏联饥荒(1929—1934)	李玉贞
94	读者来信	张仙权 许岳林
2013-2	1 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	武健华
	9 1957年公安部整风反右运动	晏乐斌
	26 “贵州事件”始末	张再兴
	31 我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张泽石
	36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密召开记	毛华鹤
	39 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	小朝 整理
	41 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韩爱晶
	45 康生的秘书谈康生	阎长贵
	48 “非法之法”与公民的抵抗权	郭道晖
	53 重提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	吴江

-
- | | | |
|--------|-------------------|-------------|
| 55 | 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 | 杨宪澄 |
| 59 | 蒋经国晚年的政治革新 | 褚静涛 |
| 64 | 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 智效民 |
| 68 | 1960年我为安徽省人委食堂买鱼 | 唐生荣 |
| 70 | 法学家盛振为先生晚年的思考 | 盛芸 |
| 75 |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 | 董郁玉 |
| 81 | 读《延安日记》 | 向继东 |
| 84 | 散议《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 高越农 |
| 86 | 让人诽谤的“诽谤木” | 侯宜杰 |
| 89 | 契卡：建立清一色政府的工具 | 闻一 |
|
 | | |
| 2013-3 | 1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 | 高锴 |
| | 6 四项基本原则有两个版本 | 刘山鹰 |
| | 11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 | 江春泽 |
| | 18 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 | 蒯大富口述 米鹤都整理 |
| | 29 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 施义之口述 陈枫整理 |
| | 40 陈赓反左：顶住不办 | 滕叙尧 |
| | 45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 刘家驹 |
| | 50 毛泽东与《文艺报·再批判》 | 阎纲 |
| | 54 张莘夫遇害事件真相考 | 待查 |
| | 56 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吗？ | 冯伟 |
| | 58 1985年的粮食大减产 | 郑振源 |
| | 60 不断自我启蒙的王来棣 | 傅国涌 |
| | 64 从梨园屯教案谈义和团的起源 | 周育民 |

-
- | | | |
|----|-------------------|----------|
| 68 | “阳谋”不是 1957 年才出现的 | 李建军 |
| 69 | 蒋经国与台湾政治转型 | 王铁群 |
| 72 | 重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功过 | 吴兴唐 |
| 79 | 延安文艺：从繁荣到沉寂 | 王克明 |
| 83 | 卡斯特罗是否受毛泽东《讲话》的影响 | 程映虹 |
| 85 | 美国宪法精神探求 | 张千帆 |
| 93 | 读者来信摘登 | 张纪榆 冯冰 等 |
-
- | | | |
|--------|-----------------------------|----------------|
| 2013-4 | 1 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 | 本刊编辑部 |
| | 7 《社会报》在改革浪潮中起落 | 蓝成东 |
| | 10 中国政改研究会的来龙去脉 | 杜光 |
| | 14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 陈仲旋 |
| | 20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朱维铮口述 金光耀 采访整理 |
| | 26 李慎之逝世十周年祭 | 董健口述 高子文整理 |
| | 31 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 | 孙旭培 |
| | 38 党在法下：八二宪法的关键原则 | 黄钟 |
| | 44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 | 沈志华 |
| | 51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 | 胡学常 |
| | 56 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 马龙闪 |
| | 62 “灰皮书”的由来与发展 | 张惠卿 |
| | 69 也说《顾准文集》的出版 | 唐继无 |
| | 71 关于牟宜之 | 李锐 |
| | 73 毛泽东与胡风事件 | 钱理群 |
| | 78 蒋荫恩其人其事 | 王鹏 |

80	1942年《大公报》怎样披露河南大灾	张高峰（遗稿）
84	假如郭小川活到今天	邵燕祥
87	《鲁迅嘉言录》献词	曾彦修
91	同一个诺奖，不同的命运	陈为人
2013-5	1 “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	郭世佑
	6 “劳教问题的决定”出台前后	晏乐斌
	9 反思“工业学大庆”	毛华鹤
	15 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王广宇
	17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王保春	王文耀
	24 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	施义之 口述 陈枫 整理
	29 陈水扁这面镜子	李洪林
	31 “两类矛盾”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王也扬
	38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	赵晓铃
	45 1949年前后中美错失建交机遇	高放
	48 新四军生活追忆	郑青如
	51 我的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时学爱
	53 毛泽东批评《文艺报》“文也不足”之后	阎纲
	57 田汉对我说的心理话	韩淮
	59 熊十力二三事	阎秉华
	62 我的两位吴老师	章明
	63 “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	余汝信
	65 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韶华
	70 《讲话》前后的延安戏剧	王克明

-
- | | | |
|--------|--------------------|-------------|
| 76 |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 施滨海 |
| 83 | 古今“罪己诏” | 侯宜杰 |
| 86 | 苏俄的新闻审查 | 李玉贞 |
| 91 | 读《苏共亡党之谜》 | 王进 |
| | | |
| 2013-6 | 1 宪法序言及其效力争议 | 张千帆 |
| | 7 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 | 李维民 |
| | 10 日本人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 | 刘柠 |
| | 16 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 杨继绳 |
| | 24 延安新闻界的两个事件 | 张林冬口述 田子渝整理 |
| | 31 1988年深圳特区的政改方案 | 徐建 |
| | 33 我参与水稻亩产30万斤“实践” | 龚锦文 |
| | 35 城市土地国有规定的由来 | 程雪阳 |
| | 42 从法治到党治：孙中山的思想转变 | 李贵连 |
| | 49 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 李慎之 |
| | 55 转型成功依赖公民社会成长 | 贾西津 |
| | 60 1946年《共同纲领》的命运 | 荣剑 |
| | 67 七千人大会与民主集中制 | 罗平汉 |
| | 73 中宣部反右倾中的“九条大鲨鱼” | 马懋如 |
| | 77 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 章诒和 |
| | 79 黎澍看戚本禹 | 朱瑞熙 |
| | 82 孟氧：狱中完成百万字书稿 | 李正中 |
| | 84 对顾准著作出版的补充 | 贺越明 |
| | 86 契卡与“红色恐怖”法令 | 闻一 |

93	读者来信摘登	王杰等
2013-7	1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李定中
	5 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	尹曙生
	10 柏各庄农场的劳教岁月	季音
	51 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	杜婉华
	20 为“人性论”平反	张显扬
	26 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黄钟
	35 德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郭建
	40 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	穆广仁
	43 安康文革第一劫	曾志信 何吉祥 邹服生 姚维荣
	46 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鄢增华
	50 我的“罪行”	王蔼民
	51 “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石名岗
	55 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高层争论	陈祖甲
	58 也谈北上与西进	冯亚光
	63 “离经不叛道”的经济学家何伟	张素芳
	68 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	王菁珩
	73 诸暨：两起无中生有的大案	何心乐
	77 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	陈启民
	83 读者来信摘登	吴式超
	84 读《千古兴亡》	杨美艳
	86 震撼世界的“布拉格之春”	刘天白

2013-8 1 改革的行进逻辑与历史脉络——

- | | |
|--|--------------|
| 读吴伟《中国 80 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 | 董郁玉 |
| 7 宪政之我见 | 王建勋 |
| 9 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 | 施义之口述 陈枫整理 |
| 17 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 鲁琪回忆 鲁晓纾整理 |
| 22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 王冠群 |
| 24 1933 年四川兵灾 | 赵晓铃 |
| 31 饶漱石政治秘书谈饶漱石 | 陈邦本 |
| 35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 | 王保春 王文耀 |
| 44 读者来信摘登 | 高放 |
| 45 关于毛泽东遗体保存的回忆 | 于书吉口述 程宏采访整理 |
| 49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 洪振快 |
| 59 读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 应克复 |
| 60 有关高岗“轮流”说的考证 | 林蕴晖 |
| 63 从一家民间智库说开去 | 李锐 |
| 67 “正能量”的正解与邪说 | 崔敏 |
| 70 关于对鲁迅的阅读与研究的一点建议 | 曾彦修 |
| 72 我上门批判孙大雨 | 武振平 |
| 74 1949 年后胡适形象演变 | 董立功 |
| 79 胡绩伟周年祭 | 袁鹰 |
| 82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 阎长贵 |
| 87 新闻审查浪潮中沉浮的红色诗人 | 李玉贞 |
| 84 不因人废言，更不可因言废人——《人权与宪政：罗隆基读本》序 | 郭道晖 |

- 93 读者来信摘登 田大畏 等
- 2013-9 1 落实宪法贵在一个“诚”字 杜导正
- 2 宪法的形成和落实有阶段性 吴思
- 3 法治要有几个大的突破 李步云
- 4 树立宪法权威必须追究违宪行为 郭道晖
- 6 推进民主重在完善人大制度 蒋劲松
- 8 人大代表制度要改进 蔡霞
- 10 市场经济需要宪政 张维迎
- 12 财税改革须保障纳税人权利 李炜光
- 14 保障言论自由先落实消极自由 展江
- 15 保障人权既是观点问题又是实践问题 丁锡奎
- 16 实施宪法意味着什么 张千帆
- 17 从历史视角看落实八二宪法 秋风
- 19 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 何方
- 27 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杨天石
- 36 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 黄春光口述 米鹤都整理
- 45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张有京
- 49 徐铸成当卧底 贺越明
- 52 音乐家劫夫的结局 杨东阁
- 55 卢作孚的事业 严家炎 卢晓蓉
- 59 1947年内人党重建风波 李国芳
- 63 《顾准文集》的出版：不能说的也该说了 杨建国
- 67 胡耀邦平息“突破”事件 王正 口述 陈辽 记录

- | | | |
|---------|-------------------------|-----------------------------|
| 70 |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 张一虹 |
| 72 |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 吴兴唐 |
| 79 | 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刘仁文 | 刘泽鑫 |
| 87 | 苏维埃政权早期的腐败及其成因 | 杜永明 |
| | | |
| 2013-10 | 1 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 尹曙生 |
| | 7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萧冬连 |
| 13 | 我在北大当校长 | 丁石孙 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 整理 |
| 21 | “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 | 唐荣 智子 口述 金大陆 采访
孙路遥 王芳整理 |
| 25 | 我参与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 郝怀明 |
| 33 | 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 | 顾骧 |
| 38 |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 胡邦定 |
| 41 | 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 | 张刃 |
| 46 | 蒋介石反贪枪毙孔祥熙亲信 | 杨天石 |
| 50 | 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 孙郁 |
| 54 | 劳教难友巫宁坤 | 杜高 |
| 57 |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 | 黄大地 张春丽 |
| 62 |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 王海光 |
| 67 | 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古拉格：一部历史》有感 | 唐少杰 |
| 72 | 小议“一句话”等六则 | 邵燕祥 |
| 77 | 平凡的刽子手 | 寿石 |
| 80 | 父亲陈企霞百年祭 | 陈恭怀 |
| 82 | 我和林希翎的交往 | 卢弘 |

- 85 古装传统戏：《讲话》前后的延安主流艺术 王克明
- 90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朱正
- 2013-11 1 高锴：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 邢小群 丁东 采访
- 10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施义之 口述 陈枫 整理
- 19 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韩爱晶
- 36 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吴之理
- 40 川北的红军“冤烈” 孙丹年
- 46 “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 洪振快
- 53 悼于光远老 吴象口述 吴阿丽整理
- 58 吴江的“意外遭遇” 徐庆全
- 64 女儿心目中的饶漱石 陆兰沁
- 68 安志文谈高岗 杨继绳
- 71 我的信仰历程 张泽石
- 77 汪东兴：毛泽东不同意江青进常委 杨银禄
- 78 改革要有时间表 宫希魁
- 80 宋平在甘肃的两件往事 邹雅林
- 84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一读《红尘冷眼》 董国和
- 86 俄罗斯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说 马龙闪
- 93 读者来信摘登 白拉都格其 等
- 2013-12 1 八二宪法与宪政 童之伟
- 11 抗美援朝的得与 失何方
- 18 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高锴

22	大是大非不含糊的省委书记——杜导正忆老友林若	杜明明
26	中顾委开于光远的生活会	王晓中
34	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何季民
41	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陈徒手
47	什么是法治	魏耀荣
50	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	陈永迪
57	参加中央工作组追查“梁效”文章	战毅军
60	《三上桃峰》五易其稿	杨孟衡
63	浙江诸暨文革中的私刑	何心乐
66	钱基博是否被打成右派的争议	钱之俊
69	国民党败局与蒋经国“打虎”失败无关	武之璋
75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杨继绳
82	瑞典违宪审查实践及启示	高峰
88	读者来信摘登	钱占元 等
90	2013年目录	赵凡响 整理
2014-1	1 解放思想再出发	本刊编辑部
	2 公民做什么：读三中全会《决定》	吴思
	7 安徽“严打”的回顾与思考	尹曙生
	13 “四个伟大”的由来	胡鹏池
	18 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	王辉
	24 郑思群之死和重庆八一五运动	周孜仁
	30 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屈锡信
	36 李震自杀前后	晏乐斌

-
- | | | |
|--------|---------------------|-----------------------|
| 40 |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出击战斗 | 王人 |
| 47 |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 谭合成 |
| 52 | 康生相信特异功能 | 陈楚三 |
| 53 | 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 | 张显扬 |
| 61 | “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 黄卧云 |
| 64 | 习仲勋长葛调研 | 张继增 等 口述 王国钧 等 整理 |
| 67 | 由“何朗明案件”引发的大冤案 | 贾志珍 |
| 72 |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读后 | 萧扬 |
| 76 | 民国思潮：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高峰 | 窦海军 |
| 78 | 从“三分疲楚”到朱毛“十六字诀” | 沈建洪 |
| 81 | 目击“天鹅绒革命” | 刘天白 |
| 89 | 苏德同盟时期苏联的一些事 | 龙飞 |
| 93 | 来信摘登 | 中国法学会 等 |
|
 | | |
| 2014-2 | 1 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建国蓝图 | 李玉贞 |
| | 10 渣滓洞刑讯室考 | 孙丹年 |
| | 16 戴着镣铐写日记 | 马龙闪 |
| | 20 延安文艺社团的兴衰 | 王克明 |
| | 24 三中全会司法改革目标解读 | 杨支柱 |
| | 28 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 李光远 |
| | 32 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 | 盛禹九 |
| | 39 保健护士谈江青的饮食起居 | 周淑英 赵柳恩 口述 阎长贵 李宇锋 整理 |
| | 47 王征明谈饶漱石与扬帆 | 景玉川 |
| | 52 杨效椿：从大右派到省革委会副主任 | 董忠义 |

58	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	李根清
63	从毛泽东劝张春桥当副手谈起	阎长贵
66	文革中清华是“民主政治的试验场”吗	周邦园
67	给沈钧儒当秘书	王健
71	政治磨盘下的数学研究	蔡海涛
74	李一氓的政治人生——《李一氓书法选》序	何方
78	宋云彬日记反映的政治运动	朱子南
81	《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	彭知辉
83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	章立凡
85	契卡的“十字军讨伐”	闻一
93	读者来信摘登	陈鸣悦
2014-3	1 建设自由社会的法治国	郭道晖
	7 1946年的宪政方案	刘山鹰
	16 “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	范达人
	25 中南海警卫工作见闻	华方治
	29 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张红兵
	37 “温情”温济泽	徐庆全
	43 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	王晓中
	52 “包产到户”北京推行遇阻	李守仲
	57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大镇压的报告	赵宏 翻译 叶书宗 校注
	63 孙大雨右派问题改正的波折	贺越明
	69 “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韦定广
	72 蒋经国身后宋美龄是否准备夺权	武之璋

77	“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李伟 王毅
81	中共指导思想及其提法的演变	高放
83	读者来信摘登	房寿山 等
84	东莞 1960 年也曾饿死人	卢荻
87	“落后就要挨打”论已过时	王也扬
89	旅苏华人遭受政治迫害史实	陈启民
2014-4	1 冲破阻力，做全面改革的促进派——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	本刊编辑部
11	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	邵燕祥
18	南开大学文革往事	魏宏运
26	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	丁龙嘉
32	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	张鸣
38	卢作孚为什么会自杀	钱理群
44	范长江脱离大公报前后	张刃
47	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过程述实	吴伟
57	江一真在河北平反冤假错案	钟兆云
62	香港《热风》事件始末	张侃侃
66	《理论动态》两篇文章的风波	沈宝祥
71	胡绳晚年关注的问题	魏久明
72	我和于光远的交往	郭罗基
74	以宽容消解文革恩仇——罗征启访谈录	杨继绳
79	盟主鲁迅也是左的	毕克官（遗稿）
82	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汪有芬
86	“党政分开”是死结	周拓

-
- | | | |
|--------|--------------------|-----------------------|
| 87 | 读萧军《延安日记》 | 毕苑 |
| | | |
| 2014-5 | 1 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 尹曙生 |
| | 6 我国法治之路的政党维度 | 严存生 |
| | 12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 洪振快 |
| | 23 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 | 马龙闪 |
| | 29 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 | 尹保云 |
| | 35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 | 郭世佑 |
| | 41 保健护士谈江青（续） | 周淑英 赵柳恩 口述 阎长贵 李宇锋 整理 |
| | 47 “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 董忠义 |
| | 54 顾准《商城日记》的背后 | 李素立 王晓林 |
| | 59 毛家湾林彪琐事 | 李根清 |
| | 65 随卫中央领导人的经历 | 华方治 |
| | 70 我知道的三反与肃反 | 晏乐斌 |
| | 73 父亲汤用彤的矛盾心态 | 汤一介 |
| | 76 “红色福尔摩斯”布鲁的遭遇 | 吕璜 |
| | 81 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困境与成败周期 | 章立凡 |
| | 84 俄国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 吴思 |
| | | |
| 2014-6 | 1 我知道的名流佚事 | 高锴 |
| | 11 我在光大集团遇到的大事 | 孔丹 口述 米鹤都 整理 |
| | 17 “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 范达人 |
| | 26 法治的关键是政体 | 艾永明 |
| | 28 政党执政模式决定党政关系 | 应克复 |

31	政改要有开放的政治文化心态	韩云川
36	欧美征税权演变与政治文明	王建勋
45	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过程	傅国涌
51	1947年同川土改反思	吴斌
56	地方志中的五十年代广西饿死人事件	卢尚文
60	珍宝岛事件与中共九大	雷颐
64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张鹏程
66	“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内情	贺越明
72	鲁迅是左倾而不是极左	潘正伯
74	“落后就要挨打”并未过时	曾彦修
75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阎长贵
79	从《美国手册》看中共对美态度变化	李珍军
85	苏联的大清洗：关键在哪里？	左凤荣
93	读者来信摘登	孙小平 等
2014-7	1 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曹正汉
	5 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资中筠
	10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黄卧云
	16 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陈健
	24 真人马沛文	郑本法
	29 1960年的强拆	徐荫秀 口述 高树林 李力跃 记录整理
	33 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	晏乐斌
	36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陈楚三
	39 亳县“特殊案件”的记述	梁志远

44	红卫兵两次冲击人民日报	陈祖甲
46	谢富治与“枫桥经验”	尹曙生
50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	陈大斌
56	也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冯亚光
61	泰山肃托案	赵学法
67	新疆霍城“11.27”事件	高栋
70	王纘绪创办巴蜀学校	王复加
73	一个时代的扫描与国民性实录	郭道晖
76	孙大光处理中国油气发现史纷争	奚青
83	文化台湾拾零	熊景明
87	从普京怒斥“布尔什维克卖国”说起	李凌
92	读者来信摘登	曾彦修 等
2014-8	1 顾准对“大民主”的反思	蒋贤斌
	7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郝怀明
	13 民生公司被公私合营的过程	赵晓铃
	19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洪振快
	27 毛泽东与竺可桢谈农业“十字宪法”	樊洪业
	31 华国锋最先为包产到户开口子	吴镕
	32 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	李根清
	37 我的武斗经历	丁学良
	42 中南海舞会见闻	崔维聪
	44 对“农民起义”认识的多重误会	叶林生
	50 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	姚轩鸽

-
- | | | |
|--------|--------------------|-----------------|
| 54 | 1949年后辞书中陈独秀的形象变化 | 董立功 |
| 58 | 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 | 吕成冬 |
| 63 | 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 陈徒手 |
| 68 | 风风雨雨千家驹 | 王健 |
| 74 | 读《历史的误读》 | 邓文初 |
| 78 | 一位旧政人员的自传 | 孙握之 |
| 85 | 知识分子头上的契卡幽灵 | 闻一 |
| 93 | 也谈红军长征的原因 | 景玉川 |
|
 | | |
| 2014-9 | 1 司法中立：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 | 童之伟 |
| | 9 也议周永康案的根本启示 | 杜导正 |
| | 13 荣高棠和薄一波在中顾委机关 | 王晓中 |
| | 22 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 | 李锐 口述 丁东 李南央 整理 |
| | 28 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 | 胡治安 |
| | 30 彭水县大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报告 | 淳世华 |
| | 38 蒋介石与钓鱼岛主权争议 | 杨天石 |
| | 46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 | 刘山鹰 |
| | 54 马克思捍卫新闻出版自由 | 安立志 |
| | 58 柴山保往事 | 王建华 口述 王智仁 整理 |
| | 62 老舍先生：从实心爱党到以死抗争 | 高锴 |
| | 66 卢作孚之死调查经过 | 满濂 |
| | 69 中国医疗组救治霍查父子 | 范承祚 |
| | 72 1979年我在“六号”办公室 | 杨则尧 |
| | 74 读左方《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 朱学勤 |

77	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	杨继绳
84	政治局常委名单之谜——毛远新的话难作定论	李维民
86	美国大选是金钱政治吗？	张海平
93	读者来信摘登	王亚 等
2014-10	1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高尚全
12	依宪治国是执政的基本守则	郭道晖
18	邓小平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吴伟
23	胡乔木与1980年政治制度改革	张成洁
28	1954年宪法是怎么来的	张鸣
34	成为历史的“新记”《大公报》	张刃
40	“四种人”与“出版湘军”的兴衰	雷颐
44	《南方周末》停刊风波	左方
50	威海“土改复查运动”的记忆	毕克官
53	我所认识的廖沫沙	邓可因
56	我是“罗思鼎”的一员	知常 口述 金光耀 金大陆 李逊 采访
63	白瑞生与“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	白磊
66	当代史语境中的“出身”话题	邵燕祥
71	传统思维中的狗意识	张绪山
75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郝怀明
79	“马铁丁”与陈笑雨	季音
82	《毛的真实故事》读后	汪有芬
84	史料译文里的人名误译	朱正
87	古代反贪设计的实际效果	洪振快

- 2014-11 1 社会转型与反腐对策笔谈转型国家反腐任重道远 尹保云
- 3 各级人大要让贪官闻之丧胆 蒋劲松
- 15 韩国的腐败与法治 詹小洪
- 18 周永康案的反思与建言 崔敏
- 21 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何方
- 29 “休闲江青”与“毒药事件” 周淑英 赵柳恩 口述 阎长贵 李宇锋 整理
- 38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丁学良
- 45 随卫毛主席江青 华方治
- 47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李根清
- 54 计划经济时代的“黑孩”问题 杨支柱
- 56 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 陈宝德 李学超
- 58 熊大缜冤案平反经过 王端阳
- 60 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 董忠义
- 64 地下党“不能承认党员身份”的纪律 孙丹年
- 68 红军指导员李传书之死 胡发云
- 72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 李玉贞
- 79 普京时代对斯大林的评价 马龙闪
- 84 富田事变时刘敌给中央的信 景玉川
- 89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陆南泉
- 2014-12 1 著名学者座谈四中全会《决定》“权力入笼”，必先“权利出笼” 郭道晖
- 4 法治国家的标准与建设思路 李步云
- 6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与新问题 江平

8	领导干部干预案件的问题如何解决	刘仁文
10	改革要从司法突破	何兵
11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转轨的需要	任剑涛
15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王文耀 王保春
24	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	资中筠
34	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	黄钟
43	台湾《自由中国》的创办和停刊	武之璋
47	政治改革与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郭世佑
54	大饥荒中宣城县非正常死亡数字惊人	熊尚廉
58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与美国意图	于英红
65	一封书信中的三位右派	王同策
69	张竹与鲁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遭遇	李兆忠
75	民主是绕不过的坎——评《中国震撼》	张千帆
79	西班牙民主转型之路	魏兴荣
85	帕斯捷尔纳克为何拒领诺贝尔奖	徐元宫
90	《南方周末》是谁创办的？	赖海晏 等
91	《炎黄春秋》2014 年总目录	赵凡响 整理
2015-1	1 向法治中国迈进	本刊编辑部
	2 对于几个经济问题的思考	吴若增
	6 谭其骧的儒学观	向继东
	9 拆掉“柏林墙”从小处做起	马晓星
	11 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	张金昌
	8 三峡工程与《科技导报》	蔡德诚

-
- | | | |
|--------|--------------------------|---------|
| 22 | 必得澄清的一桩重大史实 | 马沛文（遗稿） |
| 23 | 我亲自处理的五个“盲流”的案件 | 陈重伟 |
| 26 | 江青对公安机关怨恨的由来 | 尹曙生 |
| 32 | 说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 杨心恒 |
| 38 | 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类矛盾——谈谈对当前反腐败的认识 | 胡德平 |
| 41 | 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 | 谭加洛 |
| 47 | 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 李素立 |
| 53 | 长沙知青大逃亡 | 陈秉安 |
| 59 | 再说吴江“意外遭遇” | 陈文斌 |
| 61 | 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 | 徐德瑞 |
| 65 | 也谈卞仲耘之死 | 叶志江 |
| 67 | 《柴山保往事》之谬 | 夏宇立 |
| 70 | 杨兆龙的功与“罪” | 穆广仁 |
| 75 | 忆胡绳 | 杨天石 |
| 80 | 萧军在延安 | 何方 |
| 87 | 郭沫若的悲剧 | 张光渝 |
| 91 | 读侯凤菁的《燃烧的多瑙河》 | 林蕴晖 |
| | | |
| 2015-2 | 1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 | 应克复 |
| | 4 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 | 胡德平 |
| | 9 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 | 陶斯亮 |
| | 15 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 | 任小彬 |
| | 21 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 | 张顺清 |
| | 25 对法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件事 | 崔敏 |

29	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	唐少杰
36	自封的“半个红学家”江青	苗怀明
42	杨培新与反通货膨胀邓加荣	王红月
47	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	钱理群
54	记好医生高耀洁	朱学勤
58	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	沈志华
67	探“高饶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	徐庆全
72	《大公报》的一项人事制度	胡邦定
74	忆老友鲁兮	吴象
77	怀念曹思源	李正伦
81	读曾彦修《平生六记》	杜高
86	“九一三”林彪要飞往哪里？	张光渝
90	古巴宗教政策的变迁	刘澎
94	读者来信摘登	王宗祥等
2015-3	1 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田纪云
	4 邓小平与“5.13讲话”	吴伟
	9 批判“资反路线”和陶铸的倒台	郝怀明
	16 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	李平
	23 忆“反右”时的公审大会	张惠卿
	26 我与《学习与批判》等刊物	王知常 口述 金光耀 金大陆 李逊 采访 诸颖政 李信之整理
	31 “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频率	钱钢

35	目的与手段：文革思维今与昔	启之
38	张闻天在经济所	张曙光
44	胡乔木在文革末期	张成洁
49	1950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政治背景	梅剑华
51	抗战胜利后的苏、蒙、日问题	张刃
56	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	吴江（遗稿）
58	从古希腊的专政与民主谈起	李延明
60	从“首都兵团”到中学“红代会”	刘龙江 口述 米鹤都 整理
65	顾骧谈思想解放运动	石厉
70	从齐奥塞斯库的终结说开去	王开岭
75	“神圣君权”与帝王神迹	张绪山
79	1984年胡耀邦对文艺工作的指示	记录者 于浩成 提供者 史义军
81	苏联末日实录	汪有芬
86	“林立果现象”的历史追问	杨钢
90	中国古代的禁言与抗争	吴飞
94	引洮工程从无“几万人活活饿死”	彭兴
2015-4	6 《准则》：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器	蔡霞
12	华国锋谈史传写作	李海文
17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王彬彬
19	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	袁凌
21	深切怀念本刊顾问曾彦修先生——他是讲究做人的	李锐
22	高尚高贵写春秋	杜导正
24	沉痛悼念曾彦修同志	何方

-
- | | | |
|--------|-------------------------|-------------|
| 24 | 永远的曾彦修 | 张惠卿 |
| 25 | 他的名字将成为一种象征 | 杜高 |
| 26 | 有关鲁迅争论我见 | 曾彦修 |
| 33 | 冤案是怎样酿成的 | 尹曙生 |
| 39 | 关于巴金《没有神》的一点考释 | 陈丹晨 |
| 42 | 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 | 张思之口述 孙国栋整理 |
| 48 | “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 | 周克口述 顾训中整理 |
| 52 | 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 王蒙 |
| 59 | 六十五年前一次盛会 | 袁鹰 |
| 61 | 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 | 华方治 |
| 64 | 我所接触的江青 | 张国男 |
| 69 | 从《邓小平论文艺》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 | 阎纲 |
| 72 | 陈修良访苏记 | 冯翔 |
| 75 | 昔日清华不唯权 | 金富军 |
| 77 | 宪法学者张君勱 | 智效民 |
| 81 |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求解 | 秦晓 |
| 82 | 评《王力反思录》 | 阎长贵 王广宇 |
| 88 | 郭小川致吴庆彤信 | 郭小川 |
| 89 | 德意志大学的兴衰 | 丁东 |
| 93 | 读者来信摘登 | 王智仁等 |
| | | |
| 2015-5 | 1 新春联谊会发言稿摘登——再接再厉，勇往直前 | 周有光 |
| | 1 三点意见 | 何方 |
| | 2 和平发展，一球家园 | 高放 |

- | | | |
|----|---------------------|------------------|
| 3 | 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者 | 杜光 |
| 3 | 坚持办刊方针，发扬传统风格 | 郭道晖 |
| 4 | 开启民智才是当务之急 | 资中筠 |
| 5 | 《炎黄春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张北英 |
| 6 | 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 | 吴南生口述 萧冬连 杨继绳 整理 |
| 12 | 我的大哥饶漱石 | 饶玉莲 口述 景玉川 整理 |
| 15 | 幸存者自述 | 周群口述 陈秉安 整理 |
| 20 | 九九感怀 | 李锐 |
| 25 | 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 汪钦 |
| 29 | “雄师案”和我的命运 | 周平 |
| 36 | 张孝骞“批邓”真相 | 马懋如 |
| 37 | 两张大字报和四份判决书 | 陈焯 |
| 40 | 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 | 吴若增 |
| 44 | 1962年对大跃进的反思为什么不能彻底 | 陶东风 |
| 46 | 八届十一中全会日记 | 解学恭 |
| 54 | 平反《三上桃峰》的一波三折 | 毕星星 |
| 58 | 临汝闹社风波的前因后果 | 李素立 |
| 63 | 复生不易 | 张光渝 |
| 66 | 也说邓力群 | 盛禹九 |
| 69 | 寻访陆孝颐 | 程宏 王德禄 |
| 72 | 丁弘：银发尖兵中的一员 | 杨教 |
| 77 | 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 | 朱可常 |
| 80 | 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 唐少杰 |
| 83 | 《时过境未迁》序 | 韩钢 |

87	奥斯曼帝国：立宪后的专制	王三义
91	韩国人口政策的两次转变	詹小洪
2015-6	1 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	袁伟时
	4 “四个决不”的提法不妥	于一夫
	6 巨贪产生的制度反思	汪玉凯
	9 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陶斯亮
	16 反右前后的北京政法学院	王卫民
	19 亲历各党各派争取宪政的斗争	王健
	23 目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	李根清
	25 不能忘却的“精神堡垒”	庞国义
	29 新闻立法之路	孙旭培
	32 一桩刑事案件的背后	陈宗立
	39 彭德怀与国防科技建设	滕叙尧
	44 《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中	余焕椿
	49 《创业》风波	华克
	55 陈昌浩最后的日子	冯亚光
	59 张仲翰与新疆开发	纪新
	63 九届二中全会日记	解学恭
	71 我和邓力群的交往	于浩成口述 史义军 整理
	76 发生在南阳的“电报事件”	赵宗礼
	80 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及其结局	吕克军
	85 我读过曾彦修的“三万言书”	邓伟志
	86 芬兰政府这样管理高等教育	阎忻民

-
- | | | |
|--------|------------------------|-------------|
| 90 | 一场改变美国历史的游行 | 李南央 |
| 93 | 谁是《毛泽东论鲁迅》的记录、整理者？ | 汪大波 |
| 94 | 工宣队在清华还干了什么？ | 朱祖成 |
| | | |
| 2015-7 | 1 邓小平推动多党合作方案 | 吴伟 |
| | 8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过程施滨海 | 史义军 |
| | 15 八十年代调整生育政策的来龙去脉 | 陈剑 |
| | 19 对“消灭私有制”理论的反思 | 匡萃坚 |
| | 24 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 | 王海光 |
| | 29 “经胡耀邦审定”说法的由来 | 沈宝祥 |
| | 33 1962年的大事与小事 | 张惠卿 |
| | 35 孔林变农场的悲剧 | 张顺清 |
| | 40 顾准的探索和贡献 | 张曙光 |
| | 48 忆华岗校长 | 徐瑜 |
| | 52 批林整风汇报会日记 | 解学恭 |
| | 60 豪沃什同陈慕华的谈话摘要 | 衣君 提供 |
| | 62 《这是为什么？》是谁写的？ | 朱正 |
| | 64 台湾当年是怎样查禁文学书刊的 | 古远清 |
| | 69 西安“七十三号”纪事 | 白磊 |
| | 74 《联合画报》反映的政治生态 | 刘建国 王兴文 张振楠 |
| | 78 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 | 金大陆 |
| | 84 怀念张培森——《张培森文集》代 | 序何方 |
| | 87 我看大午“私企立宪” | 保育钧 |
| | 89 狗与人类政治 | 张绪山 |

- 92 崇尚玄学，还是坚持科学 沈敏特
- 2015-8 1 依宪执政五人谈——依法治国与保护不同意见 江平
- 2 法治中国 and 思想中国 郭道晖
- 4 良法 良治 良序 张千帆
- 6 胳膊与脑袋 任剑涛
- 7 依宪治国离不开律师 孙国栋
- 8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 17 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讲话” 李锐
- 19 大刀阔斧推进法治——田纪云忆乔石 杜明明
- 24 周扬纪事 刘再复
- 30 本色韦君宜 李昕
- 35 十三大报告酝酿中的二三事 郝怀明
- 39 胡耀邦就职中宣部的三次讲话 李平
- 44 设在中国的马共电台 陈益南
- 47 周有光的文化观 董健
- 49 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 叶廷芳
- 52 新乡“反右倾”旧事 千正旺
- 58 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 蔡家麒
- 62 曲阜1958年“大搬家”始末 张树亭 张玉昆
- 64 我亲历的苏州武斗 解顺庆
- 69 殊途同归的共享社会——里夫金与马克思 陈启懋
- 73 我读《阎明复回忆录》 胡德平
- 76 中苏关系史的权威之作 李静杰

-
- | | | |
|--------|----------------------|---------------|
| 78 | 宋庆龄与新闻界 | 汪大波 |
| 81 |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 张郎郎 |
| 86 | 百岁老兵忆抗战 | 马士弘 口述 万本根 采写 |
| 90 | 布罗茨基的坎坷人生 | 龙飞 |
| 94 | 读者来信摘登 | 薛小和等 |
|
 | | |
| 2015-9 | 1 大悲无泪祭耀邦 | 张宏遵 |
| 10 | 中共八大为什么没有彭真发言 | 林蕴晖 |
| 16 | 阶级斗争：历史、理论和实践 | 杜光 |
| 18 | 读者来信摘登 | 蒋庆坤 冯亚光 |
| 19 | 什么是“永不变质”的“质” | 沈敏特 |
| 22 | 陆定一和尤金谈肃反运动 | 朱正 |
| 27 | 被两任公安部部长下令逮捕的人 | 尹曙生 |
| 31 | 《大公报》缘何“哭四平” | 张刃 |
| 25 | 镜泊湖抗日之战 | 李丹钢 李刚 |
| 39 | 写历史要经得起事实检验 | 陈丹晨 |
| 41 | 十年论战的空话色彩 | 王彬彬 |
| 43 | 阎明复反思中苏关系——读《阎明复回忆录》 | 丁东 |
| 49 | 阎仲川与“一号令” | 张颂甲 |
| 52 | 我从4岁开始受批判 | 李治国 |
| 55 | 西南联大是怎样办大学的 | 胡邦定 |
| 60 | 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风运动 | 李洪林口述 邵思思 整理 |
| 62 | 谢觉哉和他的两个家庭——读《谢觉哉家书》 | 王彦君 |
| 66 | 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 | 金大陆 金光耀 |

71	万里的政治担当	徐庆全 杜明明
76	老舍是这样当会长的	舒乙
81	忆龚澎	宋以敏
87	“指斥乘舆”罪的演变	王曾瑜
91	致友人书	邵燕祥
92	美国先民为什么放弃公有制	赵诚
94	我的遭遇	陈焯
2015-10	1 耀邦百年纪念——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邵燕祥
	5 人心为上	陈丹晨
	7 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杜高
	9 政治文明的新起点	王学泰
	12 青山有幸埋忠骨	袁鹰
	16 曾彦修来信类抄	何方 整理
	23 “八老”与1980年代政治格局	徐庆全
	29 “红色词语”的勃兴和流变	钱钢
	36 邓小平“8.18”讲话的现实意义	陈剑
	40 超越“五阶段论”	杨善准
	42 反腐败治本一策	吴敏
	45 王猛与奥运会俞虎	苏南
	50 王洪文的升沉	李逊
	59 《雪白血红》蒙难记	刘家驹
	63 山西补选四届人大代表风波	石名岗 李辅
	65 民国时代的律师伦理	张思之

67	中国律师的本土传统	傅国涌
71	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	陈虹
76	亲历延安抢救运动	杜惠
81	随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二三事	华方治
82	一次难忘的外调	于峰华
84	盲从与利益考量——读《我们忏悔》	陶东风
86	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	李建军
93	对《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的质疑和辩疑	待考
2015-11	1 巍巍万里	胡启立 口述 张宏遵 执笔
8	胡耀邦与党的现代化	郝怀明
10	改革开放者胡耀邦	单少杰
31	胡耀邦重视我对修改党章的建议	高放
15	如何研究胡耀邦	王海光
18	吴江“三谏”胡耀邦	陈侃章
20	杜润生的“三多三少”	徐庆全
28	民粹主义思想与文化大革命运动	刘建国
32	八一九前夕访苏见闻	冯玉忠
36	两段截然不同的记者经历	季音
40	我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曲折	蔡安安
44	林彪“紧急指示”前后	李根清
49	报案人成了作案人	古远清
53	舆论与民心	沈敏特
55	读者来信摘登	秦颖儒 陈高华

56	报纸应该是社会公器	孙旭培 卢家银
60	1988年廉政制度建设的提出	李树桥
63	“举国体制”下的体育透视	卢元镇
67	1949年后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	商昌宝
72	哈尔滨保卫战	李洋
76	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	马雅
79	今日难寻沈善洪	郭世佑
83	《语象诡譎》序	陈婉莹
84	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与终结	雷颐
91	为何纪念《大宪章》	魏兴荣
2015-12	1 怀念杜润生——中国农民代言人	吴象
	3 困难局面下顶着逆风照样前进	吴明瑜
	6 他是很少的那种不被权力侵蚀的人	周其仁
	8 “我不过是这个团队的符号”——90寿辰座谈会答谢词	杜润生
	10 1988年“物价闯关”高层决策	吴伟
	18 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高尚全
	21 政权的合法性系于民心向背	皇甫欣平
	25 培育社会资本与执政党的政治空间	蔡霞
	29 中国式贪腐与封建主义	王彦君
	33 专政的两个传统	王志强
	38 我看日本和中日关系	何方
	42 曾希圣是如何掩盖严重灾荒的	尹曙生
	47 延安话语系统是怎样形成的	张成洁

53	张春桥为什么摧折周信芳	金大陆
57	李琪参与京剧改革的遭遇	李莉
63	陈彤椿上书获刑	郭美春
67	我经历的整风整社与四清运动	晏乐斌
71	为老八路父亲冤案平反	丁立镇
74	回忆李一氓同志	钱李仁
78	说“外汇崇拜”	王学泰
84	太平天国与文革——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札记	李乔
88	日本的新闻管控与侵略战争	张千帆
90	2015年目录汇总	赵凡响 整理
2016-1	1 耀邦百年祭	胡启立 口述 张宏遵 执笔
	5 刘英谈红军时代	何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14 束星北的性格与追求	束美新 口述 许水涛 采访
	20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经过	于浩成 口述 邢小群 采访
	24 王申酉命运的思考	钱理群
	30 谁举荐的朱厚泽	郑仲兵
	35 1965年胡耀邦《电话通讯》产生前后	白磊
	40 从47份救济申请表看1962年逃港风潮	笑蜀
	44 宪法应该为人民所掌握	郭道晖
	46 盲目铲除私有制的教训	王宪斌
	48 国耻背后	张绪山
	51 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	李锐
	54 动乱年代的采访	邓伟志

58	朱启平先生二三事	张刃
63	我的父亲马建民	老鬼
69	一个农民与人民公社的较量	陈大斌
72	张春桥其人	李海文
78	为民请命的李景福	余习广
83	波兰转型面面观	秦晖 金雁
90	共同富裕是怎么为法西斯所利用的	蒋德海
2016-2	1 “两个凡是”的一段公案	韩钢
	10 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大跃进”	朱正
	14 信阳事件与中南局第一次会议	千正旺
	18 回忆一位站在改革前沿的长者	李湘鲁
	25 怀念马洪	王笃
	30 重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李锐
	31 道歉：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徐贲
	36 政治生态与告密	谈士杞
	40 大院的精神文化	米鹤都
	47 潘汉年案献疑	陈奇佳
	51 从朱光潜的一个发问说起	马龙闪
	56 南阳县“交心”活动纪事	赵宗礼
	61 创刊时的《人民日报》怎样开展党报批评	钱江 秦红星
	65 胡适三劝蒋介石	雷颐
	73 林彪对江青的一次发火	李根清
	76 763 的记忆	王林光

79	反思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高伟梧
82	《阎明复回忆录》披露的一条史料	李乔
87	茅盾鲜为人知的几件事	阎愈新
89	为什么发达国家 NGO 也发达	贾西津
2016-3	1 反思文革责无旁贷	王蒙
	6 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	王海光
	12 “一国两制”的宪法解析	张千帆
	20 马文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王彦君
	27 “胡风分子”张中晓	刁含勇
	32 从十二大到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历史进步	徐庆全
	42 “异化”问题讨论和周扬的遭遇	郝怀明
	50 文艺界拨乱反正纪事	阎纲
	57 周恩来接见群众几件事	华方治
	60 我亲历的西沙海战	李兆新
	64 一封告密信 高墙二十年	曹智澄
	69 继续“五四”伦理革新方向	李良玉
	73 “领导”与“执政”释义	张明军
	78 网络主权的根基	沈敏特
	81 《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序	邵燕祥
	86 《马恩列斯论文艺》札记	陈丹晨
	90 为《从秋瑾到林昭》致白桦	屠岸
	91 美国的贫富分化与公共政策	笑蜀

2016-4	1	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王蒙	远方
	4	要百家争鸣，不要两家争鸣	朱正
	7	质疑、争论是鉴别真伪的利器	蔡德诚
	9	宪法与双百方针	丁东
	11	一个老共产党人在文革中的思考	钱理群
	15	刘英忆延安岁月	何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24	两案辩护的回忆与反思	张思之 口述 孙国栋 采访
	32	李德生的一段往事	张光渝
	36	杨宪益的为难事	胡天培
	38	大伯父陈仁炳	茅青
	46	老战士戴煌	卢跃刚
	49	戴煌与曹海鑫案	萧雪慧
	52	我所了解的尹先炳	王端阳
	56	百年回首	李锐
	61	“批示”前后	阎长贵 王广宇
	64	和项南的一次交往	季音
	67	批林批孔在北京	陈徒手
	73	父亲笔记涉及的史实	黄志恭
	74	产粮大省为何饿死人	尹曙生
	79	读陈永发史著断想	杨继绳
84	《大写的人》自序	吴象	
90	委内瑞拉民粹主义模式的困境	张森根	
2016-5	1	意识形态工作也要改革创新	周瑞金

- | | | |
|----|-------------------|--------------|
| 5 | 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 | 金大陆 |
| 9 | 华国锋与对外开放 | 方茂 |
| 16 | 1965年的人民日报 | 余焕椿 |
| 22 | 中国政府人权话语态的变迁 | 刘志强 |
| 27 | 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 | 李新宇 |
| 31 | 随于光远访耀邦故居 | 李冰封 |
| 33 | 玉田县“右倾反党集团”的形成及后果 | 杨永贤 |
| 39 | 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 徐贲 |
| 46 | 向善而行为何如此艰难 | 张绪山 |
| 51 | 领导者要警惕信息结构不合理 | 孙旭培 |
| 55 | 国共两党为何都容不得陈独秀 | 王思洋 |
| 57 | 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极端做法 | 赵宗礼 |
| 62 | 大公报：从民办到“官媒”的转变 | 张刃 |
| 68 | 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 | 文炜 |
| 72 | 第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的“整军经武” | 李洋 |
| 76 | 新四军医疗事业的奠基人王聿先 | 王小敏 |
| 80 | 一幅油画的往事 | 尚扬 口述 郭宇宽 采访 |
| 83 | 《胡耀邦》叙史的学术意识 | 商昌宝 |
| 88 | 缅甸现代文明的推手昂山素季 | 魏兴荣 |
-
- | | | | |
|--------|----|----------------------------------|-------------------|
| 2016-6 | 1 |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 何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
| | 11 |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 郭道晖 口述 邢小群 鲁利玲 采访 |
| | 18 | 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 | 束美新 口述 许水涛 采访 |
| | 24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选摘 | |

28	“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	徐庆全
36	对错误进行反思是政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林蕴晖
40	1965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	白磊
46	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	陈铁健
50	“左”倾思潮与政治标签化	董宝训
54	张一弓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阎纲
56	永远的顾先生	贺捷生
59	傅璇琮给我的一封信	刘再复
61	李可染与《万山红遍》	李兆忠
64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	邢小利
67	秦城内外的陈伯达	袁凌
73	吴晗一家的命运	吴翠
77	我与许家屯二三事	董健
80	“书生作吏”：文坛“掌门人”的反思	刘伟
84	茨威格、罗曼·罗兰和纪德的莫斯科行	雷颐
91	扬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袁鹰
92	日本负罪感一议	张树亨
93	关于 AB 团的一点资料	杨甦
2016-7	1 《炎黄春秋》二十五周年感言	杜导正
	2 我们二十五岁了	本刊编辑部
	8 立法回忆	江平 口述 陈夏红 整理
	16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几次发言	张显扬 口述 丁东 整理
	20 研究国际问题的缘起和心得	何方

- | | | |
|----|----------------------|-----|
| 25 | 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日日夜夜 | 谢飘 |
| 31 | 知道的“公私合营”和“对不良分子的改造” | 晏乐斌 |
| 34 | 袁运生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前后 | 王端阳 |
| 37 | 1973年周恩来对北京工作的指示 | 陈徒手 |
| 43 | 八十年前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 | 智效民 |
| 49 | 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 | 张光渝 |
| 54 | 谭震林的一封信 | 李根清 |
| 57 |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早期推手张冲 | 马雨农 |
| 59 | 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 | 蔡霞 |
| 61 | 社会进步的成本思考 | 沈敏特 |
| 64 | 我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观 | 匡萃坚 |
| 68 | 胡开明土改反“左”记 | 老鬼 |
| 73 | “AB团”创办人段锡朋 | 陈益南 |
| 76 | 我的舅公朱南华 | 侯磊 |
| 81 | 读许良英先生 | 傅国涌 |
| 85 | 打捞历史的细节 | 郑也夫 |
| 88 | 乌克兰的三次大饥荒 | 闻一 |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